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一部评述西欧一些重要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它以访问记的形式，通过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和英国等党内若干领袖人物的自述，加上作者的短评，展现了西欧一些主要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以后所经历的曲折道路。

本书作者克雷默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务院专门研究国际政治运动的专家，长期从事西欧社会党问题的研究。他的这部著作通过一批曾经在半个世纪时间内叱咤西欧政坛的风云人物的经历，展示了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说明了它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基本战略，分析了它们对待重大国际事变的政策与态度，评述了它们对未来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展望。同时，这又带有传记色彩，它涉及每一个被访问者的家庭身世和政治生涯，勾画了他们的平步青云或蹉跎岁月，使读者看到了每一个主人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喜怒哀乐。此外，它又在论述那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具体资料。供了解和研究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读者参考。当然，由于作者的世界观的限制，书中有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有些显然是错误的，希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翻译的分工是：王宏周译序言、导论及第一、二章；胡尔湖译第三、四章；王建华译第五、六章。对译文不妥之处，深望读者斧正。

1991年6月

序 言

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熟的一代西欧人来说，做一名社会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本书所论及的主题。它力图通过对30年代以来就在这个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党领导人物进行的采访，把握这一社会主义历程的主观方面。

我所采访过的这些领导人物，代表着欧洲不同的社会主义，然而，他们却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主义的“代表”。对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在各种杰出的著作和文章中得到全面了解；但论述社会主义的丰富学术文献，却很少努力去重现社会主义者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环境，或是重建一个他们曾经赖以进行思考的共同图式。这正是本书的目标。

在我以往工作的过程中，我曾采访过欧洲社会党的许多重要人物，过去，这些采访记录主要是用以补充那些文书档案。我最终认识到，最使我感兴趣的那部分谈话，也就是点明个人是如何作出决定以及如何观察他们周围的历史环境的那些谈话，却没有得以利用；这个轶事是值得一讲的，但过去却没有讲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都已经过世。除非有人抓住机会，去采访一下那些仍

然健在的人，否则，就可能失去那些对说明过去是十分宝贵的线索。

对于我极其赞赏的这一代人，本书也是一种表示。面对困难的历史环境，他们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一个已经失去其理想和浪漫精神的时代，他们有话要说，或者，他们有说出来惭愧的感觉。他们的思想、业绩和友谊，对我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这些采访都是在1981年9月到12月进行的，谈话录音在经过编辑制作之后，又送回它们的主人校正并得到认可。我对梅耶和隆巴尔迪的采访是在法国进行的，并且在那里翻译了谈话录音，其他会见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关于克赖斯基的访问记，它是在1983年以回答书面问题的形式提供的。

一系列的采访记录并不构成一本书，为使它们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必须把它们置于较为广泛的全国、甚至国际的背景中；每个采访记录前面的简单“引言”，以及该书总的“导论”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个总的“导论”总结了20年代以前欧洲社会主义的演变，特别是，它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如何破坏了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统一，如何使它在精神上失去了自信心。对于说明社会主义世界在本书所着重刻画的一代人登台时是什么样子，这个部分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背景知识；尔后，“导论”又研究了社会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特别是在大衰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且接着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欧洲重建时期的

地位。

不过，在继续分析下去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这里所使用的“一代人”这个词的含义。

一代人的定义

在一篇杰出地和富于创新性地论述“世代问题”的论文中，卡尔·曼海姆系统地论述过一代人的社会学概念，本书将采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在曼海姆看来，就像一个社会阶级一样，一代人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地位；就像一个阶级在客观上可能存在、但主观上可能并不存在一样，一代人也可能意识到、或者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存在。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同时存在的许多个人；“只有当当代人活动于同一历史的和社会学意义的环境之中时，它才具有社会学上的重要性”。^①一代人早期阶段的生活经历，对于它在其他阶段的生活依然是重要的；“早年的印象很容易结合成为对世界的一种自然看法；后来的一切经历也都很容易从这最初的动向中找到它们的含义，无论它们是这种动向的证明和实现，还是它的否定和对立面”。^②“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代人，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才产生的，“在这种环境中，动态的稳定性丧失的过程，产生了社会的以及精神方面的征兆，这些为一代人的成员所面临的征兆，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具体的纽带”。^③ 尔后，

① 卡尔·曼海姆：《关于世代问题》，见保罗·凯克塞米特编：《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52年版，第29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03页。

曼海姆又为一个范围较为有限的集团下了个定义，他称这种集团为一代人内部的单位：

与现实的一代人本身相比，一代人内部的单位则表示一种更为具体的纽带。面临同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人，可以说是现实的同一代人的部分；而在现实的同一年人中，那些以不同的特殊方式形成他们的共同经历的集团，则构成一代人的不同单位。

因此，社会和文化变化的速度越快，一代人中具有特定地位的集团，就会有越多的机会以形成它们自己的生活原则为手段，去对业已变化的形势作出反应。^①

曼海姆的定义有很多优点。它说明了渊源于生物学的一代人的概念，如何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社会的含义；它假定一代人的概念是历史分析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一个因素；从形式上看，它确立这个定义的方式类似于其他概念，好比阶级；它指出了为什么一代人内部的不同单位可以同时存在，可以经历同样的历史事件，但又以不同的、然而却是相互联系着的方式作出反应；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代人可能在一个时期的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时期就很少如此。总之，它是一个动态模式，非常适用于探讨历史性变化。

我们在这里所会见的社会党人，都是在1900年到1913年

^① 卡尔·曼海姆：《关于世代问题》，见保罗·凯克塞米特编：《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52年版，第304、310页。

之间出生的,以其生日为基础来看,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亦如上述,对形成一代人中的一个单位的部分来说,年龄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但并不是一个非常充分的条件。对于欧洲的青年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根本转折点,所有的人都是在此后很短时间内成年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作为社会党人,都以特殊的方式对他们的经历作出了反应。

S. P. 克雷默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达尼埃尔·梅耶和法国社会主义	66
引言	66
达尼埃尔·梅耶访问记	72
第二章 热夫·朗斯和比利时社会主义	113
引言	113
热夫·朗斯访问记	116
第三章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159
引言	159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访问记	164
第四章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	196
引言	196
塔格·埃兰德访问记	203
西格里德·埃肯达尔访问记	210
特吕格弗·布拉特利访问记	215
第五章 布鲁诺·克赖斯基和奥地利社会主义	221
引言	221
布鲁诺·克赖斯基访问记	226
第六章 迈克尔·富特和英国工党	238
引言	238
迈克尔·富特访问记	245

D133/10

导 论

（我这一代人）看到战争毁灭和破坏了它的生活。那些已经成年的人们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纲领，形成了他们的思想。但是，当我们需要有一条前进道路时，我们被投入了战争……自战争以来，我这一代男男女女所寻求的不仅是经济平等……而且是道德平等。……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社会主义已经迅速发展，它已经不再是一种边缘政治现象，而成了大部分欧洲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各国，各小社会党之间的大量冲突消失了；到 1905 年，每一个西欧国家都有了一个大的社会党。由于国际的帮助，各民族党派之间的冲突似乎也正处于得以克服的过程之中。欧洲社会主义充满了期望和希望的感觉，甚至许多非社会党人也承认，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在 20 世纪一开始就成熟的一代中，有许多人相信社会主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的到来会继续像这一代人已经亲眼看到的那样，以同样的

① 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伊莎贝尔·布鲁姆的发言，见比利时工人党（比利时社会党的前身——译注）《代表大会文献》，1933 年 12 月，第 118 页。

和平发展方式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社会主义，削弱了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信念；俄国革命对西欧社会党人已经接受的学说也提出了挑战，并且很快破坏了它的政治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社会主义中成为积极因素的这一代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正义的，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如此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再也不可能相信暴力，而不是理性，才是人类历史的动力。正是右翼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力量这二者，迫使社会主义不得不处于守势。但是，为了认识这一代人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必须大体上叙述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尔后再研究这次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对这个运动的影响。

一次大战前的社会主义

那时有一种友谊、家庭和亲密忠诚的气氛，有一种期望……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不仅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而且成了一种生活道路，成了社会内部的一种社会团体。这种生活道路是通过创造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构成这种世界观的核心；不过，也还纳入了许多其他理论思潮。

马克思主义为欧洲社会主义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观点，并且构成了共同纲领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通过的埃尔富特纲领，为德国社会党确立了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并且为其他党树立了榜样。然而在大多数国家，甚至在领导层中间，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浅薄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各种各样学说的混合，在每一个党内，马克思主义都和本国社会主义传统的不同部分混杂在一起。

战前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有所不同，马克思的许多论著，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论著，都还没有被发现。而且，对马克思的认识更多的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者、特别是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著作；因此，他们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都带有他们自己的标记。

恩格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体系、某种它的创始人不曾有意创立的体系；辩证法不仅被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而且被运用于自然界。由于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普遍性科学的外观，恩格斯便充当了左派人士赫伯特·斯宾塞的角色，从而吸引了那些打算为一切问题都找到一种简单解释的庸人。而且，恩格斯强调历史进程的不可避免的、差不多是机械的运动，必定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这已经证明是一种令那些富于好斗精神的人们所满意的概念。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似乎使社会主义的到来依赖于历史，而不是人；马克思则强调人的意志和人的意识的作用。考茨基同样也强调革命进程不可避免的、差不多是机械的性质；所以毫不奇怪，革命的左派和修正主义的右派都抨击这种观点。在前者看来，考茨基的“正统观念”似乎在于证明，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是正确的，革命不过是在已

经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考茨基的观点能够把拒绝为进行革命而采取积极行动，说得合情合理。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观点，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

就像为新世界而奋斗的任何其他伟大运动一样，社会主义也有它乌托邦的、甚至是宗教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正如热夫·朗斯曾经贴切地指出的：

那时有一种友谊、家庭和亲密忠诚的气氛，大家共同感觉到有一种期望、有一种目标就要达到的气氛；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有一天，我们都将进入这个社会；如何进入这个社会，我们没有任何清楚的概念，不过，它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不同的和敌对的。认识到我们要完成的事业，认识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是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某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你所称的改良主义，费了我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是在最初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我才具备了一种理想社会的形象，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世界本身；它具有宗教的某些特点。^①

赫伯特·廷斯腾在他论述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不朽著作中，也提供了一幅非常类似的图画：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全然不同的社会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制度，从一个向另一个过渡必然会以非常确定的方式发生，资本主义完全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或继承。然而就此而论，这种过渡和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并没有必不可少的联系，但是，这种曾经获得成功的理想，即社会主义的胜利将是全面胜利的理想，却包含着由社会组织进行统治的意思。人们没有料到，不是多数派的党也可能赢得强大的权力地位，人们更没有料到，曾经实现的多数也可能再次失去。胜利意味着完全胜利，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已经变得强大有力，意味着为社会主义采取行动的道路已经开通……

对于如何实行社会化以及怎么样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却很少予以讨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讨论是空想式的，是不科学的。的确，预测这样的新社会一定会出现是可能的，但不可能预测它将采取的形式。所以，人们不是制定具体规划，而是用一般的术语，描绘未来社会是以最高水平的福利、自由、幸福和文化为基础的联合体；由于人们渴望制定具有非空想性质的规划，结果产生了更为明显的乌托邦思想。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实践运动，它关心短期目标，它把主要任务局限于社会政治改革，尤其是普遍的政治民主化……表现形式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就遭到了否定……

虽然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失去了战

斗力,但是,围绕这些学说而形成的感情和理智方面的气氛却仍然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此有关的宿命论发展观点,阶级斗争原理和相信整个制度的变化,以及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理想社会的实现等,所有这一切都给予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以光彩和力量。尽管党的领导人物都精力充沛地和有效地着眼于目前的(政策)改革工作,但是,他们仍然为一种感情所鼓舞,并且把这种感情灌输给他们的支持者,这种感情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是一种更伟大、更现实和更真切的目标,是一种会永远富于生命力的目标。

“社会主义”既不是由社会政策,亦不是由民主改革,或者是为和平和裁军而奋斗所构成的;相反,它包含着必定会在某一天实现的大量发明创造。如果从某个方面和宗教运动作个比较,那么,关心今天与相信未来自然是一致的,贫苦阶级的一切雄心、希望和梦想,都在未来融合在了一起。^①

然而到3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们之所以谴责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成了准宗教式乌托邦思想的大杂烩,是由于它在实践中胆小怕事。当时的共产党人约翰·斯特雷奇在《日益到来的为政权的斗争》一书中,用熟练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路线的说法,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抨击,

^① 赫伯特·廷斯腾:《瑞典社会民主党》,新泽西1973年版,第336—338页。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所论及的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在没有尖锐的、难以忍受的危机的条件下活动（社会民主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秘密就在于这个事实），所以，这样的工人阶级就只是观察资本主义的外观，它永远也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只有它那“幻想曲般的生活”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生活在一种古老的、缓慢没落、但仍然十分富裕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这样一种工人阶级，可能长期而彻底使它的言论和思想，与其行动相脱离。在这种条件下，对于任何不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和他们讲话的人，工人们都可能不能容忍；他们的政治活动的全部术语，都可能变成社会主义的；肯定社会主义，可能成为领导他们的政治家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的老朋友“生产资料、分配以及交换的国有化”，将会出现在一切党的纲领和工会的章程中。）经常要求最温顺的工会官员，从讲坛上发出暴烈的言词……

这样一种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在资本主义为其确定的范围内，可能完全像平常一样仍然是非常安宁和平静的；随着我们所论及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衰落，这种范围将逐渐缩小，然而，只要这是一个明智的渐变过程，就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的危机情况驱使下，工人政治家们必然会使他们的行动更加反动，他们的口头社会主义也将完全与此成比例地变得更加明确无误。一种口头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在广泛的工人集团

中确定下来；这种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可能使他们比较易于忍受资本主义的艰苦、甚至是相当艰苦的条件，因为口头社会主义像宗教一样，在这种条件下能成为人民的鸦片。实际上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所麻醉的那些工人，将不会感谢任何企图把他们从这种幻想中解脱出来的人（只要这些条件持续存在）。（有什么办法呢！对于企图使我们从温暖的梦中醒来去面对冷酷现实的人，我们曾经感谢过他吗？）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和心理环境中，社会民主党才可能繁荣昌盛。战后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条件就是这样的。^①

尽管社会主义是以近乎于宗教的狂热为动力的，但是，它仍然声称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那里获得了它的大部分意识形态，接受了它们对科学、进步、理性和正义的信仰；它在这些精神包袱上，又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限定条件：只有达到社会主义，这些理想才能实现，因此，社会主义既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又是对它的实现。鉴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是不同的。就前者而论，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信条必然是对立的，天主教的实践者和自由主义者是相互排斥的；社会主义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反对教权主义的立场。由于天主教的信条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所以，天主教国家的社会主义便成了一种敌对的世界观，只有在工人阶级已经非基督教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才能深

^① 约翰·斯特雷奇：《日益到来的为政权的斗争》，纽约1933年版，第296—297页。

入于他们之中；因此在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替天行道的倾向，至少从言词上看，它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都更加激进，它成了宗教的对立面。然而就新教国家而论，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理想已经融为一体，例如英国，在社会主义和“不信奉国教”的派别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在斯堪的纳维亚，节欲运动和社会主义常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联盟促进了改良主义的发展。指出这样一点是有趣的：除了德国（它是一个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居民混杂在一起的国家）和芬兰以外，强大的西欧共产党都仅仅发展于天主教国家，这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创造一种替天行道的气氛时，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加富于成效。

社会主义自称是存在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之中、但又不是这种社会的一部分的运动，这和由于阶级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于宗教而使这些社会分裂为不同部分的现实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社会主义企图在诸如工会、合作社和互助会等群众组织中，以及在教育纲领的基础上，创立它自己的亚文化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特殊社会主义的亚文化群已经衰落，但是，在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和荷兰在内的许多地方，它还依然存在；弗朗茨·博克诺曾经恰如其分地描绘过两次战争之间时期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文化群：

就组织工人而论，社会主义者不仅在政治和工业方面，而且在各种可以想到的自由活动方面都是很成功的。他们的工人组织包括体操、旅行和爬山

组织，至于其他游乐组织，则有合唱队、音乐会、下象棋，读书俱乐部当然是不会被忘记的。任何人都不会强迫社会主义者个人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或合唱队的歌唱家，但是，一旦他想要成为足球运动员或合唱队歌手的时候，就会对他施加严重压力，原因在于，他应该只参加社会主义的俱乐部，而不参加中立组织。许多这样的俱乐部都给予它们的成员以极大的经济利益。此外，社会主义者还通过民主投票表决的手段，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医疗基金以及类似机构；战后，他们又赢得了对不少于47%的市政府的控制权，这些市政府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救济工作，这些工作的实际结果，和私有社会主义俱乐部工作的实际效果相结合，使工人在其生活的每一个可以想到的方面，都保持着和社会党的联系。使其子女出生由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城市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的愿望，因为在这里，贫苦家庭的子女出生时，都可以在经费方面得到某种帮助。一个社会主义的城镇委员会，还要给按照社会主义教育原则管理的幼儿园，制定广泛的教育方案；尔后，这些男孩或女孩，就进入仍然是由社会主义市镇委员会管理的预备学校；到了离开学校的年龄之后，市政府便要尽一切努力使他参加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这种青年组织拒绝采用宗教的坚信礼仪式，而举行一种参加它自己的组织的类似仪式。在奥地利，大多数青年人所欣赏的运动是爬山和滑雪，为此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最初

一个中间组织“德国—奥地利攀登阿尔卑斯山联合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强烈反犹太人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它几乎不鼓励青年社会主义工作者加入。不过，社会主义的青年工人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大自然之友”，以及他们自己的营地和廉价的晚会等等。这类活动波及一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所有阶段，直到他们去世时为止，尔后用社会主义的丧葬保险基金予以安葬，这种基金都是他们在世时提供的；当然，这种丧葬仪式和在教堂里举行的也是对立的。^①

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有关特点是它强调教育，社会主义鼓吹集体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从实践看，社会主义者个人的表现，常常是非常相信通过教育而自立的自由主义理想。本书所访问的许多人都出身于贫苦家庭，但是，他们都受过教育，热夫·朗斯通过了与高中同等学历的考试，并且进了大学；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受益于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只有两年正规学历的达尼埃尔·梅耶是自学成才的。社会主义者还继承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即相信人和历史的最根本的理性本质；从最后分析看，进步是与人的理性发展相联系的，无限的进步之所以可能，这是由于人为理性发展而奋斗的能力是无止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关于人性的这种启蒙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差不多粉碎了它。

^① 弗朗茨·博克诺：《奥地利及其以后》，伦敦1938年版，第174—17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社会主义，正像它破坏了世界一样。^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在一个自称主张有一种新制度，但是同时，它却活动于现存世界的运动内部，必然会存在的潜在矛盾。

在社会主义内部，最严重的矛盾是革命思想与改良主义之间的矛盾，实践中已经被抛弃的革命理想，口头上依然存在。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还保留了少许的大部分西欧，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致力于议会政治和工会活动的群众组织，尽管这种倾向并非没有受到批判。无论如何，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严重背离，到1900年已经十分清楚。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国际主义和忠于本民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是明确的，工人没有祖国，它忠于自己的阶级；这并没有阻止社会主义者得出与马克思相反的结论，据说，民主的发展意味着工人确实有他的祖国，通过措词巧妙的决议，是能够使忠于祖国和国际主义一致起来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二者水火不容。

社会主义内部的第三个潜在冲突与上一个密切相关，这就是和平主义和保卫祖国之间的冲突。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多种见解，有时候，他们断定为进步目标而进行

^① 米洛拉德·德拉什科维奇：《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以及1870至1914年的战争问题》，日内瓦1953年版，第129页。这是L.-O. 佛罗萨所作的声明。

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例如铲除沙皇独裁统治的战争，但是，他们又认为战争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威胁。通常，社会主义的议会成员都以投票反对军事贷款的方式表明，他们反对保卫祖国的思想；军队毕竟是常常被用来镇压罢工，而不是保卫边疆。然而问题仍然在于，一旦真的战争爆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尽管国际多次声称它决心阻止战争，但是，它的声明并没有超出纯理论的言词；尽管社会主义者反对战争，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社会党都接受了在遭到侵略的情况下保卫祖国的思想。而且，侵略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的；1914年，多数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工人阶级内部的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都已经被制止。在8月份的最初几天，反对军国主义的每一个领导人物——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都或者是为战争狂热所吞没，或者是并不反对这个浪潮。社会主义能够制止战争的幻想为另一个幻想所取代，这就是，社会主义者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府很快取得胜利，从而出现一种新的、和平的世界秩序；在这个幻想被挫败的时候，另一个幻想又产生了：战争将导致一场消灭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来自共产主义者的这个信念，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团结，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

到1917年，各种社会主义党派的统一都开始破裂了，有些党在形式上也已经分裂。社会主义的一个集团支持继续战斗，直到胜利，另一个则鼓吹“没有胜利的和平”，这个观点接近于伍德罗·威尔逊的观点，还有少数人则鼓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最后一种观点仍然是有限界的，但是，在列宁夺取政权并创立了共产国际以后，他巩固了西欧党在战时的分裂，否则，这种分裂还可能调和。列

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深深感到，他们在战争时期的行动是一种罪过。罗伯特·沃尔对法国社会党内中间分子的评论，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为战争中的社会主义，为他们毫无顾忌地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亲密结合，以及为他们在1919年和1920年革命激流中的失败而感到内疚”^①；这种负罪的感觉促使许多人在战后时代，或者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或者走向了和平主义。

列宁企图打破旧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目的不是仅仅在俄国创立社会主义，他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但是，他希望俄国革命能够在西方比较先进的国家点燃革命的火花。列宁相信，无产阶级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阶级，但是，它被其领导人出卖了，因此，他要把工人阶级吸引到一个新的目标中来。他的国际之所以有吸引力，并不是由于社会党人真正懂得了列宁主义是什么意思，而是由于他们从遥远的布尔什维克试验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希望。布尔什维主义似乎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足矣；它是一个象征，而不是现实。

在1921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分离的原因是什么，尚不清楚，许多改良主义者奔向了列宁一边，许多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仍然呆在“老地方”。主要分歧通常是对待民主的态度，社会党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政治民主的扩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充其量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他们

^① 罗伯特·沃尔：《1914至1924年形成时期的法国共产主义》，斯坦福1966年版，第205页。

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干涉民主，而不是真正民主，在1921年，这种批评已比较尖锐，但并不十分明显。

与共产主义的分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义方面削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似乎是一种富于战斗性的运动，而社会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一个松散联盟。社会党人常常对共产主义采取一种防守的态度，他们为自卑感，为共产党人提出的那些比较有力的论战条件所困扰。

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

……你必须考虑到国际和平的希望，去确定我这一代人的处境，你必须记住我们所喊的口号：“永远不要战争”，“再也不要战争”，“再也不能有这种战争”。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就是通过法国和德国的和解而得到和平。^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男女之所以成为社会党人，主要是因为他们赞成和平主义和国际和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右翼党派强调民族主义，而共产党则强调暴力革命。正如阿尔贝·蒂博代在论及法国时所写到的：“今天，人们会说社会主义就是寻求和平，一个人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其他一切问题之前”。^②

^① 达尼埃尔·梅耶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② 阿尔贝·蒂博代：《法国的政治思想》，巴黎1932年版，第203页。

这里所使用的“和平主义”一词的意义，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它表示一种思想状态，这种状态是社会党人害怕军国主义的传统，与教育和进步能够消灭战争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或宗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最后，它还表示一种对没有能够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没有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内疚感情。由于多数社会党人相信，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军备竞赛，所以，他们决心通过为裁军而奋斗去阻止另一次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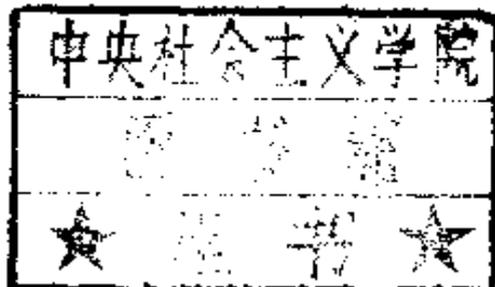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反对凡尔赛条约，这个条约似乎是一个复仇的而不是和解的和约，它可能为未来的战争开辟道路。不管社会党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觉如何，现在，他们总算可能由于支持裁军和反对这个条约而联合起来了；曾经在1914年以后推动社会主义团结破裂的战争与保卫祖国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团结的一个基础。正如齐布拉所指出的：

差不多在一切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使法国社会党统一的粘合剂之一，就是它的深刻的和平主义，而它分裂的原因也是如此。这种和平主义本身是以极其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害怕战争，传统的反对军国主义，或者，在意识形态方面谴责战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工具。^①

在英国，曾经由于反对战争而于1914年离开工党领导职位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22年是这样概述工党的：

工党的运动已经忘记了它对战时联盟和致命打击的支持……现在，它比麦克唐纳本人更具有麦克

^① 吉尔贝特·齐布拉：《莱昂·勃鲁姆和1872至1934年的社会党》，巴黎1967年版，第255页。



唐纳的特质。

由于谴责军备竞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所以，“避免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裁军”。^①

同样，和平主义在瑞典也有所复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所谓的“防御怀疑论者”一直支持完全裁军，反对党的领导人的立场，用廷斯腾的话说，这些领导人

……坚持防御的必要性，但抨击军国主义本身，他们把要求政治和社会改革与防御问题结合在一起，他们怀疑或者批判增加军备的建议，不过，他们还是根据这些建议的实际价值对其进行了研究。^②

但是，对于党的领袖布兰亭的权力来说，防御怀疑论者在1911年的代表大会上占大多数。尔后战争爆发，这似乎证明布兰亭是正确的，对于维护瑞典的中立，它的备战似乎是有功的。防御怀疑论者的坚强核心，在1917年脱党，成立了左翼社会党，后来，他们成了共产党的核心。

足以令人感兴趣的是，保卫祖国的问题在战后重又出现了；由于发生战争的前景似乎微不足道，所以很多人认为，瑞典应该通过单方面裁军树立一个榜样；这种见解很可能在1931年的代表大会上占据上风，如果不是遭到党的领导人佩·阿尔宾·汉森反对的话。希特勒的崛起很快造成了舆论的迅速变化：“仅仅在党的代表大会鼓吹裁军三年以后，党的

① 戴维·马昆德，《拉姆齐·麦克唐纳》伦敦1977年版，第332—333页。

② 赫伯特·廷斯腾，《瑞典社会民主党》，新泽西1973年版，第571页。

大多数人都准备投票支持进行一场大规模运动”。^①

对于一种与和平主义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来说，迅速改变它的立场，可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

社会主义和衰退

不要忘记，我这一代人是没有赋予经济问题以很大重要性的一代人，至少在法国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以感情为基础的。^②

几十年以来，史学家们一直在严厉责备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政治家们应用古典经济学的处方去对付大衰退，而没有采用反经济周期的方案。这类充满了自我陶醉精神的批评，今天不大经常听到了，因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都在犹豫不决地进行反对严重经济危机本身的斗争。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也许是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奇怪看法，他们变流动资本为不变资本，他们十分明确地愿意采纳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紧缩”预算。这些领导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又一次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周期性衰退；这些衰退从来都没有持续很久，根据假定，这次的情况也还会如此。当危机继续发展时，政治领袖们便不知所措了。

对于这次衰退的反应，也和紧接战后时期的经济有关。世

① 赫伯特·廷斯腾，《瑞典社会民主党》，新泽西1973年版，第577页。

② 达尼埃尔·梅耶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界战争造成了欧洲的经济混乱，在德国，通货膨胀毁灭了中产阶级；在其他地方，贬值吞噬了工人的收入和储蓄。欧洲的领导者们曾经试图恢复金本位，他们相信，这将为繁荣赖以存在的经济稳定创造前提条件。进行任何有可能破坏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试验，都是很勉强的；因此，防止赤字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削减开支，而大多数这种开支，却都是对失业者的救济。

社会党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按照逻辑，他们必然支持削减支出；但作为工人的政治代表，他们不能够同意这种削减。然而，没有一种可以选择的经济学说，他们又如何证明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呢？就反对派而论，抨击紧缩政策是容易的，但当反对派也是担风险的。如果社会党人不在政府之中，削减的开支就可能更大；而且，社会党在中欧，还必须考虑到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但是，继续呆在政府中的代价也越来越高了，在英国，拉姆齐·麦克唐纳削减了开支，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采取行动时却分裂了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参加了布吕宁政府，但是，当他们再也不可能容忍它的经济政策时便又离开了，然而，他们后来又“容忍”了同样的政府。正如斯图塔尔所说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经济政策，只有‘救济’政策”。^①

问题在于社会党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原因之一是多数社会党人都忽视了经济学，尽管凯恩斯已经发表了他的某些思想，但很少有社会党人听从他的意见；即使

^① 阿道夫·斯图塔尔：《欧洲劳工的战略》，纽约1943年版，第141页。

他们实际上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也是通过恩格斯或考茨基的普及本，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些版本提出了一种完全格式化的和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矛盾的压力而崩溃之后才会到来，社会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但是，社会党人普遍同意，资本主义的这个最后阶段仍然十分遥远，他们也没有看到，大衰退就是这种制度的最终崩溃。

简言之，许多社会党人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案是社会主义，但是，在必不可少的条件出现之前，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到来的；而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不可能予以改革的。由于社会党人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此，在按照其自身经济规律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方案不可能会有立足之地。他们的逻辑促使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采用自由主义的治疗方案。社会党人的机械思维导致他们采用了归谬证法。

社会党人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缺乏统治经验。在战前年代，他们一直集中力量解决的，多数是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男性的普选权，承认工会的权利以及短时期改善工人的状况。在大部分中欧和东欧地区，他们实际上代替了没有能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一个软弱的、或者是尚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由于男性的普选权以及政治民主没有实现，所以，也就不存在社会党当政的可能性。即使在具有民主自由的国家，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选票通常也很少，不可能使他们很快进入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

后，社会党人突然或者参加了联合政府，或者是单独执政，他们普遍缺乏准备，只具有某些低级的社会向善论思想和代表工会利益的经验。正像阿道夫·斯图塔尔所指出的：

从本世纪的转折关头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披着革命党外衣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工会在议会中的工具，它的实际活动被局限在解决工会问题的范围内……对于劳动内部传统压力集团活动领域以外的问题，社会党没有一个建设性纲领，一旦劳动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便变得完全令人难以忍受了……①

大衰退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机能是根本不健全的，它的实际行动已经越来越脱离了它的最终目标，相信未来社会的到来这固然很好，正像关心工人阶级的暂时利益一样，但二者之间缺乏联系，而且也没有一个中期战略，这是致命的。这些党的行为并非真正的改良主义，因为它们眼前的行动和任何总的目标都没有联系；机会主义这个词可能比较恰当，但这种机会主义又几乎不讲求实效。对社会党人提出自己的方案，大衰退提供了机会，但是它证明，在诸如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大多数欧洲国家，他们并没有这种方案。在法西斯主义突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欧洲社会主义毫无准备的事实就暴露无遗了，这简直是一个悲剧，因为对法西斯主义者需要作出回答，许多失望的人民也需要有自信心。德国和奥地利很快就遭到了法西斯主义的蹂躏。除非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提出一

① A·斯图塔尔：《欧洲劳工的战略》，纽约1943年版，第18—20页。

种不同的态度，否则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命运呢？因此，对于像热夫·朗斯这样的青年社会党人来说，他们积极支持提出另一种选择的新的领导人，这就毫不奇怪了。

社会主义对法西斯主义： 来自内部的威胁

大衰退和来自内部的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对欧洲社会主义是一次严重考验。德国的社会主义崩溃了；法国的人民阵线无论是对工人，还是对民主，最初都是一种真正的胜利，但它没有形成一种全国性的一致意见，无意识地助长了两极分化；英国工党分裂了，并且由于令人羞辱的选举失败而蒙受损失。比利时社会党帮助他们的国家逐渐摆脱了衰退，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某些领导人围绕内外政策方面有争论的动议，使他们处于分裂状态。只有在西欧的北部外围地区，那里的试验证明确实是成功的。

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和大衰退之前的意大利完全出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意大利陷入了深刻混乱。这次战争并不是强加于意大利的，它是参加同盟国便有利可图的意大利精锐部队，特意作出决定的结果。这次战争很少得到人民支持，社会党反对战争，只有像墨索里尼这样的少数社会党人，才脱离他们的队伍，支持参战。这次战争在下层中间阶级以及在中间阶级之中唤起了较大热情，特别是在前者的一些人中，他们由于成为军人或突击队而达到了社会升迁的目的；在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出卖”行动而被激怒之后，他们

又为左翼的反战宣传而大动肝火。

战争使工人和农民激进化，他们从前线返回之后抢占土地，继续进行略带挑衅性的罢工；他们行动的基调似乎是革命的，但社会党却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偏激的冲动。由于社会党人分裂为改良主义的少数派和革命的“最高纲领派”，前者主张和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一道参加联合政府，后者则鼓吹按照苏联的路线进行革命，但又毫无准备。所以社会党既没有进行革命，也没有进行改良。不过，他们确实吓坏了资产阶级，特别是1921年的静坐罢工。由于政府的无能，所以地主和工业家都依靠治安部队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些治安部队集团基本上都由退伍军官组成，日益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就是由他们形成的。旧的政治领导人物已经靠边，正像“秩序的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至少是某些地主希望，一旦社会党人受损于法西斯主义之手，他们就会比较服贴地妥协。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国家的容忍而从中得到利益的法西斯主义者很快发现，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开通，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导致了法西斯政权的出现（尽管墨索里尼直到1926年才完全巩固他的统治）；法西斯主义垄断了政治权力，但留下了过去统治者的经济权力没有触及。

足以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派，都未能很快就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吸取教训。尽管像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和安杰洛·塔斯卡这样的左翼作家，都已经确切地报导了法西斯主义，但社会党仍然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只看到法西斯主义是大资本的工具，没有认识到它有其自身的社会

基础、意识形态和动力。同样，欧洲其他地方的上层阶级也没有认识到，墨索里尼的胜利，部分地是以失去他们的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代价的，这种认识上的缺欠帮助了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

阿道夫·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及纳粹政权在欧洲的迅速巩固，冲击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使之惊恐万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和组织最良好的社会党，然而，它没有能够阻止希特勒攫取政权，甚至没有能够用武装抵抗，挽回自己的荣誉；相反，少数工会领导人还企图通过和希特勒作交易来挽回他们可能挽回的东西，这是不光彩的，也没有取得成功。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是不可阻挡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是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和使人幻想破灭的经历，战争的爆发以及工人阶级继续支持这种战争，似乎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已经失败的一个证明。战争造成了社会党人的分裂，他们的多数成了改良主义者，少数成了接受列宁的“二十一条”*的共产党人。不过，使社会党人希望破灭的不只是战争，欧洲的经济发展也对他们不利。改良主义者一直相信，总有一天，工人将占有人口的51%，因此，他们能够通过简单地投票表决而使资本主义垮台。然而，已经出现的却是新中间阶级，这些新中间阶级和一部分老中间阶级以及农民，也许乐于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它决定在1918年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但是，社会党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在一种他们通常预言要灭亡的制度中活动，以致他们没有

* 指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由列宁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译注

一个进行另外一种选择的清晰概念。即使当权，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干的也无非是发布普选命令，号召选举以及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一个广泛的变革社会的纲领，是完全有可能吸引中间阶级和农民的；一个争取单调乏味的议会统治，以及支持工人要求面包和黄油纲领，肯定是不会有这种吸引力的。社会党人被遗弃了，他们成了少数派党，成了他们自己那种“谦恭的以我为中心”思想的牺牲品。由于社会党无法提供一个新社会的蓝图，他们就帮助创立了一个受来自内部的过去那些名流统治者（容克贵族、总参谋部人员、官僚、大资本家和教会等）威胁的共和国；甚至在1918年至1919年，该党也未曾努力去消灭这些名流统治者。对于社会主义，这些成分从来就是不甘心的，无论这种社会主义是何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甘心于实行民主；因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特殊利益的温和发言人时，它就损伤了（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裂而已经对立的）工人阶级的热情，并且拒绝了中间阶级对它的支持。

到30年代，法西斯主义似乎已经是未来的一股浪潮。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比，纳粹党的成员要年轻得多，法西斯主义断言，它是青年对老年、新秩序对旧财主和工头的反叛；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胜利了。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停止法西斯主义吗？左派怎样才能重新赢得主动呢？这正是在1933年7月的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会议上所争论的问题。^①

这次会议表明，明显反对老一代领导人的传统领导方法

^①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33年巴黎国际会议记录汇编》。

者已经增加，由像比利时的皮埃尔—亨利·斯帕克和法国中学教师马尔索·皮韦尔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新左翼”，提出了诸如进行总罢工和暴力夺取政权的激烈步骤；皮韦尔反对保卫祖国的概念。他们的观点听起来既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政治上也是不现实的，但它是许多社会党人都已经觉察到的受到挫折的反应。在右翼方面，刚刚组成为“新社会主义”派别的一个法国社会党人集团，则重复他们的口号，要求有一个以“秩序、权力和国家”以及以“强大的民主”和参加政府为基础的纲领；他们声称，社会党人必须使法西斯主义者丧失其潜在的基础。对于新社会主义派别的观点，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勃鲁姆已经表示缺乏信心，他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表示怀疑，如果左派在他们与法西斯主义争夺中间阶级的过程中，开始吸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话。新社会主义派别此后的经历表明，勃鲁姆的疑虑是很有道理的。

旧的改良主义领导认为，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民主，社会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行使权力是允许的；而且，他们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通过不同的专制政权而采用的”“中间形式”毫无关系，“当时，这种政权正在若干国家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是民主的逻辑扩大，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反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只要它限制民主，就不能予以接受。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导致维护现存的民主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不能够控制衰退，才导致了群众性法西斯运动的崛起。

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此次会议之后一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堡垒陷落了，教权法西斯主义在奥地利夺取了政

权。奥地利社会党可能犯了错误，阻止共产党形成一股站在他们左边的势力的必要性，在当时，可能使他们极不乐于妥协让步。然而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比，他们还是楷模，奥地利社会党并没有为了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拯救”国家，而求助于议会中的右翼团体，相反，它力图创立一支共和主义的部队。奥地利社会党维持着一种真正理性的生活，在社会党人管理下的“红色维也纳”，成了如何才可能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以改善的一个样板。然而，社会主义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与天主教党相比，它在每次选举中所得选票的百分比太小，天主教党利用它的多数派地位，一步一步地建立了一个教权法西斯主义专政。最后在1934年，陶尔斐斯已经把路走绝，他的政变激起了社会党人的反应；但是，工人不可能打败军队，专政被建立起来了。在年轻领导人的领导下，社会党作为奥地利革命社会主义者转入地下。但是，教权法西斯主义接着又为奥地利纳粹右翼以及后来德国的直接侵略所威胁；1938年，希特勒既摧毁了教权法西斯主义，也消灭了地下社会主义运动。

对付衰退和法西斯主义威胁问题的一种模式在法国出现了。法国的政治气候已经严重恶化，1934年2月6日，右派的大规模暴乱在巴黎发生了，左派认为这是政变的预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民主人士，都想联合起来对付这种威胁。尤为重要的是，苏联最终认识到，它鼓励共产党把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敌人予以攻击的政策是灾难性的。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突然转变，现在，它鼓吹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切民主派相联合和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合作。

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以及像工会和人权同盟等这样

的其他组织结成的联盟、法国人民阵线，赢得了1936年的议会选举，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勃鲁姆出任总理。就其民主政策而论，这个政府取得了各种成就。左派的胜利激起了一次静坐罢工的巨大浪潮，并且变成了总罢工。在勃鲁姆就职的时候，他在政府所在地马蒂翁宫组织了一次企业和劳工会议，导致了承认工会、集体协商、增加工资以及第一次支付假期工资。社会党报纸《人民报》采访这次会议的达尼埃尔·梅耶回忆道：

……恰巧在工人代表团中有一位在一家企业工作的妇女，而这家企业的老板就在资方代表团中。对于这个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个老板毫无所知，当她告诉老板她在工厂的收入时，老板满脸通红，结结巴巴，他非常吃惊，他否认如此少的工资，否认他支付工资吝啬的特点。集体协商以及承认组织工会的权利，也许给了工人阶级以他们到当时为止还不知道的主权和尊严。在这一方面，这是一次革命。^①

另一方面，人民阵线却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勃鲁姆希望，工人已经增长的购买力将刺激生产，使法国摆脱衰退；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部分地是由于政府没有建立通货控制机构，大量货币离开了这个国家；政府对于货币贬值也犹豫不决，当它实行贬值时已经为时太晚。政府缺乏经济学专家，凯恩斯的影响也还没有为人们所察觉。在短命的1938年第二届勃鲁姆政府中，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准备了一个新

^① 达尼埃尔·梅耶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的解决方案,但对于人民阵线已经为时太迟了。

人民阵线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一次突破,但它也造成了法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它表明,要在前后一致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对外政策基础上使法国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而且,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共产党人为了打入反对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组织内部而利用了人民阵线。

在英国,工党内部围绕经济危机的分歧导致了分裂而不是团结。反对麦克唐纳政府政策的运动,在一段短时间内是由一个工人贵族领导人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领导的。无论是在工党内还是在自由党内,对凯恩斯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法都曾有过某些讨论,随着失业形势的恶化,许多工党成员都要求采取行动。莫斯利把麦克唐纳和财政大臣斯诺登,比作“在汽车前面乱跑、并且对他们对手的经济口号咯咯乱叫的小鸡”。^①他于1930年1月准备了一份供传阅的长篇备忘录,鼓吹国家干预经济,把经济恢复的目标放在平衡预算之前,由此激起了讨论,但这个备忘录由于斯诺登的恫吓而为工党领导所拒绝。莫斯利后来辞职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新党,这个党倾向于帝国贸易保护主义图式;1932年,莫斯利抛弃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建立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

莫斯利的向法西斯主义靠拢,基本上是由于他易于冲动、傲慢自大的性格和崇拜物质力量而造成的;不过,他1930年的经济观点和工党领导人相比,更加接近于目标,工党的很多优秀思想家都和他一样灰心丧气,但他们不愿意离开党。莫

^① 迈克尔·富特:《安奈林·比万》,第1卷,纽约1963年版,第130页。

斯利像墨索里尼一样信奉社会主义，相信它是一种通过暴力进行根本改革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当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时，他对工党的兴趣消失了。

1931年，面对严重赤字的麦克唐纳政府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包括由托利党人和自由党人担任部长的联合政府；工党的绝大多数人都视麦克唐纳的行为是叛卖，工党分裂了；在“全国工党”的议会成员中，只有少数人追随麦克唐纳。1931年的选举造成了工党的毁灭性失败，使它在30年代期间失去了制定政策的发言权。

就利用计划经济以终止衰退来看，在比利时出现了一种似乎是颇有希望的试验。就像他们在德国和英国的同行一样，比利时社会党的老领导人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梦想和对保守政府的紧缩政策的纯否定性批评之间，似乎没有中间地带。作为一个工业国和出口国，比利时遭到衰退的沉重打击；不过，与纳粹在德国的活动相比，日益发展的法西斯运动的威胁比较小。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瓦隆和弗拉芒法西斯分子不可能共同活动，然而，至少自1914年以来，三个主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却已经习惯于进行合作；1935年，在布鲁塞尔进行补选时，他们在范策兰德首相的幕后操纵下联合起来，十分不光彩地击败了国王党的领袖莱昂·德格雷勒。但是，社会党和工会的形势是困难的，该党领导人埃米尔·王德威尔得邀请亨德里克·德曼回到比利时，鼓励他尽力对党进行改革。^①

^① 下面的材料引自我的文章：《比利时的新社会主义》，见《共和国》，布鲁塞尔1976年，第1期。

德曼是《社会主义心理学》一书的作者，在这本书中，他力图清除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历史循环论因素，通过发现感情和理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通过肯定需要有一个并不局限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党，“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围”。1929年，在德曼被提名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的职务以后，他看到了魏玛共和国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灭亡，他认为，他了解为什么德国的社会主义会失败，并且同意了王德威尔得要他回到比利时去的请求。德曼相信，法西斯主义是可以制止的，他和一个由包括热夫·朗斯在内的党内若干最杰出的年轻人组成的研究小组一道工作，准备了一个经济计划，其目的在于铲除法西斯主义的根源。^①

德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注意到了中间阶级的不满，这种不满是由于他们受到两极分化的威胁，以及他们被操纵反对无产阶级而产生的。德曼强调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似乎是现存制度的维护者；只反对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仅仅采用否定的方法，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毁灭的原因。党必须使中间阶级的反资本主义适应于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一点之所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目前越来越发展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中间阶级。德曼强调了帮助失业者的重要意义，失业者正在成为第五等级，他们敌视劳工运动，在他们看来，这个运动似乎仅仅维护那些有职业者的利益。对所有这些集团，必须有一个共同标准，反对雇主的斗争仅仅对工人有兴趣；改革分配制度的斗争很难进行，因为资本主义正处

^① 亨利·德曼，《事后》，布鲁塞尔 1941 年版，第 123 页。

于侵略性的发展阶段。必须创立一个强调结构改革的劳工阵线，以反对造成危机的根源金融资本主义。动荡不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用一种混合经济取而代之；而所有这一切变革，都必须经由改革国家去完成。

这个计划的关键是信用国有化，“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发展居民群众的购买力，以便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有益的和有利可图的职业，并且增加普遍的福利”。对于在垄断组织控制下的基础工业，要实行国有化；建立一个交通部；经济的其余部分则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为政府的总的指令所支配。这个计划的许多特殊目标是：稳定利润，缩短劳动时间，确定集体协商程序，增加对外贸易，建立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此外，政治制度也要有所改变，把议会改造成为精简的单院制机构，由男性普选产生，由协商委员会协助工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议会外按照其专长挑选。要赋予为指导经济而建立的各种机构以执行权，以便保证“行动迅速和责任集中”。^①

这个计划似乎还得到了某些政治利益。首先，它可能使党处于攻势；其次，通过把参与和“计划，和整个计划，而且只有和计划”联系起来，它似乎解决了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第三，它吸引了年轻一代社会党人，例如热夫·朗斯、伊莎贝尔·布鲁姆、马克斯·比泽和毛里茨·奈森斯，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后来才醒悟的；第四，这个计划似乎为解决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辛辣争论，提供了一个处理方案。德曼高瞻远瞩，使比利时成为“向资本主义大举反攻的起点……这将向世界表

^① 关于这个计划的原文，可见彼得·道奇的《马克思主义之外：亨德里克·德曼的信仰和著作》，海牙1966年版，第232—236页。

明，正是而且也只有通过自由，比利时才能够实现其全力以赴寻求的制度。”^①

这个计划的重要意义并不局限于比利时，其他地方也努力进行了类似的试验，社会主义可以与制定计划和混合经济联系起来的概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证明是特别重要的社会党，提供了一个新模式。

在比利时，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的运动，在1935年达到高峰，然而在当时，右翼政府倒台，在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党派的基督教民主派一翼之间，组成了联合政府，德曼和斯帕克都包括在内阁之中。德曼放弃了他争取实现其计划的运动，正像斯帕克也放弃了他参加该党的最左部分——社会主义行动派的活动一样。尽管这个政府很少进行计划所提出的结构改革，但是，它还是采取了有效的反对失业的行动；由法国发难的1936年的总罢工，也使工人阶级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比较强调传统的社会党人，批评德曼和斯帕克在民主政策的一些方面抛弃了社会党的立场，但他们参与管理的政策却得到工会的支持。斯帕克提倡的“秩序、权力和责任”，以及“独裁主义民主”，正像德曼鼓吹的“民族社会主义”一样是令人吃惊的。围绕对外政策方面的严重分歧也出现了。

正像多数其他社会党人一样，德曼和斯帕克在1936年都支持比利时恢复其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他二人把这个政策的意义解释为中立。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比利时社会

^① 《关于比利时的经济计划》，见《比利时工会运动》，1933年8月23日，第298页。

党人在感情上是支持这个共和国的，但是，如果比利时社会党拒绝遵从斯帕克的建议，不同意在 1938 年开放与佛朗哥的商业关系，那么，比利时的联合政府就可能垮台（斯帕克通过三次党的会议才找到了出路）。到 1938 年底，德曼似乎丧失了对政治民主的信仰，也许，这部分地是由于他想成为首相的雄心已经受挫。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支持中立；党的另一翼则提倡在道义上积极支持同盟国。在比利时遭到侵略时，德曼在国王的强制下，取消了他自 1939 年 4 月担任主席的比利时工党，并且企图建立一个为纳粹所接受的劳工运动。斯帕克离开比利时，参加了流亡政府。德曼的生涯说明，在 30 年代最希望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积极”的运动的这些人，都可能成为某作家曾称之为“邻国那个典型神经病”的牺牲品，^① 如果他们相信“新秩序”是未来的浪潮，社会主义象民主一样已经过时的话。

斯堪的纳维亚实施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对付大衰退的方案。就像他们的大多数欧洲同行一样，瑞典社会民主党也一直在为彻底的议会民主（直到 1920 年才实现），和短期的社会目标而奋斗，除了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外，该党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很快就消失了。1920 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少数派政府，任命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以考虑工业社会化的特殊方案；同时，这个政府还追求一种抽象的一般纲领。到遭受衰退的打击时，社会化委员会没有提供任何建议，它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1932 年，该党以直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纲

^① 路易斯·罗森斯托克—弗兰克：《危机中的民主党：罗斯福—范策兰德—莱昂·勃鲁姆》，巴黎 1937 年版，第 62 页。

领为基础，与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化委员会在后来被取消之前又保留了几年。这个新政府的纲领，包括国家较多地介入社会事务和保护农民利益（但不是国家控制工业），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纲领；社会民主党创立了一个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消失了，但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意味着接受一种毫无独创精神的改良主义；相反，瑞典社会民主党从来都没有忘记致力于平等，它通过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标记的实用观点和方法，创造了那些促进这一目标到来的新型政策。

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社会党人，也成功地对危机作出了反应。在斯陶宁领导下的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避免了1933年1月的严重工业危机：雇主坚持要削减20%的工资，但遭到工人拒绝；为了阻止关闭工厂，政府与主要党派的领导人，召集了一个马拉松式的讨论会，结果是同意货币贬值，并且在一年之内禁止罢工和关闭工厂；后来又建立了一种强制性仲裁制度。正是：需要是创造之母。同时，整个社会立法制度也被进一步合理化。该政府不是通过国有化，而是通过控制工资、价格和税收去对付危机：

所以，丹麦具有一种受政府控制的经济，如果不是计划经济的话，政府调节的程度较之英国、法国或美国要高得多。与瑞典不同，丹麦执行政策几乎完全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并不努力应用理论作指导或证明其正确性。丹麦试验的成功，可见于它的政治后果之中：丹麦农民并没有受驱使而加入法西斯主义的队伍，丹麦的工人也没有转向共产主义者，尽管当时

的动荡不安是十分严重的。^①

在挪威，工党也和农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35年的尼高斯沃尔政府，是一个向实用主义转变的代表。由于受内部在马丁·特兰梅尔领导下的激进工联主义一翼的影响，因而短时间追随共产国际，并且为各种分裂所折磨的工党，现在也以进行改良的纲领为基础团结起来了。由于政府的努力，失业人数极大幅度地减少，农产品价格得到改善，工业和平得以维持，并且建立了社会福利立法：

几乎所有这一切措施，都原则上为议会的所有派别接受下来，尽管对细节问题有所批评；这种情况有助于消除一种概念，即一个庞大的右翼极端分子组织，已准备进行争夺其特权的斗争……同时，工党的运动也恢复了它从前与瑞典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密切关系，并且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②

因此到30年代末，我们已经可以谈论“走向社会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道路”了，尽管在瑞典、挪威和丹麦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差别，但它们的道路却联结在了一起，一种受到广泛支持的福利国家出现并得到发展。这种试验的成功在70年代得到证明，当时，社会党都至少是暂时失去了政权；他们的对手“资产阶级”，并没有努力去破坏这种福利国家。

对欧洲社会主义来说，30年代是极其痛苦的时期，某些

① 卡尔·兰多尔：《欧洲社会主义》，第11卷，伯克利1959年版，第1559页。

② T·K·德里：《1814年至1972年的现代挪威史》，牛津1973年版，第328页。

最强大的社会党，没有能够对付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并为由此而产生的政权所消灭。英国工党失去了作用；法国社会党利用人民阵线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并没有能够确立全国一致的局面；比利时的计划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但社会党却由于对外政策而分裂。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却登上了新的里程，这对其他国家将是一个榜样。

社会主义对法西斯主义： 来自外部的威胁

我们不可能像希特勒确立他的权力那样，如此迅速地抛弃我们的和平主义。^①

在多数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没有产生严重的内部威胁。法西斯主义是在经济危机和害怕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不可能战胜长时期政治民主的传统，例如法国和英国的下层中间阶级，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危机状态的阶层，都仍然是民主派。希特勒的胜利不受欢迎，也不是威胁；少数人期望有一场先发制人的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也有人意识到希特勒会何等迅速地重新武装起来。

只是在德国开始重新武装，以及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对外冒险的时候，他们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点才变得明白了；然而直到1939年3月，致力于和平主义的许多社会党人还相信，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把所有德国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人都统一于一个帝国之中。1934年之后，已经没有社会党人在国际一级的统一反应；欧洲某些最重要的社会党也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在生存下来的党内部，也没有作出恰当反应的统一意见。

正如热夫·朗斯所说的：

你不应该忘记，有一个问题使法西斯主义复杂化了。在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我们在欧洲工人运动内部，在欧洲的一切地方，都几乎把和平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点予以灌输；在希特勒已经当权，并且组织使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活动时，我们却还在实践那种迷信；所以，在我们一方有不止一个弱点，这只是真正的一个。我要说，英国是过分强调和平主义了；不是和平主义者就不可能是社会党人。我们不愿意正视德国正在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危险……

还有，你知道就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希特勒夺取政权是一次非常迅速的行动；工人运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痛苦经历，已经发展了一种和平主义观点，对于这样一个老运动来说，要抛弃这种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在看到德国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像希特勒确立他的权力那样，如此迅速地抛弃我们的和平主义。他走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当然，就是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反对民主的权力；你知道，民主的理想必须通过一套

完整的制度和各种会议等发展起来。^①

达尼埃尔·梅耶指出，他毫不困难地就从和平主义转向了反法西斯主义：

我认为，除了某些和平主义者以外，所有青年社会党人都懂得，这个新德国、希特勒的德国，将不会成为昨天的德国，我们必须迅速改变看法。鉴于我们一直支持与魏玛共和国达成谅解，所以就不可能与希特勒的德国实行谅解；我们一直争取裁军……然而一天天面对这个新德国，不仅不裁军是必要的，而且相反，还必须重新武装起来。^②

然而在法国，许多社会党人却仍然是和平主义者。

在英国，工党在 20 年代一直支持裁军。1931 年以后，工党的残余在若干年内，为一个年迈的唯心主义基督教徒乔治·兰斯伯里所主持，他提出了一种差不多是全面的和平主义，他的助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也具有同样的偏好。工党还包括鼓吹通过国际联盟而实现集体安全的人，他们同时反对增加军事预算，支持裁军。该党内部的形势是混乱的，它说明了朗斯的评论：对社会党人来说，要像他们的敌人那样，非常快地适应形势是多么困难。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墨索里尼的埃塞俄比亚战争，推动了工会领导人，特别是欧内斯特·贝文，他们既支持国际联盟制裁意大利，又支持英国的重新武装；他们迫使兰斯伯里于 1935 年下台，并由克莱门特·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② 达尼埃尔·梅耶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艾德礼取而代之。但是，即使如此，工党仍然不能同心协力。这个民族政府声称支持埃塞俄比亚，却一直准备通过霍尔—拉瓦尔协定把它出卖；同一个政府，在国内似乎就是阶级敌人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又怎么可能投票支持防务预算？接着又是西班牙问题。

最初，西班牙内战似乎强化了工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却为政府支持不干涉主义所玷污，据说，这种不干涉主义是按照法国人民阵线的愿望行动的。只是由于工党逐渐发现，不干涉只不过是英国离开这个共和国，允许德国和意大利向佛朗哥的西班牙倾注大量军备的借口，才迫使它拒绝了不干涉政策。然而，不管其错误如何，工党与站在其右边的对手相比，还是站在了比较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就在希特勒入侵波兰的那天，当张伯伦还在为英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支吾搪塞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后排议员，便喊叫着走到了“为英国说话”的工党发言人阿瑟·格林伍德的跟前。

在法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和平主义在 20 年代为社会党提供了团结的基础；人们已经看到的国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希特勒的崛起，促使该党加入了人民阵线，尽管某些社会党人对于和共产党联盟并不十分热情。在这个 10 年的后半时间里，引起社会党分裂的最重要因素是对外政策，而不是国内政策。他们可能对德国力量的迅速成长作何反应呢？

该党已经深刻分裂。一个极端是马尔索·皮韦尔，他鼓吹暴动在法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价值，鼓吹革命的失败主义，

一旦战争爆发的话；工人阶级应该拒绝保卫祖国，如果德国开战，战争将转变为世界革命。不管皮韦尔的思想是多么荒谬，但它们还是有大量听众，特别是在教师和巴黎同盟之中。另一方面是让·齐罗姆斯基和社会主义战线派（达尼埃尔·梅耶属于此派），他们支持联合俄国反对法西斯主义。

自1921年以后，法国社会党一直是以该党总书记保罗·富尔和该党议会集团的首领莱昂·勃鲁姆之间的联合为基础的；1934年之后，这个联合开始破裂。勃鲁姆和富尔二人都一向支持裁军；直到1936年，勃鲁姆还坚持要向德国提出裁军建议，但是他越来越清楚，反对希特勒的一个光辉同盟是必不可少的。到进行不光荣的妥协时代时，*该党实际上已经分裂：勃鲁姆和社会主义战线派，对富尔和皮韦尔派。

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勃鲁姆作为政府首脑，立即向这个共和国运送了武器，由此激起了反对，激进党作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持反对态度，许多社会党人也反对援助西班牙；英国则通知勃鲁姆，如果他的行动导致了与德国的战争，英国将不乐于站在法国一边。勃鲁姆准备辞职，但是，西班牙大使德尔巴约请求他不要辞职。勃鲁姆继续暗地里提供武器，但法国官方表示赞成不干涉主义。按照事物的逻辑，勃鲁姆是被迫支持不干涉主义的，因此招致了共产党和某些他自己一派人的愤怒。勃鲁姆辞职是否比他充当不干涉主义的挡箭牌会使情况好一些，这一点尚不清楚。这个保守政府利用法国同意不干涉主义，去反对工人帮助西班牙的要求。

* 指1938年9月英法和德意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事件。——译注

这种悲剧在于，不可能有一个以坚定地致力于法国联合和抵抗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右派不可能抵抗法西斯主义（除了少数值得指出的例外以外）；激进派心神不定；社会主义已经分裂。法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自慕尼黑协定以后，由于对公共生活中这个基本问题的分歧，法国社会党分成了两个部分，正是这种分歧使它缄默，无所作为。由于渴望维护其表面上的统一，该党避免采取任何清楚的行动方针，甚至避免作出任何明确无误的宣言，因为，那将会暴露它的内部分裂，并且无疑会导致实际分裂……因此，该党又在无人信任和羞辱状态中生存了两年多，直到最后，它的存在几乎再也不为人所注意了。^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932年的瑞典党代表大会上，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单方面裁军的观点；到1936年，该党的大多数人支持重新武装。纳粹的崛起，埃塞俄比亚战争，以及国际联盟的失败，都有助于作出这种决定；同时，该党还重新肯定它致力于裁军的理想，正如该党亲裁军一翼的一个前领导人所说的：

我们必须记住，在欧洲存在军事真空的每一个地方，都会立即由纳粹的部队所填补，如果不是纳粹德国的部队，就会是该国本身具有纳粹精神的私人部

^① 莱昂·勃鲁姆摘自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国际史》，第2卷，伦敦1967年版，第489页。

队……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在世界事变的巨大压力下，或者是由于民主的政治条件，从而不得不暂时改变在军事问题上沿着后退道路前进的方面，那也不是因此而放弃它的基本立场；我们非常肯定地说大家都同意，一旦客观条件允许，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进行反对军事行动和争取裁减军备的斗争，就将重新继续下去。^①

根据卡尔·兰多尔的观点，丹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实际上已经实行了一个接近于单方面裁军的纲领：

即使在那些小国中，也很少有像在第二届斯陶宁内阁领导下的丹麦那样，使它们的安全如此严重地依赖于国际联盟。丹麦的陆军和海军被缩小到这样一种规模，几乎使它不可能在战争事件中维护其边界，防止丹麦中立地位的哪怕是轻微的动摇；这些军队完全不足以击败入侵。1933年以后，该社会党认识到和平政策已经破产，其他国家并没有仿效丹麦自动单方面裁军的榜样。然而，对任何严肃的防御计划来说，都可以认为该国的资源太少。当实际入侵到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能力保卫自己，它只有通过国民们不可收买的精神而维持其道义上的统一。^②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这种混乱状态。慕尼黑协定之后，国际内部比较小的国家，失去了对英国

^① 赫伯特·廷斯腾：《瑞典社会民主党》，新泽西1973年版，第562页。

^② 卡尔·兰多尔：《欧洲社会主义》，第11卷，伯克利1959年版，第1559页。

和法国决心抵抗希特勒的信任，它们力图避免采取一种明确立场：

到1938年9月，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避免，那些与希特勒德国接壤的小国，希望通过一种中立地位政策，逃脱这场灾难。除了荷兰以外，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党，都在国内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由于他们改变立场，实行一种中立地位政策，它们便和工党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所一贯支持的集体安全政策，处于对立地位。^①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席和书记路易·德布鲁凯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都是很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在1939年5月14日辞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国际甚至没有谴责侵略者，社会主义运动面对战争，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战争、占领和抵抗运动

帕里对我说，“我们要讨论一下是不是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开始武装斗争吧，问题将会得到解决”。^②

西欧为纳粹所吞没，似乎证明了右派的说法是正确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已经过时。法国陷落使许多人相信，纳粹的党旗将很快飘扬在威斯敏斯特区的上空；少数人预料到了戴高乐，他意识到轴心国将不可能取胜，其他人只会由于道义的原

①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耳，《国际史》，第2卷，伦敦1967年版，第490页。

②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因而进行抵抗。被占领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都不惜任何代价地恳求和平，即使他们没有实际上与德国人合作，那也是愿意骑墙。樊尚·奥里奥尔描绘了在1940年7月的一次投票把权力完全交给贝当的议会上，社会党议员是以何种行动对付莱昂·勃鲁姆的：

社会党的175名议会成员在哪里？……当然，有一些人是不可能来的……不过其他人呢？那些从前曾要求在党的核心会议上，在议会里，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群众大会上起立为他欢呼的代表们在哪里？那些正在谋求当选或再次当选，那些曾经请求他到他们地区去，以便利用他的雄辩才能、他的权力和威信给他们以支持的人们在哪里呢？那些曾经拥挤在马蒂翁宫接待室恳求支持的人们，那些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的人们，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①

与德国人合作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许多社会党人都受到了诱惑；他们与像维希政府这样的准独立“政府”合作，即使不是直接和纳粹合作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人的行为使这种合作令人感到不快；战争日益变化的命运，最终使它成了不合理的战争，到1943年，同盟国的胜利似乎已经是可能的了。对于左翼与傀儡政权和德国合作的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只是在这时才进行了严肃的研究。

^① 若埃尔·科尔顿：《莱昂·勃鲁姆：政治上的人道主义者》，剑桥1966年版，第375—376页。

必须看到，组织地下社会党的努力正是以此为背景的，这个任务要求有极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这种抵抗从来都只是吸引了少数居民；社会党人的抵抗也只是少数社会党人的事。正是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那些人，挽回了社会党的荣誉；没有他们，战后社会党的再生是不可能的。

对抵抗运动进行分类，可以有若干种方法。首先，在国内和国外的抵抗运动之间就有所区别，二者的联合是困难的，它们的观点也常常不同。通常，企图要求在国外进行控制的过去那些党的领导人物，都是国内抵抗运动指责他们要为战前的失败承担责任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从事地下活动的社会党，实际上却放弃了它们以前占有的领导地位。

抵抗运动也可以这样来划分：明显是由党的组织进行的运动和由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组织的更加广泛的运动。一般的看，社会党人参加后一种运动有多种原因，他们不认为这种抵抗是一种党派政治活动的问题。在参加抵抗运动人物中间，原来的社会党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特别是在战争开始时，民主制度的崩溃似乎就是整个制度失败的证据，而社会党曾经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许多抵抗运动的成员，都梦想有一种以新的、或者至少是以极大改造过的党派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同意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亨利·弗雷内观点的社会党人，确实是存在的，弗雷内在1943年曾经写道：

以有人在对法国的严峻考验中为激进党或民主同盟而死亡作借口，那是幼稚的；不过，确实有属于激进党或民主同盟的人，在抵抗运动中为法国牺牲了。因此，目前要把各党派像它们在战前的存在情况那样

重建起来，那将是一个严重错误。^①

许多法国社会党人都不希望看到法国社会党重新出现，这尤其是因为其多数战士在战争期间都坐等观望，像保罗·富尔这样的领导人，也由于绥靖政策而蒙受耻辱，并且陷入了维希政府。在意大利，社会党人常常隶属于正义和自由派，它在抵抗运动中较之社会党要积极得多。

然而，已经重新出现的老党，或多或少是由战前的党变来的。它们重新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人的行动，在纳粹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时期，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之外观望，此后，当俄国遭受入侵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抵抗运动。与社会党人相比，他们搞地下活动要内行得多，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和前线机构，并且打入了其他组织之中；由于他们作为一个党行动，所以，它们的名声要比其成员在非党运动中战斗的党派大得多。共产党的抵抗运动的性质，帮助把神秘的抵抗运动变成了政治的抵抗运动；在解放运动中，社会党人不可能承担面对共产党人而没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的风险。法国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遭到美国人反对的戴高乐，鼓励社会党的再生，以便证明他声称代表法国是正确的。

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老的政党都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党只是这些老党派中的一个。以抵抗运动为基础的新党派出现了解体的倾向。但是为了生存，社会主义在战后年代，必须为反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① 亨利·弗雷内引自亨利·米歇尔和施里斯·米尔金—凯泽维什《抵抗运动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巴黎1954年版，第114页。

社会主义是时间的主人？衰退 和成功：1945—1968年

我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把30年代的政策进一步向前推进：充分就业、良好的教育、更多的社会正义……真正的突破是30年代。^①

的确，该党已经没有更多办法了。^②

按照我的意见，正是在1966年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失去了最大的机会。^③

莱昂·勃鲁姆在他从德国集中营返回不久，就写了一篇乐观主义的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时间的主人》。^④它反映了西欧社会党人广泛的乐观主义：世界可能变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将可能成为新社会的基础。这些希望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又如此快地失望了呢？

社会党人希望，世界能够在国际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并且能够成功地创立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他们企图解决分裂欧洲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问题；他们希望有一个没有集团并继续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光辉同盟的世界；他们希望，西方和苏联之间的美好关系，将与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或者是联合、或者是合作并行不悖。他们常常设想，通

① 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② 达尼埃尔·梅耶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③ 迈克尔·富特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④ 《莱昂·勃鲁姆文集(1945—1947)》，巴黎1958年版，第65—78页。

过吸收天主教徒、抵抗运动参加者以及其观点由于战争经历而扩大的中间阶级成员，社会主义将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最后，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将经历一个更新和恢复元气的过程，从而证明它对领导地位的要求是正确的。首先是冷战毁灭了这些崇高的希望。

在战时联盟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各种阻力。战后的秩序不是以理想，而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础的，英国和美国已经镇压了希腊左派，并通过各种并非直接的方式干涉意大利；俄国人相信，要在东欧建立“友好政权”，唯一的途径就是建立傀儡政府，利用红军巩固不受欢迎的共产党统治；东欧社会党或者违背它们的意志，与共产党人联合在“统一的”党中，或者是被消灭。1948年布拉格的突然行动，就是斯大林意图的说明，正像1939年的突然行动，已经确定了希特勒的意图一样；* 人们可能在很多方面要责备美国，但斯大林主义更糟糕，如果要在它们中间作一个选择，那将是大西洋主义。

社会党人力图避免在美国和俄国之间进行抉择。在争取一种新世界秩序的愿望破产之后，社会党返回到了第二道防线：欧洲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和独立的欧洲，是东西方之间的纽带；重新形成的社会党国际可以是第三种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在内的抵抗阵线政府的持续存在，就是希望维护地下斗争时期那种脆弱联合的证明，但外部世界事变的发展，要比这些国家内

* 指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共领导下战胜企图通过反革命政变颠覆人民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事件。作者把这一事件与希特勒于1939年3月全面占领捷克相提并论，显然是荒谬的。——译注

部快得多，这些抵抗阵线政府是不合时宜的。到1947年，冷战已经极大地发展，以致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相信，欧洲能够置身其外；而且，欧洲发现它是不可能恢复的，如果没有只有美国才可能提供的大规模经济援助。除了意大利人以外，绝大多数社会党人都站在了反对俄国的美国一边，尽管他们对此毫无热情。

随着由于朝鲜冲突而引起的冷战全球化，美国决定欧洲必须为了其自身而提供地面部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了，但是，这还不够。法国的重新武装也提出来了，这种思想在第三帝国崩溃的5年后，几乎是不可能受欢迎的。避免德国重新武装的出路，是在一支欧洲部队的机制内重新武装德国，这种思想体现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列文计划中，它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极大反对。在几年讨论之后，这个计划于1954年为法国国民议会所击败。社会党人严重分裂：尽管法国社会党同意这个计划，但它的议会成员的半数投票反对；在比利时，社会党让其成员自由投票表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法国国民议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否决，导致了伦敦协定的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比欧洲防务共同体提供的保护措施要少得多。要害在于，欧洲社会主义并不处于为欧洲作出决定的地位上。的确，欧洲不可能决定它自己的命运。

但对社会党人支持大西洋联盟这个普遍规律来说，也有一些例外，由于中立的瑞典置身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外，所以唯一的逻辑是瑞典社会党人应该支持中立。然而，意大利却是唯一一个重要社会党在解放以后还和共产党人保持了10年密

切联盟的西方国家，这个人民阵线，一直发展到1948年选举中提出共同的选举名单，对意大利社会党，这些选举是灾难性的（意共在众议院得到135个席位，意大利社会党是51个席位）。尽管社会党此后的代表大会终止了这个联盟阶段，但意大利社会党仍然和共产党人保持着行动的统一。

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反常现象呢？法西斯统治在意大利长达20多年之久，许多社会党人都帮助过墨索里尼夺取政权，使左派分裂。党的领导人彼特罗·南尼和党的书记莱科·巴索，决心不让再发生这种情况。共产党似乎是左派一方最富有生气的力量；如果和共产党联合的代价，是与意大利社会党的右翼分裂，那就更糟了。德国也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存在的长期经历，在那里，社会民主党责备共产党帮助破坏了魏玛共和国。在法国，法西斯主义似乎从来都没有接近过政权，在那里，似乎并不存在维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盟的急切心情。但是在意大利，联合的神秘性是非常有影响的，而且，它又为对抗美国和英国对意大利事务的干涉所强化。

反对支持大西洋主义这一普遍运动的第三个重要社会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崩溃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向1933年之前发挥主导作用的那些人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在希特勒年代，德国不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地下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可能从抵抗运动的丰富经验中得到好处，自然，社会民主党人是在他们没有能够制止希特勒的基础上，安排战后他们的战略的。自称为领袖的库特·舒马赫决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不再作为一支反民族的力量出现，就像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看待它那样，舒马赫强调德国的民族利益；由于强烈反共，所以舒马赫拒绝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苏联占领区内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然而，尽管他强烈憎恨苏联的共产主义及其东部地区的盟国，但舒马赫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反对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他的反对意见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认为从和平主义出发，应该平等对待德国，平等对待他们党的其余部分；而且，舒马赫担心欧洲防务共同体阻止德国的最终重新统一，与大西洋的团结相比，德国的统一更加重要。但这个政策证明，它既不现实，又不可能从选举中捞到好处。在1983年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破裂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执行的政策，非常类似于这个时期，这是很有趣的。

因此，社会党站在了冷战一边。欧洲不可能成为世界和谐的工具，它甚至不可能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中维护它的独立。但这也有助于说明欧洲为什么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欧洲，欧洲需要美国，而美国却对社会主义顾虑重重。美国暂时有可能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最坏的敌人”，但是，只要一有机会，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美国，还是宁愿与基督教民主党或保守党合作。美国人在思想上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使社会主义者似乎成了美国半信半疑的同盟。到40年代末，欧洲的政治倾向开始向右摆动，社会党或者必须接受比较保守的政策，如果他们希望仍然留在联合政府之中，或者重新成为反对派。

冷战的逻辑结果、西欧共产主义的人数减少，对社会主义的希望是一个沉重打击，1947年以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作

已经不再可能，的确，社会党的部长们，还常常采取镇压共产党人倡导的政治罢工的行动。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人们非常担心共产党人有暴动计划。这种计划确实是不存在的，不过，莫斯科的确曾经指示各国共产党要瓦解西欧，因为莫斯科担心美国正在计划战争。由于社会党变成了反共联盟的一部分，他们不得不向右派靠拢；他们和自己的某些谴责他们帮助对左派进行分而治之的选民，发生了对抗。同时，共产党的和社会党的议员们不能够协同工作，也加强了右派的力量。出路已经不复存在：例如，法国社会党人之所以失去支持，因为他们反共；意大利社会党人之所以失去支持，却是由于他们和共产党结盟。

法国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力量的衰落，也是由于和共产党相比，他们的组织比较差所引起的。老的法国社会党已经在战争期间消失，社会党为重建工作所作的努力，不可能赶上法共，法共利用抵抗运动发展了它的基础结构。同样，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在历史上属于社会党的地区破坏了他们的组织统一。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控制着重要的工会联盟，随着政治水平最低的大量工人参加工会，过去的共产主义战士或工联主义战士，都为共产党所左右，共产党控制着工会的中央机构，而后利用这种地位，去巩固他们对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在共产党曾经在抵抗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任何地方，共产主义的浪潮都十分强大；但在组织良好的庞大工会为社会党所管理的国家，共产党在1947年以后的进攻就会被阻止，他们的力量也迅速被吞蚀。

社会主义还由于不能打破它有限的社会基础而被削弱，尤其是在天主教国家，许多社会主义战士都反对教权，并且抵制像达尼埃尔·梅耶这样的领导人为吸引天主教派的抵抗运动成员所作的努力。然而到战后时期，天主教徒的工会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公司工会”，这些工会和新的“进步的”基督教民主党，都反对社会党对信奉天主教的工人阶级的侵蚀。

社会主义还由于支持被右翼攻击为“社会主义”的战时控制和配给制度而遭到麻烦；回到“正常状态”的愿望，被视之为提高这种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普遍被看作是匮乏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

社会主义衰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理论方面没有创新。社会主义一贯都是未来社会的代言人和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改良的工具，它不断地在这两种作用之间寻求平衡；一旦最初那种解放的热情消失，真正能够创立一个新世界的信仰破灭，西方的社会党就变得越来越温和，并且与现状同流合污；它们本质上已成了执政党。是不是参加政府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了一个策略问题。社会党人的行动表明，对于一个两极世界以及美国对欧洲的统治，似乎没有另外可供选择的方案，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具有社会福利计划的混合型计划经济，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后答案；他们认为，50年代末的丰裕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需要作一些小小的变革。正如反映这种思想状态的乔治·利希特海姆所写道的：

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社会中，“保守主义”意味着不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农业方面），而维护中

间阶级的价值和标准，例如家庭所有制、教育特权，以及与个人占有财产有关的各种有利条件。“自由主义”可能逐步要求计划经济——远远离开了科布顿或格莱斯顿的正统学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关心低工资收入者的状况，无论如何，既然经济保持着充分就业，那么，抛弃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目标就是不言而喻的；典型例子是在社会民主党管理下的斯堪的纳维亚，不过，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也已经表现出了步其后尘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福利增加导致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锋芒，所以，最后只剩下少数工联主义者和其他热心人，去维持那纯真信仰的火炬继续燃烧。然而，把政治气候的这种变化，归结为工人或他们的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化则是一种误解；事实在于，已经不再可能描绘这种社会为资产阶级社会，尽管它仍然可能是资本主义的。^①

这种态度和相信“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致的。回顾这个时期，社会学家沃尔特·科皮阐述了为瑞典社会民主党造成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对经济成长战略的极大依赖性，有时候使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似乎成了技术构成的部分，把

* 理查德·科布顿(1804—1865)是一个英国工厂主，19世纪中叶自由贸易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是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于1868年至1894年连任英国首相，并且实行过一些不彻底的改革。——译注

① 乔治·利希特海姆，《新欧洲》，纽约1964年版，第185—186页。

经济成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对工人运动来说，要把政治妥协与明确的未来目标结合起来，证明也是困难的；它的领导都全神贯注于日常的政治职责。该党还面临着为按照经济民主方向继续社会变革而提出发展纲领的困难。在许多选民的眼里，已经逐渐把社会民主党和妥协政策与成长政策等同起来。社会民主党还倾向于维护这些政策的多数方面、那些在潜在的支持者中间造成灰心丧气的方面……

资产阶级政党逐渐接受已经颁布的福利措施，使社会民主党在若干改革派政党中，似乎成了唯一一个有能力竞争管理现存社会的权利的政党。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强调这些妥协政策的某些消极方面，特别是迅速城市化、地区不平衡发展、集中化以及与环境核能有关的问题，自60年代末以来，它们不仅保持着、而且增加了对它们的政治支持……

这里，根据瑞典的经济所作的说明，似乎也有助于解释战后时期其他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遇到的困难。①

与现在的社会秩序保持一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也不符合任何激进的社会主义观点。社会主义者希望使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吗？在德国，舒马赫去世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重申致力于混合经济；差不多在同时，该党结束了它对重新武装

① 沃尔特·科皮：《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工人阶级》，伦敦1978年版，第322—323页。

德国的反对，变成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忠实支持者。学说方面的这种变化，使它赢得了政治地位，并且最后取得了政权，但是，也在党的组织和比较激进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之间，奠定了矛盾不断深化的基础。

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至少使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然而在多数国家，这种情况却从未发生过。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这种鸿沟已经非常巨大，例如居伊·摩勒，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明重新征服殖民地是正义的。在多数社会党中，理论生活毫无价值，知识分子不受欢迎。在法国，非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非常瞧不起法国社会党，他们都转向了比较小的组织和运动。

社会主义的信誉还由于殖民地问题而遭到破坏。过去，社会党人经常慷慨陈词，反对殖民主义，尽管许多人相信殖民主义是提高土著居民文化素养的一种手段。总的看，欧洲社会党很少注意殖民地世界发生的情况，在比利时，1956年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确实讨论了刚果问题，但是，连独立这个字也没有提到；社会党人的行动表明，似乎并不急于给予刚果人以“学习实行民主的学徒机会”；在1959年发生暴乱时，社会党要求立即给刚果以独立，而刚果却毫无任何准备。社会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对现代世界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在共产主义运动弱小的国家，战后社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在选举方面是有利的，然而即使在这些国家，过分和现行制度一体化也是危险的。到60年代末，有一种感觉已经出现：西方世界尽管丰裕，但它新确定的政治稳定、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福

利制度，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青年人已由于越南问题而变得心烦意乱，他们质问政府，甚至是社会党的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反对美国介入的立场。对于那些从30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意识形态的终结似乎是一件幸事，但对年轻人却没有什么意义。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似乎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镇压性制度的一部分。1968年的5月事件，说明了青年人憎恨这种制度的深度，说明了社会党是多么严重地失去了和青年一代的联系；由于不进行更新，它们已经冒了被缓慢消灭的风险。这种更新会发生吗？

欧洲社会主义

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在核军备竞赛方面可能发生的情况。^①

必须对占有财产的权利提出挑战。^②

在我大约20岁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经济状况的真正深刻变化是不可能的；大的突破是，有可能通过适当的手段控制经济状况。今天，我们又一次陷入了这样的争论之中，从20年代以来，我一听到这些争论就毛骨悚然。^③

① 迈克尔·富特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②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③ 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我们还没有学会当一个世界公民。^①

1968年以来欧洲社会主义的变化，必须根据其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在国际方面，这个时期是以缓和的兴亡为标志的，对阿富汗的侵略，对波兰的镇压，伊朗危机，苏联军事能力的增长使美国的霸权终结，以及关于里根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的看法，都有助于在欧洲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人们认为，俄国比以往更具有威胁性，美国也更加变化莫测。

在西欧，这个时期的标志是欧洲部分统一的感觉的出现和接着衰落。经济一体化进展迅速，英国和若干其他国家都加入了共同市场；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政权崩溃了，整个西欧第一次生活在民主政体之下。

欧洲议会经选举已经产生，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似乎也是可能的，然而，欧洲还远非一个政治统一体。统一的感觉是微弱的，例如，英国在接近共同市场的过程中仍然动摇不定；为了有助于稳定这里的民主政体，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政治上虽然是明智的，但对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工业国来说，经济方面的代价似乎太高，1973年的石油危机表明，在困难时期，欧洲的倾向是按照民族主义的方针作出反应；10年之后，1983年12月和1984年3月的连续两次欧洲经济共同体最高级会议，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即使在直接选举之后，欧洲议会也还是没有权力。不过，最重要的在于，欧洲还没有选择发展它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能力（尽管法国有自己的威慑力量），因此，欧洲在军事上不得不仍然依赖美国，

^① 热夫·朗斯在作者采访时的谈话。

或则是走向中立与和平主义，从政治上看，这是荒谬可笑的。然而，某些没有经历过德国占领或马歇尔计划的人，某些只是在越南战争时代之后才知道美国的人，却把两个超级大国相提并论，甚至视美国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围绕国际博物学家联合会的争论，表明了个别社会党内部以及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分歧。简言之，欧洲不可能构成为第三种势力，因为它不具备独立的军事潜力，而只是痛恨它的依附性。

随着缓和的终止，欧洲的丰裕状态也结束了。长时期的经济迅速增长已到尽头，由于越南战争，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飞涨，以及由于日本、尔后是第三世界削价和欧洲与美国争夺市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西方经济的固有问题恶化了。

经济下跌使负有责任的政府不受欢迎，无论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似乎都没有实现“一个国家的繁荣”。挪威、丹麦和荷兰社会党的内阁部长们下台了，法国和瑞典的社会党当政了，尽管奥地利的经济状况总的看是好的，但社会党的政府也已经削弱。基本上是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经济失败才得到政权的密特朗政府，很快也因为它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失败而遭到了谴责。正像在30年代一样，社会党人对经济危机似乎提不出任何答案；他们曾经设想，战后的混合经济制度将会充分理想地发挥作用，以支撑福利国家那复杂的上层建筑。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必不可少的则是，或者削减社会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干预经济生活，或者只是修修补补，希望繁荣重新归来。

缓和的终止和繁荣的消失的巧合，造成了欧洲社会主义的统一性的危机，促进了两极分化，并且有助于加强某些社会

党内部的左翼势力。例如在英国，工党向左发展（至少，按它自己的标准是这样），一度是局外人的迈克尔·雷特被选为党的领袖，但富特很快就由于要努力保持工党的团结而心事重重；诚然，富特是坚持退出共同市场（不过，这历来都不完全是一个左派或右派的问题）、坚持国有化以及反对在英国土地上有核武器的，但这些都是老问题。本*和“死硬的左派”不同，他坚定地支持旧的议会传统，他认为工党是一个政治党派；本希望使工党边缘化，使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同质化。

激进化的问题在德国也出现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左派的控制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当自由民主党在1983年改变联盟时，施密特辞职，为左派和绿党更能接受的一个党的领导人所取代。此后以经济问题为基础的选举，被搞成了一次是否在德国土地上部署核武器的公民投票；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新式导弹的过程中，这次选举把他们向前推进的距离，可能要比他们领导人所实际打算的更远。在荷兰和比利时，欧洲导弹问题证明也是一个导致左派激进化的问题。但左派的反对缺乏任何现实的选择方案，它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恐惧和遭受挫折的反映，但它没有任何政策；就德国而论，它带有某种舒马赫式的民族主义味道。

如果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仅仅获得了一部分欧洲意识的感觉，那么，欧洲社会主义的情况便也是如此。至少从外观上看，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欧洲社会主义，玫瑰花已经取

* 安东尼·韦奇伍德·本系前工党执委会委员、副主席，工党影子内阁贸易和工业发言人，并曾任英国政府工业大臣、邮电大臣和能源大臣等职。——洋注

代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党的标志；社会主义表现出一幅更为人道的、或者起码是更为年轻的面孔，出现了像费利佩·冈萨雷斯这样的年轻领袖。社会主义已经装潢得更加理想了，社会党国际也似乎更加引人注目了，但在光泽的表面之下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呢？

要为欧洲社会主义找到一个共同标准是困难的。一般说来，欧洲社会主义力图与反教权主义决裂，从天主教徒那里以及从已经变得进步的过去那些天主教徒那里找到支持者。欧洲社会主义表示关心环境和生态问题，这意味着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认为经济集中是一个进步，认为生产率比生产的生态后果更重要——提出质疑；瑞典社会党之所以在1976年失败，部分原因就是他们鼓吹核动力。同样，社会主义把它的历史兴趣转向了妇女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就法国而论，欧洲社会主义意味着放弃雅各宾派政治集中化的遗产，和由于1968年5月风暴而突出出来的蒲鲁东式的分散化和自决保持一致。欧洲社会主义还包含着更多地注意第三世界的意思，这种注意表现在诸如勃兰特的报告之类问题中，而且，它还包含着在处理第三世界问题时要更多地独立于美国；社会党国际向第三世界那些并不属于它的党派开放，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物很快就和桑地诺主义者以及萨尔瓦多的游击队打成了一片；黎巴嫩的一个封建酋长也变成了社会党国际的副主席。同时，吸收熟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入党，使他们在党和政府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必要的。战前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常常是在党内或联盟组织中，特别是在工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或者，他们常常是记者、自学成才者，有时候是出身

于资产阶级的文人学士；现在，有知识经济学家、上层官僚分子以及技术人员变得更重要了，例如罗卡尔和舍韦内芒。欧洲社会主义也是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回答，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欧共产党独立于、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独立于莫斯科和摆脱马列主义的一次努力。

如何和共产党人打交道引起了极其不同的反响。例如，密特朗鼓吹与一个已经表明它既不属于欧洲共产主义，又不希望左派胜利的共产党合作；法国社会党人第一次开始从“共产党的家禽身上拔毛了”。在西班牙，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没落和分裂了。在意大利，新的领导人克拉克西实行一种和密特朗相反的政策，尽管克拉克西说他要成为意大利的密特朗，但是，他在其党内进行了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讨伐运动，并且拒绝与意共合作。社会党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应，似乎首先是由国家的政治考虑所支配的。

对于社会主义所宣称的它有解决今天问题的答案，80年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提出了挑战，引起了人们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新设想的实际情况的怀疑。人们一直在问，社会主义是否应该仅仅是另一个执政党；社会主义仅仅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能够继续下去，最近几年似乎是不清楚的。

接受本书采访的人，都以一种或多或少积极的态度参加了有关社会主义未来的激烈论战；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深信社会主义是一个人类可以实现的目标，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

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接受采访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表现

出极大的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从社会主义一词的一切意义上讲，它都确实是一种运动，是追求一个共同目标的工人们的大规模组织，而且也是历史向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运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固有结果。于本书中出现的瑞典和挪威社会党人在接受采访时，虽然他们的党都已经失去了政权，但他们仍然相信，一旦重新得到政权，他们就能够置社会和经济于原来的轨道上。特吕格弗·布拉特利曾经指出，本世纪剩余时间的首要任务，“就是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前进”，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话并不像听起来那样肯定和自信；这句话的意思是，以促进实现平等和寻找良机的方法去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将会继续下去。就这个方面而论，西格里德·埃肯达尔的活动集中体现了这个运动：在从工会和政治事务中退職之后，她现在的工作是把已经退職的人们组织起来。对自己的党具有类似满意感觉的唯一一个非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布鲁诺·克赖斯基；足以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曾经在瑞典度过了10多年光阴。

对社会主义的形势，接受采访的其他人却并不那么乐观。甚至在密特朗政府遭到沉重打击之前，达尼埃尔·梅耶就已经强调，密特朗的当选并不意味着“旧政权”的终结；密特朗政府不是社会主义政府。从最后分析看，社会主义包含着国家消亡，因为一旦人的本性得到改造，也就不再需要国家了；同时，过渡型政权的存在也有可能。梅耶的观点仍然接近于饶勒斯—勃鲁姆的人道主义传统，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一个人类和文化得以改造的过程；他的话暗含着一种意思：需要由从事政治活动退回到强调神秘观念。

热夫·朗斯也不满意，他由于比利时社会主义没有能够保持其旺盛活力、甚至未能保持其统一而心烦意乱，因为说法语和说荷兰语的社会党人已经分裂为两个独立的政党。按照较为广泛的标准，朗斯觉得，社会党人必须对第三世界的问题发生兴趣，他们必须成为“世界公民”。

在下文中争论最严重的两个人物是迈克尔·富特和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可能与10年前预料的相反，富特成了工党领袖；没有人责备他这样作是出于个人野心。富特作为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打算使工党的实践与其美丽言词相一致；他关于共同市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单方面裁军的观点是分裂主义的，富特表明他是一个遭受围攻的领导人。他企图在右派和中间派的支持下，执行党内左派的政策，但随着工党向着预料之中的灾难——选举失败的方向发展，显而易见，富特的地位未必能够继续下去。在某些方面，他的命运类似于过去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

对目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里卡尔多·隆巴尔迪。他同意梅耶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超越仅仅进行政治活动的范围；他责备克拉克西根据政治观察一切问题。而且，他企图提出一种以工人参加管理工厂和改变财产性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选择方案；从政治方面看，他希望与左派结盟，最终夺取政权，以便贯彻这种社会主义的选择方案。

在本书中接受采访的社会党人，在他们生活的晚期，都仍然在为把自己的经历的含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联系起来而奋斗着。让我们现在转向他们自己的叙述吧。

第一章 达尼埃尔·梅耶和 法国社会主义

引 言

自1921年以来，曾经有6个人出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达尼埃尔·梅耶便是其中之一，他领导该党走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地下斗争的和解放时期的艰苦岁月。

梅耶是在以让·饶勒斯和莱昂·勃鲁姆为典范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的确，勃鲁姆认为梅耶是他的政治继承人。但是，梅耶由于战后该党所遇到的困难而受到责备，他作为总书记于1946年为居伊·摩勒所取代。虽然梅耶在直到1958年离开党之前，都是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为该党制定政策的是摩勒，而不是梅耶。梅耶并不是唯一脱党的人；该党不仅失去了它的一些领导人物，而且失去了它的很多选民。1969年，它的总统候选人仅仅获得了4%的选票。只是在居伊·摩勒于当年被迫下野之后，一个长期的重建过程才得以开始，这个重建活动从1944年到1946年时期的梅耶理论中吸收了很多东西。但为了了解达尼埃尔·梅耶所代表的观点，我们必须首先简单考察一下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一贯既是一种具有革

命传统、又是一种具有改良主义传统的力量。法国革命为西欧的革命变革树立了榜样，“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就是由布朗基发明的，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研究，也是以1793年到1794年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为基础的。列宁主义能够在法国树立起来，似乎它并不是外部强加的东西。

另一方面，左派的思想总是吸引着中间阶级的激进分子。正如克雷孟梭所说的，“革命是一个集团”；第三共和国激进分子的格言之一，就是“不为左派之敌”。知识分子很容易使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义，这样的转变很可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和改良主义的概念。的确，对于勾画在法国土生土长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的轮廓，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路易·勃朗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作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80年代通过茹尔·盖得的努力才到达法国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社员，几乎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就是像接受了马克思观点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物饶勒斯，也具有大量法国土产的社会主义传统。对饶勒斯及其追随者来说，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逻辑扩大，社会主义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而不是从历史方面证明其正确的。

因此，社会主义既受无产阶级的，亦受中间阶级的影响；它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既产生了统一的愿望，也造成了分化的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产生的社会主义党派不少于5个，然而，许多工人却宁愿逃避完全为了革命工联主义的政治活动。建立不同社会主义党派的协调委员会的第一次努力，仅仅从1899年持续到1900年；通过第二国际的调解，1905年实现了统一，但1921年的图尔代表大会，却加速了共产主义者

(法共)和社会主义者(法国社会党)之间的持久分裂。*在许多国家,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裂,都产生了两个并不势均力敌的党;然而在法国,这两个党却一向都是十分强大的。

这种分裂并不表示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一刀两断,社会党历来都包括许多自认为自己是法共左翼的人们。的确,如果说共产党给人的印象是坚如磐石(有时是误解),那么,社会党似乎常常是范围广泛的各种派别的一个斗争舞台。使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分裂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的看法,他们对法共和苏联之间关系的看法,他们对党组织的性质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多元论民主的不同观点。

达尼埃尔·梅耶是在1927年参加社会党的,30年代,他成了该党日报《人民报》的记者和编辑。正像当时的其他许多青年人一样,梅耶由于拥护正义和世界和平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常常是粗暴的,共产党集中攻击他们的“兄弟党”。然而,在1934年2月6日的那次许多人认为似乎是流产的法西斯主义政变之后,共产党却来了个戏剧性的突然大转弯。他们号召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反对法西斯主义,号召西方民主党与苏联结盟。首先在法国尝试的这种人民阵线,后来作为范例提供了其他国家。年轻的社会党是如何提出面对扩张主义德国

* 1905年建立的社会党,官方称之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1年分裂之后,社会主义者保留了这个名称,1971年改名为社会党。

的现实的和平主义和国际合作理论的，以及人民阵线对他们有什么重要意义，梅耶的陈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此外，他还为我们十分突出地概括介绍了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莱昂·勃鲁姆和保罗·富尔。

在法国社会党与法共分裂之后，勃鲁姆与富尔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饶勒斯的人道主义传统和盖得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成了法国社会党的基础；勃鲁姆充任议会和理论方面的领导者，富尔作为总书记管理党的组织，他们的道路在1934年开始发生分歧。对于和共产党人合作，富尔犹豫不决；他作为总书记的主要任务毕竟是要重建一个和共产党对立的党。相反，勃鲁姆支持人民阵线。到1936年，两个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发生分歧。尽管勃鲁姆相信裁军，但他也意识到需要有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盟；富尔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关于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的开始，达尼埃尔·梅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注目的梗概。1940年失败之后，保罗·富尔开始与维希政权合作。梅耶在这个采访记中关于富尔的评论，和热夫·朗斯对亨德里克·德曼的评论联系起来，对于某些社会党人在战争期间与法西斯政权的合作，提出了一种看法。

在战争时期，梅耶是以地下党领导人的身分出现的。解放以后，勃鲁姆希望梅耶革新旧的社会党，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去影响它；梅耶梦想有一个摆脱了与法西斯相勾结的人，摆脱了观潮派并从旧的反对教权的宗派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党。

梅耶当选为总书记时，正是社会主义者的希望高涨的时

候；莱昂·勃鲁姆本人不就说过社会主义是“时间的主人”吗？但这些希望证明是没有基础的，党的组织也几乎等于零；共产党人控制着工会，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首脑，阻止社会党颁布其结构改革法令。社会党希望，法共在抵抗运动期间已经发生变化，希望有可能与法共联合行动，甚至在组织上联合起来，这也是一个幻想。由于害怕单独与一个比较富于生机的共产党联合执政，所以，社会党在1946年到1947年，坚持与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三方执政；然而，在对付灾难性经济形势的过程中，三方执政也是不成功的。只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才可能最终使法国摆脱经济危机。一连串选举造成了法国社会党力量的衰落，勃鲁姆和梅耶的领导遭到许多左翼战士的责备。战士们日益增长的失败情绪，导致1946年8月底至9月初的代表大会，否决了梅耶的《伦理道德报告》；摩勒取代梅耶成为总书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勒的上任既没有带来选举的成功，亦没有使社会党向左变化。的确，在不到一年之后，当拉马迪埃总理由于共产党的部长们破坏政府团结而向他们开火的时候，法国社会党按照微弱多数人的决定，继续留在了没有共产党人的政府中。此后，法国社会党参加了由人民共和运动和其他中间派政党组成的“第三势力”政府，直接反对法共和新戴高乐主义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冷战在共产党和政府之间造成了激烈冲突，包括1948年的强大罢工和对罢工的镇压。法国总工会分裂了，一个很小的社会主义集团形成了它自己的同盟、工人力量联盟。冷战也推动了法共重新回到强硬的斯大林主义的模式上去，而法国社会党却越来越严重地失去了

它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的形象。

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数都已经向右转化。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社会党还可能考虑参加政府多长时间呢？足以令人感到兴趣的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摩勒，却继续支持参加政府；1950年以后，梅耶反对这种意见。

一系列问题使梅耶和党的领导发生了冲突。梅耶强烈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尽管法国社会党由于摩勒的坚持而支持这个共同体，但是，议会成员中社会党人的半数，包括梅耶在内，都投票反对，梅耶差一点由于这种攻击而被开除出党。此外，到1965年，梅耶开始反对摩勒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摩勒在1956年初成为总理之后，改变了他过去的立场，变成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一名“主战派”。1958年4月，梅耶辞去了他的议会席位。1958年5月13日以后，摩勒又赞成法国社会党支持戴高乐重新当政，这对梅耶以及其他像爱德华·德普勒和罗贝尔·韦迪埃这样的人是致命的打击，他们离开了党并创立了独立社会党，后来又与其他集团合并，组成了统一社会党。到1970年阿兰·萨瓦里取代摩勒之前，梅耶又回到了已经确定了新名字和新领导的社会党内。虽然梅耶在社会党指导委员会中占有一个席位，但他目前却限制自己卷入党的政治活动之中。

狭义地说，达尼埃尔·梅耶脱离法国社会党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结。1958年，当他成为人权联盟主席时，梅耶仍然在为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所维护的一些理想而奋斗。到70年代，他已经成为法国左翼中德高望重的老者之一，继续保持着他的良师益友莱昂·勃鲁姆的传统。1982年，密特朗总

统指定他为最高司法委员会成员，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主席。正像这个访问记说明的，他一直在思考着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

达尼埃尔·梅耶访问记

达尼埃尔·梅耶：

我于1909年4月29日出生在巴黎第12区。我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有点像店员，他做零七八碎的工作，有很多麻烦。我母亲很小就成了孤儿，她4岁丧父，8岁失母，在由她兄长和姐姐抚养了几年之后，最终被送进了罗思柴尔德孤儿院，在那里她被培养成为一名教师；她13岁进入孤儿院，26岁结婚，离开那里，换句话说，她没有个人生活。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了肺病，当时我才5岁，我12岁时便失去了她。我父亲一家从一开始就是法国人；我母亲一家是阿尔萨斯人，在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时，他们拒绝成为德国人，所以来到巴黎，我母亲就是在巴黎出生的。

我父母亲从来不参加宗教活动，尽管他们和那些多少参加点宗教仪式但并不参加宗教活动的犹太人生活在一起，例如，我父亲在赎罪日不吸烟，但却吃饭。

我是靠自学获得知识的。在母亲去世前，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在我一生中，我只是在母亲故去到14岁之间上过一年半学；我14岁开始工作，生活很困难，父亲无法为我付学费，尽管我多少还有一些奖学金。

我之所以参加工人运动，是由于在塞寇一万泽蒂事件时，

我为它的悲惨结果所震动，是时，全世界有很多运动都呼吁不要处死塞寇和万泽蒂。^{*}我开始参加由人权联盟^①组织的示威游行，我记得在古老的特罗卡代罗剧场的一次集会，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莱昂·儒奥，亨利·多列士，^②以及人权联盟主席维克多·巴什都在场，这导致我于1927年9月18岁时加入了这个联盟。

在准备1928年竞选时，我所居住的巴黎第20区的代表莱昂·勃鲁姆来作讲演，这个讲演的专业性相当强，但是很有意思，年轻孩子大概是听不懂的，因为它考虑的是经济和金融问题。当时，我觉得需要主动一点，我鼓足勇气走到讲演者莱昂·勃鲁姆本人跟前，问他我参加社会党必须做些什么。他转向第20区的支部书记，我还记得是一个叫帕热斯的人：“帕热斯，你看这个年轻人。”这就是我如何在1927年12月既参加了党，又参加了青年社会党。

问：当时你做什么工作？

答：我是北部生产亚麻制品、防尘服装、毛巾和床单的纺织工厂的推销员，我必须走很多路，我让小胡须长长一点，并且穿上硬领上衣，以便使自己看起来老成一点和严肃一点。当我成为党员和青年社会党员的时候，我力图在巴黎找到一个稳定的固定职业。在巴黎，青年社会党的人数不多，整个地区

* N·塞寇和B·万泽蒂为居住于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因思想激进，被指控同谋杀案，因此被判死刑。——译注

① 人权联盟是一种致力于维护在1893年德雷弗斯事件中确定的人权和自由的组织，它在政治上和非共产主义的左翼党派相联系。

② 亨利·多列士（1891—1966），律师和左翼活动家，参加过很多政治活动。

大约有 400 人。他们显然缺乏支柱，不是我自满或骄傲，可以说，仅仅几个月，我就已经成为一个领导人了；反对派可能会感到吃惊的。1928 年 4 月或 5 月，我就当上了塞纳省青年社会党宣传部门的代表。通过巴黎市一个社会党议员的兄弟搭桥，我在塞纳县找到了一个当助理员的职业，在失业部工作，一天到晚整理文件；我干这个工作直到服兵役为止，也就是说，直到 1930 年。从 1933 年开始，我是《人民报》的一个见习记者；两年以后，委派我负责工会和社会事务部。所以从 1933 年起，我最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是我所喜欢的职业，它鼓舞着我，使我有可能会参加政治活动。

问：你当时受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影响？

答：我读了很多东西，在我参加社会党和离开党去服兵役之间的整个阶段，我衣袋里总是装着各种小册子或书籍，我每次外出到会议上去讲话，都要在地铁里读点东西，我有一个读书的嗜好。在文学方面，维克托·雨果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埃米尔·左拉对我的影响最大，首先是维克多·雨果的叙事作品，特别是《悲惨世界》，那现时代骑士精神的伟大画卷，确实令人鼓舞，充满了激情和人性。在社会主义方面，把问题阐述清楚的，大多是让·饶勒斯，其次是莱昂·勃鲁姆每天写的文章；这些东西都是以极其朴素的风格写成的，清楚明白，使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即使是最复杂的问题。不过，足以令人惊奇的是，我非常喜欢讲演艺术，保罗·富尔的雄辩能力对我很有影响，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其次，我也为莱昂·勃鲁姆的论证所影响。换句话说，在精神方面，勃鲁姆的影响是主要的；但就驾驭听众而论，就我在一生

中几乎都极其喜欢的那种需要口才的音乐而论（尽管我在较长时间之后的现在才发现它没有多大价值），正是具有这一切能力的保罗·富尔这个受欢迎的、这个具有政治倾向的雄辩家影响了我，尽管他的雄辩可能包含着一些夸夸其谈，甚至是蛊惑人心的东西。

即使在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对听众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也许正是因为我年轻。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我20岁那年，我曾经企图迫使就一个名叫巴吕的右派代表进行讨论，这个人正在巴黎市区的塞纳—瓦瑟地区进行竞选。我力图以第14名发言，前13名都没有能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①他们听到了我的发言，我猜想，我年轻必然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所以，我由于听众的相对保护性好奇心而得到了好处：“我们要让人们听到这个小伙子的声音”。不过，即使我现在叙述这一切，也不是为了夸耀50年前的成就，而是因为这种往事的回忆是非常有趣的。

问：你当时与保罗·富尔的交往多吗？

答：他向莱昂·勃鲁姆提出，他聘用我为《人民报》的一个编辑。

问：令我吃惊的是你与保罗·富尔是如此亲密；对于他的政治变化，即导致他最终在维希国民议会中接受一个席位的变化，你作何种解释？

答：我是从1934年开始认识保罗·富尔的变化了的，那是在普遍公认他正在走向歧途和进行自我欺骗的前几年；我认

^① 在法国，出席反对派某一候选人的会议，并且尽力迫使他进行争论，这是一种普遍的习惯，被称之为“制造矛盾”。

识到这一点，是由于我就要详细向你讲述的一个特殊事件，这件事有点偶然，而且相当不起眼。在《人民报》里，我的办公室就在总编室的入口处，这里有一间屋子很窄，形成了通向莱昂·勃鲁姆办公室去的一条过道，莱昂·勃鲁姆经常穿过这里，陪伴人们进出他的办公室。在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游行示威之后，在左翼党派、工会组织等的领导人之间，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莱昂·儒奥以法国总工会（当时它还是一个非共产党的组织）的名义，决定2月12日举行总罢工，以此作为对6日事件的回答。莱昂·勃鲁姆打算在总罢工的意见上加上示威游行，他认为，对于罢工工人来说，呆在家里不合适，他觉得，他们必须肩并肩地上街示威，表明人民要制止法西斯主义的意志。

一个偶然的机，莱昂·勃鲁姆和保罗·富尔穿过这个由于其细长而变成了通道的房间，因此，简直就是在我面前谈起了这个问题，一个微不足道的、驯服的旁观者听了、并且听到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根据其资历，根据他说话那种脆弱的声音，根据他所表达的感情、态度和进行劝说的论点等，莱昂·勃鲁姆没有保罗·富尔那么强硬。相反，保罗·富尔是一个说话声音很大的人，是一个呼吁群众的人，他极力主张由群众去创造显赫的业绩，甚至，也许是采取相当粗暴的行动。大为使我惊奇的是，我听到保罗·富尔说：“不，决不是游行示威，我们决不能进行任何游行示威，不，不，我不要任何游行示威。无论如何，社会党将不召集游行示威。”《人民报》主编莱昂·勃鲁姆以一种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总是非

常谦虚、但又带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口气对他说：“那好吧，我亲爱的保罗，《人民报》将号召游行示威”。换句话说，作为《人民报》主编，他个人对号召游行示威承担全部责任。就是在这一天，我改变了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我认识到，从最后分析看，保罗·富尔并不是胆大无畏的人，而是一个懦夫；当一个人有公众站在他一边时，他能够把广大听众激发起来，这是一回事，要他自己作出严肃的决定，则是另一回事。在图尔分裂之后，富尔表现出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极大勇气，当时，他坚持要复兴社会党；在巴黎郊区的共产党地区讲话，谴责布尔什维主义，都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但他没有那种包含在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之中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勇气。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非常确切的时刻、1934年2月9日或10日，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富尔并不是我一向所认为的那种人，虽然我还没有预料到他后来会干什么。

问：你受过马克思或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吗？

答：受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较大影响。不要忘记，我这一代人是没有赋与经济问题以很大重要性的一代人，至少在法国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我们懂得政治问题，对经济问题不是很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就是现在，我也必须为了解经济和金融过程而作出努力；因此，我没有受过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直接、甚至是间接的影响。

问：然而，你通过饶勒斯和勃鲁姆学到了不少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东西吧？

答：是的，通过饶勒斯，通过莱昂·勃鲁姆，通过我读的

讲话，以及饶勒斯和盖得的争论，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问：你如何理解30年代的大衰退？你认为怎样才能消除这种衰退？

答：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你必须考虑到国际和平的希望去确定我这一代人的处境，你必须记住我们所喊的口号：“永远不要战争”，“再也不要战争”，“再也不能有这种战争”。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就是通过法国和德国的和解而得到和平。结果是，当1930年迫使我们开始面对经济危机时，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不是经济危机的世界范围的特性，或者是它的法国特性，而是经济危机以及德国与法国的失业，对法德关系问题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共产党人认为，这个时期的失业者是造反派，是革命者，是能够改造社会的人民，与此相反，我们当时认为（毫不费力地），这些失业者将是法西斯主义的雇佣军。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的确，我认为除了某些和平主义者以外，所有的青年社会党人都懂得），这个新的德国、希特勒的德国，将不会成为昨天的德国，我们必须迅速改变看法。鉴于我们一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所以相反，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立场；鉴于我们一直支持与魏玛共和国达成谅解，所以就不可能与希特勒的德国实现谅解；鉴于我们一向主张，在某些时候进行差不多被认为是单方面的裁军（丹麦已经尝试单方面进行裁军，我们也为此而冲昏了头脑），所以，一天又一天面对这个新德国，不仅不裁军是必要的，而且相反，还必须重新武装起来。这就是说，我们还是根据它们的政治后果去看待经济问题的。

问：这种变化并不容易，某些社会党人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有些社会党人从未改变看法。

答：显然是这样的。

问：你对1934年2月6日事件如何分析？那是一次法西斯主义的政变吗？

答：对，那是一次反议会的政变，因为那些游行示威的矛头基本上是指向议会的，它们反映了一种要使法国按照类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治方向发展的愿望，即使不是使法国按照类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样的人的意志发展的愿望。1934年2月仅仅是在1933年1月之后的一年时间，希特勒才仅仅作了13个月的德国首脑；人们有一种感觉，在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希特勒分子，以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之间，有某种同谋关系。所以，完全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能够比较快地着手改变我们对德国的态度，因为对于我们在法国的对手，我们是很了解的。简单而肯定的原因在于：既然我们在法国的对手维护这个新德国，那就是确证，这个新德国是坏德国。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人民阵线的产生。真有意思，正是在让-多兰特大街的这座楼上，就在我们现在谈话的这间屋子里，曾经在这个联盟的主席维克多·巴什以及作为总书记的埃米尔·卡恩主持下，召开过多次人民联盟会议。我认为，人民阵线的基本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不把自己局限于和人们的权利相抵触的某种政治纲领，而是增加一个本质上是经济的纲领：社会工作，每周40小时工作制，假期支付工资，成立小麦办公室^①，法国银行国有化等，使反对经济危机的斗争

有可能进行。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并且宣传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这种政治学被看作是经济学的表现形式。

问：就其国内政策而论，人民阵线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答：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就严格的政治领域来看，人民阵线瓦解了法西斯主义的联盟，制止了这些联盟计划采取的行动。就工作日而论，它完全像在一次真正的革命中一样，彻底改变了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假期支付工资的革命性质，现在是不可能领会的。每周工作40个小时，那就是说，把可能在一个企业或工业部门工作的时间，分摊给更多的人，那就意味着莱昂·勃鲁姆所说的，支付给工人阶级一部分由于他们的产品而应该归于他们的某种形式的红利。官方认为，法国在1936年是改革，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革命，从某种程度上看，人们的意思是，革命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很少几天内，生活完全改变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工会的权利得到了承认，也就是说，事实是一个工人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个人单独与管理机构相对抗。通过集体与资方协商，通过工会的支持，以及在工会和管理机构之间进行讨论，工人得到了保护，他再也不会被孤立，他再也不会是那种一天又一天遭受攻击的人。我是从1933年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在巴黎地区的某些工厂中，例如在雪铁龙的一些工厂中，只要它们看到工人用一份左翼报纸包午餐，这个工人便立即被解雇，而且不是《人道报》或《人民报》，只不过是一张《劳动报》，

① 这是国家设立的一个办公室，其目的在于为农民稳定小麦价格。

一种自由主义左翼的报纸，如此而已。

当所谓马蒂翁协定（管理机构与工会之间的协定）在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结束的时候（这些协定是在总理府所在地马蒂翁宫谈判进行的），恰巧在工人代表团中有一位在一家企业工作的妇女，而这家企业的老板就在资方代表团中。对这个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个老板毫无所知，当她告诉老板她在工厂的收入时，老板满脸通红，结结巴巴，他非常吃惊，他否认如此少的工资，否认他支付工资吝啬的特点。集体协商以及承认组织工会的权利，也许是给了工人阶级以他们到当时为止还不知道的主权和尊严。在这一方面，这是一次革命。

问：在党内，你当时关于对外政策的立场是什么？

答：我属于齐罗姆斯基领导的“社会主义战线派”，也就是说，属于抵抗希特勒主义的潮流，拒绝任何同谋关系，即使是软弱的关系。但是在当时，齐罗姆斯基和勃鲁姆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很多分歧，就像在保罗·富尔和马尔索·皮韦尔之间有很多分歧一样，尽管是以不可能设想其范围的和平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问：在1934年到1939年期间，你参加了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你代表你的联盟，代表你的一派发言，反对新社会主义，反对慕尼黑协定，但你还远非一个党的领导人，你还很年轻。你是在抵抗运动期间成为一个真正领导人的，你乐于谈谈抵抗运动的经验吗？

答：和多数法国军队不同，我并没有被俘虏，我是幸运的。在1940年7月底安顿好我的妻子以后，我们就决定去问一问能否找到可以信任的党员，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觉

得，应该到英国去，虽然并不知道在那里能够干些什么有用的工作；这只能表明我们是反对那些新制度的。所以，我们到蒙吕松去看望了马克斯·多穆瓦^①，那恰恰是在他被杀害前一年的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不知道我们能够干什么，并且补充说：“此外，你们都是犹太人，你们会遇到特殊困难”。我们去南方，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最终穿过比利牛斯地区到达伦敦。我们从党的一个战士絮藏尼·比松那里了解到，莱昂·勃鲁姆在图卢兹地区，我们到达那里，问他我们如何才能到英国，如果他知道怎么办的话。尔后他告诉我们，就他自己而论，的确有人请他去，但他不打算离开法国，因为他必须——我要尽力回忆起他的确切说法——最大限度地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在公共集会上，或是在法庭前为人民阵线进行辩护，一旦有必要的話。这是真正的先见之明，因为他预料到了里奥姆审判^②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关于我们，“我不了解你们的军事能力，我有某种印象，你们将是两个需要培养的特殊发言人，既然这里可能有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要夺回整个舆论界，要建立一个地下党，等等。”

后来，我们到比利牛斯地区休息了几天；然而，我们必须

^① 马克斯·多穆瓦(1881—1941)是犹太籍社会主义战士，1937至1938年曾任内务部长，后被维希政权逮捕，并且被一个称之为卡古勒的秘密法西斯组织的成员杀害。

^② 里奥姆审判是对第三共和国领导人的审判，其中包括维希政权在1942年2月10日至4月11日对勃鲁姆、达拉第以及甘默林的审判。在审讯之前就被投入狱中的这些被告，被指控对法国的军事失败负有责任，他们的辩护从某些方面有助于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信誉。这次审判为德国人所打断，他们为利用审判去决定法国沦陷的原因，而不是谴责法国发动战争而暴跳如雷。

去看一下莱昂·儒奥，他在塞特附近，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新情况。正当我们在比利牛斯地区休息的时候，我们接连听到了樊尚·奥里奥尔^①和莱昂·勃鲁姆被捕的消息。尔后，我们又到马赛，在那里和弗利克斯·古安取得联系，他是罗纳河口省伊斯特勒地区的国民议会议员。我们去聚会的目的，虽然在于寻找那些曾经在1940年7月10日投票反对贝当的社会党议员……^②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领导一个小小的地下行动的经过，特别是亨利·里比埃，他此后领导着一个称之为北方解放运动的解放运动。我们走遍了法国，从一地到另一地去看望同志们，并且提醒他们，等等。我个人也曾经14次到布拉索尔去建立联络点。勃鲁姆的儿媳和未来的妻子，都在里奥姆的瓦阿热斯旅馆工作，这个地方距离在整个里奥姆审判期间囚禁莱昂·勃鲁姆的布拉索尔很近。勃鲁姆通过他的儿媳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儿媳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女人，头脑敏锐，她就像一个军人一样完成了任务。当时，我们还在地下出版《人民报》。

当我们必须为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选派一名社会党的代表时，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安德烈·勒·特罗凯，他在里奥姆审判期间一直是莱昂·勃鲁姆的律师之一。当他出发前往伦敦时，又选上了我；我是在两个月亮之间，正如我们常说的是在

^① 樊尚·奥里奥尔(1884—1966)是一个社会党战士，1936至1937年任财政部长，1947至1954年任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② 1940年10月召开过一次议会联席会议，它的目的是取消共和国，而用在贝当元帅领导下的法兰西国家的名字代替。在158名社会党议员中，投票反对这种改变的只有35人，否决票共有80张。

1943年4月和5月之间，特地赶往伦敦的，在那里我完成了三重使命。首先，我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卡米尔·胡斯曼重申，法国社会党忠于这个国际。其次，我向戴高乐确认，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我们和他站在一边，他是这种斗争的旗帜和领袖；我还和他讨论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别是讨论了莱昂·勃鲁姆提出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是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原型（莱昂·勃鲁姆称之为法国抵抗运动执行委员会）。第三个使命、同时也是最鲜为人知和最为微妙的使命，就是缓和伦敦社会主义组织的内部分裂，他们是围绕亲反戴高乐主义者而分裂的。自然，他们都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有人说，戴高乐是未来的专制者，相反，其他人则说，他将能够使我们挽救和重建共和国。

问：你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答：我的意见略微有一些差别。我认为，在法国历史上，戴高乐代表着一个必须予以利用的时期，严格的说，他是唯一一个、完全是唯一一个能够把抵抗运动统一起来的人，他能够代表法国说话，我们支持他是绝对必要的；另外，我们希望一旦我们回到巴黎，就能够看到他发挥作用。根据我们的感觉，在我们看到罗斯福开始有一些过分支持吉罗^①的时候，我们甚至给罗斯福写了信，显然是秘密写的。我在伦敦停留的7个星期内，我想，通过一篇文章是十分恰当的，它将是社会党对法国人民的一个宣言，一个秘密的、但具有最广泛宣传作用的宣言。我要求在伦敦的几个同志写若干部分，尔后，我一个

^① 亨利·吉罗将军(1879—1949)是受美国支持的自由法国领导人的一个候选人，他反对戴高乐，不关心“政治”问题；很快在1943年被戴高乐击败。

人留在伦敦郊区的特威克南写完了这个文件。我接连提请伦敦的社会党人、南部地区的社会党人，以及地下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宣言，它成了我们在地下《人民报》上发表的一个宣言。我的使命完成了。

问：共产党人混进了抵抗运动，他们同时又开创了他们自己的运动。你是否为社会党人没有创立纯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感到遗憾？

答：不，我一点也不遗憾，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建立一个军事组织的物质手段；隶属于那些围绕抵抗运动成员的整体而组织起来的单位，要比有个人的军队更加忠诚。不，不，我丝毫不后悔，我说的意思是，如果要重新演习一次的话……让我们希望不会如此，而且就结局而论，恰恰也必须这样做，那是抵抗运动统一的标志。

问：然而，共产党人却从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中捞到了好处。

答：他们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这样做的。当一个人和那些不忠诚的人们打交道时，他们的不忠会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的。

问：我们最后谈到了解放运动。某些人批评你进行了过于严格的清党活动。

答：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我们把所有在1940年7月投票拥护贝当的那些当选的官员，统统清除出党；这似乎是我们能够做的最起码的工作。你认为这太苛刻了吗？

除了若干特殊情况以外，我们宣布，所有那些投票拥护贝当的人都要出党，只有两个人例外，他们投了贝当的票，但此

后很快就参加了抵抗运动。我们研究了那些没有出席那次会议的人们的情况，我们保留了多数由于他们不在维希而没有机会投票的人。解放以后，党和抵抗运动时期的党再不同了，因为有大量在战争期间什么也没有干的党员，又重新回到了党内；他们觉得，他们非常近似于那些被清除的国民议会议员，因为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干；如果他们是国民议会议员，他们也可能投票拥护贝当的。尽管如此，如果历史重演，我确实完全会再次开始……

问：党在解放运动中的状况如何？

答：什么都没有留下，地下党没有组织机构。党是有人负责的，但为了安全的原因，他们在地下时期有意地不互相了解。在有些地方之所以保留了党的组织，原因就在于战士们在战争时期什么也没有干。现在，撇开政治方面的考虑，我不具备那种管理的气质；我不是一个理想的行政管理书记，它没有使我产生兴趣。

问：党内的抵抗运动成员和许多老战士之间很难相处，是吗？

答：显然是这样。不过，他们责备我们也还为其他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会有一个决议——我们从没有采取过片面的、强制性的措施，在评价新党员的资历时，要考虑参加抵抗运动的时间；根据过去的章程，要在选举中作一个候选人，需要有三年党龄，要作为常务管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需要有五年党龄。自然，所有在战前曾经是候选人、在战争期间又什么也没有干的那些人，尽管他们企图再次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为他人所取代了。

问：对于你为吸收基督教的抵抗运动成员所作的努力，也有反对意见；在70年代，这种努力比较成功地重新出现了。

答：的确，我的努力没有奏效。法国就有这样一种现象：一旦某些问题的进展不太顺利，反对教权的俗人便会提出把政权归还俗人，就像印第安人剑拔弩张地要宣战一样。你知道莱昂·勃鲁姆对1946年代表大会的讲话吧，对莱昂·勃鲁姆所说的意思，你会在这里找到解释。这个讲话说：“你们害怕，你们害怕妇女，你们害怕青年人，你们害怕革新，你们害怕，你们害怕……”某些党员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占有观念，他们害怕一切带有革新味道的行动。

问：法国社会党也有棘手的政治问题。自1945年2月起，戴高乐对社会党的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纲领，显然是敌视的。共产党人似乎很快就像他们在战前一样，成了你们敌对的同志，与共产党人的组织统一，或者甚至是联合行动，都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回顾过去，你认为对社会党所执行的政策，在选举中证明是不成功的政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答：老实说，我不这样认为。人民共和运动愿意失去其一部分选民，这是必然的，是我们所无力控制的；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民共和运动的创始人是站在左翼一边的。如果人民共和运动同意断绝与其右翼选民的关系，那么，三分制就会遇到某种困难局面；当然，此后便是欧洲防务共同体问题。

问：如果社会党推动戴高乐实行孟戴斯—弗朗斯的《经济和社会纲领》^①，情况也许可能发生变化。但社会党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了吗？

答：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只有奥古斯坦·洛朗^②认

识到了这一点。我们采纳了过多的灵活政策。我们能够影响戴高乐吗？我一贯认为，普列文^③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坏的人。如果社会党人坚决支持孟戴斯—弗朗斯，那么，戴高乐会屈服吗？或者，他还会站在普列文一边？我不知道；不过，这个问题肯定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假设。

问：你是党内所有那些感到不满的人攻击的目标。

答：他们差不多利用每一种论据，包括那些不成其为论据的评论，例如传播小道消息，说什么“党的领导人莱昂·勃鲁姆，党的总书记达尼埃尔·梅耶是两个犹太人”，是两个都有一点反对犹太主义的犹太人。自然，这些话从来都是不会在会议的讲坛上说的。

问：对你的攻击也就是对莱昂·勃鲁姆的攻击，你是从何时起和他接近的？

答：在战争期间以及以后。1945年以后，我们通常都每周去看他一次，差不多每天都通电话。

问：你是否在1945年就打算辞去总书记职务？

答：我应该听妻子的话就对了，她是唯一正确的人，她告诉我：“你已经当了一个时期的书记，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你不

① 战后，国民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打算更换钞票，以便调查由于通敌而牟取的利润，同时也阻止失控的通货膨胀；此外，围绕工业国有化，他还有一个重建法国经济的广泛计划。当戴高乐采纳了他的对手普列文的通过贷款而限制货币供应的计划时，孟戴斯—弗朗斯辞职了。据说，戴高乐后来曾为他的这个决定感到遗憾。

② 奥古斯坦·洛朗(1896—)长期担任里尔市市长和诺尔省社会主义联合政府“首脑”的职务。

③ 勒内·普列文(1901—)，1944至1946年任财政部长；经常担任第四共和国部长职务；1950至1951年任总理；他提出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思想。

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妻子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她在道德以及涵养方面的影响，完全是以示范为基础的；你写书时，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她。但樊尚·奥里奥尔和莱昂·勃鲁姆强烈坚持我继续干下去；我仍然认为我妻子是正确的。试想，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得到任命——也许会 是诺尔省的国民议会议员奥古斯坦·洛朗，那么，人们可能就永远不会听到居伊·摩勒的名字了。

问：也许吧。

答：党也就不会经历一个衰落时期，也就不会有一个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社会党的总理了。

问：但居伊·摩勒所代表的势力，就不会推动另外一个总书记按照同样的方面前进了吗？

答：然而，要推动奥古斯坦·洛朗那样做，可就比较困难了，他控制着诺尔省的联合政府。怀疑的矛头会继续对准我这个前总书记的，对新的总书记的抱怨一直很少。你是对的，在党内，敌对势力从来都是存在的，这完全正确；不过，他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自己，也许，他们不可能打着居伊·摩勒的旗号表现出来。人们无法重写历史；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问：你作为总书记，能够利用你所掌握的手段去操纵1946年代表大会的选票吗？

答：噢，不，我不会那样干的；即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有一种基本的忠诚感，有些人认为这是天真幼稚，如果你也这样看的话；不过，我是绝对不可能那样干的。当我作报告的时候，我开始总是对公众说：你们应该知道我是用什

么观点看问题的,以便你们能够作出判断,以便你们最终可能以和我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思考。我认为,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是绝对神圣的,首先是对手的自由。试想,如果我像他们那样干,也许胜利了,但是,他们才是胜利者,因为就我使用他们的方法而论,他们玷污了我的名声。

问:要是你能够避免一场在一个社会党总理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话呢?

答:但在1946年,人们并不知道摩勒后来会进行一场使自己丢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问:尽管你作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失败了,但你在政治方面仍然十分活跃。

答:我是来自巴黎的一个国民议会议员,在完全由社会党人组成的莱昂·勃鲁姆政府中任部长。从前,我曾经拒绝在戴高乐领导的政府担任部长,因为我感到、而且现在仍然觉得,一个党的总书记不能当部长;他会过多地使党纠缠于政府政策之中,而党则相反,它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当我不得不在公共集会上回答共产党人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论点使我的失败变得光荣了。在我的选区,当我向选民报告我的工作时,共产党人说,投票反对我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即使在党内,我也已经遭到拒绝。我答复说,当他们的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报告》遭到拒绝的时候,那一天就是党内民主的证明,它标志着工人阶级的团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感到骄傲的事实在于,我已经领导党达到了一个十分成熟的地步,它能够拒绝它的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报告》……这并不会排除其他有关个人性格的看法。

问：而后从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你当了纯粹由社会党人组成的莱昂·勃鲁姆政府的劳动和社会安全部长。

答：这个部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选择的，因为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在战前，我一直负责《人民报》的经济和劳动部，劳工事务对我一向是十分重要的；我和大多数工会领导人，社会党的以及共产党的，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一般地说，我们都是以比较熟悉的方式相互谈话的。在包括共产党人和人民共和运动在内的拉马迪埃政府时期，我把这个部交给了一个共产党人；我在共产党人离开之后，于1947年5月初又回到劳动部，直到1949年10月。

问：共产党人撤出拉马迪埃政府的后果，一定会使你在该部的处境遇到困难。

答：甚至在今天，也还有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说，拉马迪埃驱逐了共产党的部长们，似乎他犯了侵犯罪；他们完全否认国民议会中共产党的议员，不投票支持他们所隶属的政府。

1947年5月1日，在协和广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有几万人参加，庆祝劳动节。社会党选我作它的代表。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任务——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事件、甚至也许是暴力行动——所以我对党的书记处给予我这样一个使命充满了感激之情，自然，我完成了这个使命。到处是吵吵嚷嚷，一片喧闹。在确定的时刻，马塞尔·加香（这个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打算使那些正在辱骂我的公众安静下来，我同时也本能地宣布，我决不会在马塞尔·加香的保护下讲话，不过，我要完全把自己放在工人阶级的保护之下。从此时起，人们完全安静下来听我讲话了。三天以后，保罗·

拉马迪埃请我重新回去，担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

我所领导的主要战斗是维护社会安全部的活动。我把口腔外科也包括在通过社会安全部予以赔偿的一种案例，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此时，右派大喊大叫，向我强烈抗议。当我为了消除职业方面的大量事故而采取保护性措施时，又遭到保险公司的强烈反对。我成功地组织了社会安全部主要财政管理委员会的选举，这一直是工人的要求。此时，尼科·魁斯托^①也在重新建立通过选举选择这些委员会的程序。显然，这一切证明包含于其中的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工人阶级是不是能够民主地管理那些明确与其有关的机构，或者，管理机关是不是也应该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

在1947至1948年袭击法国的大罢工时期，作为劳动部长，我的工作也有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方面，尽管这个方面在1949年少一点。不过，我的工作基本上是调解、仲裁和维持工资水平。我与工会组织的关系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努力解决问题，还是有可能利用一下个人之间的友谊的，这是一个信用问题，当你认识某人的时候，你要比较多地信任他，即使他对你似乎是一个阶级敌人，就像当时社会党人对共产党人似乎总是阶级敌人那样。让我举个例子吧。电气工业领域出现了麻烦，基本上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电气工人联合会号召罢工。总理宣布，既然出现了罢工的威胁，讨论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这是那些老板们常说的，没有比这样说更愚蠢的了，因为恰恰是在冲突期间才应该会晤……我去到了马蒂翁

^① 尼科·魁斯托(1930—)是莫鲁瓦政府的社会安全部长。

旅馆。那里有一大批记者，他们的大多数都是我战前参加的，现在还仍然交纳会费的那个记者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对我说：“你工作多吗？”——“是的，我有很多工作，好比，我今天夜里就要一个人坐在办公桌旁，直到很晚很晚。”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门房来人告诉我：“部长先生，电气工人联合会来了一个人想见你。”——“领他进来。”他进来对我说：“你同意接见我们。”——“当然，为什么不呢？我还特别想见见马塞尔·保罗。”（该工会领导人，法共成员，戴高乐政府的前工业生产部部长，有一个时期是国民会议员。）保罗离劳动部的距离不可能很远，因为两分钟后他就到了我的办公室。谈话自然是这样开始的：“好，你是愿意接见我们的一个人。我想说清楚，我不是带头人。”——“听着，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的核心；也许在上午4点钟，你会很高兴说你是带头人，或者，也许你想让我说我是带头的。如果你愿意，在我们结束对实际问题的讨论时，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谈到大约下午3点钟。此时，我向他提出选一个仲裁人；很清楚，一旦宣布了仲裁人，罢工就会取消，政府也就会停止进行威胁。然后他对我说：“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不过，这取决于由谁作仲裁人。”我建议由格林鲍姆·巴兰，我知道这些工人组织都很喜欢他，巴兰是国务委员会成员，是莱昂·勃鲁姆的朋友……自然，我看到保罗满面笑容，因为他知道，工人阶级是不会敌视格林鲍姆·巴兰这样的仲裁人的。我给总理打了电话，因为在最后决定之前，我必须让他知道发生的情况；这时是早晨3点钟，因为他知道巴兰是倾向于电器工

人的，所以他说：“代价会是很高的，不过，就这样吧。”电器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塞尔·保罗，从我的办公室向他那处于警惕状态的联合会下达了推迟罢工的命令。这件事还没有讨论过，或者是很少为人们所讨论；而人们听到的都是其他那些确实已经发生的、而且常常是非常残酷的罢工。

那些希望我好的人，那些喜欢我的人，那些按照他们的看法对我进行有利描绘的人，都不承认我现在就要对你讲的关于警察对矿区矿工之乡的干预。矿区发生过非常暴烈的罢工，共产党企图要每一个人都参加罢工，社会党觉得罢工没有理由。通常，当矿工们在矿上的时候，社会党矿工的妻子便在村子里遭到误解，她们家的窗子被打碎；有很多斗争，共产党人极端残酷，以致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矿工工会的社会党一派，不得不要求警察干预。内政部长茹尔·莫克指令警察干预了矿工居住区，这仅仅是为了维护劳动的权利。在下达命令之前，他给我这个劳动部长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半小时之内，我们将进入这些矿工之村。”我回答说：“我和你一块承担责任。”好，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那些喜欢我的人时，他们绝对相信不会如此，相信我不会对茹尔·莫克说：“我和你一块承担责任。”在所有书刊上，在一切谈话中，全部责任都落在了茹尔·莫克身上。的确，他是内政部长，的确，他是有责任的，他确实是根据社会党矿工的要求才要警察进入矿工之村的。而且同样确实的是，在我看来，已经别无他途，拒绝进入和保持沉默是不光彩的和不忠诚的；如果不派警察，共产党一派的矿工就可能在更加暴烈的事件过程中，对社会党一派的矿工进行大屠杀。

某些历史学家就是抱着这样一种预先确定的观点，因此，即使我对一个认为茹尔·莫克是唯一有责任的史学家讲了这种情况，那也完全是徒劳的。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共产党史学家，当他想就这个时期写一本书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有关情况，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刚才对你说的都告诉了他，当我看到他的书时，我所说的话连一行也没有；茹尔·莫克仍然是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应负责任的人。

问：好，我答应你决不删去这一部分谈话。社会党人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答：没有，他们不仅在政府内部不可能有其他办法，而且在矿区也不可能有其他选择。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了，人们已经由此作了很多推断，也许，茹尔·莫克的判断和我是完全不同的。我绝对相信，与人们已经说的相反，共产党人并不希望造成一次武装起义，以便索取对国家的控制权。由于使一定数量的错误和非正义的行动积累起来了，自然，共产党为了证明它反对政府是正义的，所以就利用了这些错误和非正义的行动。请不要忘记，1947年是冷战开始的年代，我丝毫不相信共产党有阴谋，我完全不相信有来自莫斯科的明确命令，我不相信莫里斯·多列士^①每天早晨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他该干什么。不过，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在国际方面所起的作用，与法国共产党的利益巧合了；换一个方式说，他们是问心无愧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有一个阴谋的传说。因此，当雅克·杜洛克带着几只鸽子在出租汽车上被发

^①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从1930年起一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44至1947年任国务部长。

现时，^①茹尔·莫克就谈论什么阴谋，这就使他自己有点滑稽可笑了。

问：你了解工人势力分裂的发展情况吗？

答：自然知道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证明，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莱昂·儒奥从来都不同意分裂。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作为劳动部长，从来都不同意分裂。与一直传播的一切谣言相反，我从来也没有为制造分裂而向工会提供财政支持，而且，我没有钱，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到钱呢？

问：罗歇·基利奥在他关于法国社会党的历史中认为，你作为部长离开政府，意味着社会党人参加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政府的时期已经结束，你同意他的意见吗？

答：我认为，意味着这一点的是罗歇·基利奥，而不是——好比说——我；不过，绝对无可争议的是，如果不是在1949年之后，至少也是在1951年之后，大概并无法证明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是正确的。在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中，社会上的阶级分裂在政府中反映出来，因此，工人党必须非常强大，它们的代表必须非常坚定地去抗衡资产阶级的意志……到1949年，我们已经不能够证明还有这样的坚定性了。此后，我认为资产阶级在重建时期利用了社会党，企图恢复战前的

^① 雅克·杜洛克(1896—1975)在德国占领期间，曾领导共产党的地下斗争，而且在1946至1953年是共产党议会党团的领导人；1967年，他是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之一。1952年，共产党游行示威，反对李奇微将军的访问。政府在作案现场逮捕了雅克·杜洛克，据说，在他的汽车上有一支手枪、几只信鸽以及无线电发报机。杜洛克是打猎归来，绝不是正在从事间谍活动；“无线电发报机”是一部汽车收音机。这个荒唐的事件，被说成是宣布共产党非法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就会适得其反。

规范,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充分证明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是正确的……在联合政府中缺少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就不得不代表全部工人阶级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情况,拒绝接受停滞不前的状态、以及实际上用选票数目否定共产党的选民。从1950到1958年,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意味着承认这样的事实:使共产党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割裂,而我们则应该既代表社会党人,又代表共产党人;为什么社会党的影响只发挥了如此小的作用,这正是原因之所在……

问:你在50年代成了党内的一个造反派?

答:在1949到1958年之间,有哪些主要问题把我和社会党的多数割裂开了呢?在1952年、1953年和1954年是欧洲防务共同体问题,1956年以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958年是承认5月13日政变。

我们已经在若干场合指出,我们决心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我们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反对重新武装德国。当称之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思想在欧洲若干国务活动家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就是要建立一支其中包括若干德国部队在内的统一的军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梵蒂冈式的欧洲”问题。这样的欧洲部队,首先是以重新武装德国为前提条件的,然而,德国却有“我们不要参加”的大规模青年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反对重新武装。很清楚,法国社会党对人民共和运动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更亲近。

突然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件事有了巨大发展,人民共和运动和法国社会党,在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方面实现了谅解。在

我们之中，有些人采取了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立场；我必须说，当时在党内，正像在法国各地一样，这是一个牵动了我们的良心的问题，它立即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感情，非常巨大的焦虑不安……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使人动感情的问题，就像过去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样。无论如何，社会党内部的气氛已经非常接近于狂乱的程度。我之所以讲这么多，因为我当时也很激动，而且现在可能仍然是这样。我认为，社会党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立场，就是向着通敌的方向靠近，不管怎么说，这违背了它过去的一切观点。我记得，我曾经代表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国民议会中讲话，反对重新武装德国，党的领导充分评价这个讲话是好的和正统的，为了把它作为小册子出版，居伊·摩勒的助手皮埃尔·科曼还作了一个序。然而几周之后，党改变了观点，决定投票支持重新武装德国，把德国包括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之中。

问：你是由于在欧洲防务共同体方面的立场而被排除出党的吗？

答：我是在早上7点钟听广播时，知道把我开除出党了。指导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处理冲突委员会，决定开除茹尔·莫克、马克斯·勒热纳^①和我，因为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我们以官方人士的资格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我是外交事

* 指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籍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出卖国家机密给德国的事件。——译注

① 马克斯·勒热纳(1909—)是国民议会社会党议员和第四共和国的部长，他支持对阿尔及利亚采取强硬路线。他1975年离开社会党，建立了社会民主运动。

务委员会主席，茹尔·莫克和马克斯·勒热纳是该委员会指定的报告起草人。以后的情况表明，我们的动机是不同的。有52名议会成员违犯了党的纪律。我们立即发出了呼吁，这个呼吁被搁置起来了，因此，我们继续行使我们在议会的特权。让我给你提供一些关于当时的气氛的概念。从法律上讲，我们仍然是议会党团的成员，自然，在宣布开除我们的当天，我们还出席了会议，议会党团中有些人，不想让我们进入会议室，说我们已经被开除了。对他们作一些法律方面的解释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在心理上相信，我们不再是社会党议会党团的成员了。好，后来把我们赦免了，我真不相信发生了什么情况；一整套程序都是稀奇古怪的。

关于人民共和运动和法国社会党某些成员之间的合谋关系，这里给你提供一个概念。当时，我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是财政委员会主席，按照惯例，同一个党不能控制这两个委员会，虽然这不是章程的规定。孟戴斯—弗朗斯病了一段时间，所以，人民共和运动和法国社会党的战略家们，就炮制了这样一个方案：既然孟戴斯—弗朗斯病了，那就宣布他不可能再主持财政委员会的工作，请法国社会党成员克里斯蒂昂·皮诺（他后来当了外交部长）出面主持；鉴于这两个委员会不能都由社会党人控制，所以，按照莫里斯·舒曼^①的要求，请达尼埃尔·梅耶下台。结果，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便都是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者了。使孟戴斯—弗朗斯及其朋友庆幸的是，他病得并不严重，两星期后

^① 莫里斯·舒曼（1911— ）早期是戴高乐的支持者、自由法国的发言人；后来是人民共和运动的奠基人之一。舒曼是第四和第五共和国的部长。

就又回到了委员会，这个令人可爱的方案也就没有出笼；不过，正如你就要看到的，后来有一个类似的方案实现了。

问：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之后所达成的方案，似乎对你比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更为有利，是这样的吗？

答：肯定不是。听着，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而且似乎是一些矛盾的情况，你是不是公布这些情况，我不在乎。我作了14年议会成员，那就是说，我参加过无数次投票表决，唯一一次使我感到遗憾的投票，就是我同意接受一个取代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也包含着重新武装德国，它具备欧洲防务共同体方案的一切不足，也许就是没有它的优点。可能会使你认为矛盾的是：假使重新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我也了解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投票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是在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中，因为孟戴斯—弗朗斯已经提出了对法国的信任问题，因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为突尼斯问题，以及当时就可能预见到的与阿尔及利亚有关的问题（当时的敌对行动还不是官方的，但人们直观上能感觉到包含在这些政府行动中的危险，但不是这种敌对行动会变得多么激烈）。我会投上同样的一票，尽管我会为自己的一票而遗憾。正是这些矛盾中的某一个，对一个有良心、而且是有政治良心的人，造成了有点带悲剧色彩、有点具有戏剧性的后果。

问：有另外一种方案吗？

答：那就是站在美国人一边，因为从长远看，美国人认为欧洲防务共同体是欧洲对付莫斯科的一个屏障。这是美国人所熟悉的那种气氛的一部分，他们有时候就自己制造这种气

氛；潜在的危險可能存在，但是，他们夸张、扩大和增加这种危險。好吧，应该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威胁和德国的重新武装，去换取苏联大幅度裁军了吧！但是，以一支统一的军队为基础去建设欧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不存在那种欧洲式的政治机制，一支军队是必须为某种政治立场服务的。

第二种冲突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最初并没有预见到阿尔及利亚独立。你知道，有很多人告诉你：“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阿尔及利亚要独立，等等”。我是用了两年或三年时间，才觉察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思想的，也就是说，我是在1956年或1957年左右，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社会党的整个纲领都是以阿尔及利亚和平为基础的，居伊·摩勒那非常令人刺耳的说法就是“反对这场愚蠢的战争”，“反对世界上这种最愚昧无知的权利”。

问：后来，摩勒在他的阿尔及利亚之行以后改变了观点。

答：但是，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法国军队已经承担了各种任务，特别是那里还有一些刑讯中心……而且我们都没有承认这些情况。在党内，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谴责刑讯；各支部的气氛极其混乱，一直发展到进行格斗。我们已经开展竞选运动，结果是共和阵线^①取得胜利。通过秘密投票，战士们差不多一致同意把我排在候选人名单的第一位；这次竞选运动充满了同志式的感情和友谊。嘿，此后不到一个半月，当

^① 共和阵线是争取1956年选举胜利的一个竞选联盟，它的组成包括法国社会党、对孟戴斯—弗朗斯友好的激进党人、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以及一些戴高乐主义者。作为财政部长的孟戴斯—弗朗斯，为反对摩勒政府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于1956年5月23日辞职，这标志着这个政府的瓦解。

我于2月6日^①之后在向我支部的战士们谴责那条新的政治路线时，正是投票把我的名字写在第一位的那些同志，正是喜欢我的那些同志，却对我挥舞拳头，企图扑上来把我狠揍一顿，尽管我还没有使用背信弃义这样一个有点严酷的词汇。因为他们不可能相信，像马克斯·勒热纳、罗贝尔·拉科斯特^②以及居伊·摩勒这样的好同志，可能采取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必定是在撒谎。

而且，你必须回想到宣传机构的气氛。就在我们谴责处死三或四名民族解放阵线^③成员的当天，《法兰西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个欧洲小姑娘被民族解放阵线埋下的炸弹炸成碎片的尸体。所以，人们是难以分辨的；当你说处死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是错误的时候，你必须承认，正是这些人把那个孩子的身体炸成了碎片。

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选择，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争论；这是一场有关道德和人性的论战。有些人承认刑讯，有些人不承认；那些承认的人也不这样说，他们否定刑讯的存在，他们说那不是事实，他们或则是出于野心、或则是由于个人原因，或者是为了保持平稳；我们却成了造谣中伤者。

我还是回到事实上来吧，莫里斯·舒曼通过和社会党人的合谋，当上了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有一个建议在国民会

^① 1956年2月6日这一天，居伊·摩勒去阿尔及尔进行了访问，他遭到了一帮由殖民地移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的反对。在他返回的途中，他开始改变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向着对阿尔及利亚采取强硬路线的方向发展。

^② 罗贝尔·拉科斯特(1898—)是一名社会党的工会领导人和议会成员，居伊·摩勒任命他为常驻阿尔及利亚的部长(1956—1958)。

^③ 民族解放阵线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一个组织。

议召开之前出现了,这就是要提出一个我称之为的“种族主义的宵禁令”,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必须在晚上9点钟以前回家,换句话说,所有那些黑色面孔的人,9点钟以后上街就会被捕。我拒绝投票支持这种种族主义的宵禁令,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提案并没有不加修正地从参议院退回来,而是三番五次地修正后被退还。党的领导也不接受我的论点:我是围绕同一次投票违犯纪律的,因此,只能算违犯一次纪律。他们决定,我违犯了三次或是四次纪律。现在有了一个完整的处罚标准,开始时,通过信件训斥你,接着是公开责备你,尔后便撤销对你的任命。他们对我实行的最后一次处罚是强迫我辞去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是刚刚被一致通过才重新当选的,因为——你在书上说出来比从我嘴里讲出来可能要好——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席!(大笑)。社会党支持取我而代之的候选人是莫里斯·舒曼! 1958年5月13日之前,我辞去了议会的职务,我通过1958年4月29日的辞职,为自己送了一份生日礼物,因为马达加斯加主张独立的人被投入了监狱,鉴于给予他们的命运,良心迫使我就要不得不再一次违犯纪律。社会党违背所有人的期望和过去的一切决议,已经决定同意采取措施,制裁马达加斯加主张独立的人,既然我知道我不能支持投票,我知道我还会违犯党的纪律;而且,我知道按照处罚标准,我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步:只剩下把我从党内开除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被从党内开除出来的,我仍然要保持自己的席位;我辞去了国民议会的职务。

问: 在5月13日以后,法国社会党最终同意授权给戴高乐,居伊·摩勒充当了戴高乐政府的国务部长。

答：的确，该党已经没有更多办法了，所以，独立社会党也就建立了起来。由带头人爱德华·德普勒发出脱离法国社会党的信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合适，因为，虽然他也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但他并没有违犯党的纪律；尽管他强烈反对罗贝尔·拉科斯特和居伊·摩勒的政策，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违犯过党纪。他比我们更为人们所尊重，人们不可能责备他一贯是敌对分子，因为，他仍然忠于党从来都没有错的思想。

我必须告诉你，在作为一个战士奋斗了54年之后，独立社会党引起了我最令人感到天真的回忆。我们全都忠于那种党从来都没有错的思想，我们都非常忠诚，不能有最轻微的个人考虑的表现，不能有个人的设想，不能作出判断，正如他们现在用暗示的或含蓄的语言所说的，不能有一顶点马基雅维里主义。我们已经摆脱了法国社会党权力的束缚，这个党已经越来越严重地没落，越来越丢人显眼，蒙受耻辱（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情况，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只是在以后几年才发生的，我们于1958年退党，此后几年进行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以，我们在支部里相互看到时都很高兴，我们都很乐于相互见面。然而从前，一想到要在支部会议上看到其他战士，总会有一种困惑不安的感觉：要发生什么情况了？什么时候结束？会吵起来吗？我们怎么投票？在道德上、精神上、差不多是在肉体上，都有一种解脱出来了的感觉。

此后，也许是由于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所以又把独立社会党改造成了统一社会党；的确增加了一些积极因素，我想到的是有像让·波佩兰^①这样的小伙子以及他的某些、但不是很多朋友参加的共产主义论坛派。

但也有一些新的成分，他们大声喧哗，吵吵闹闹，毫无用处……你听说过那个犹太人轶事吗：有一个寻找工作的人去找到他的一位在国家身居高位的朋友，他对朋友说，“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另一个回答说，“莫斯切莱，莫斯切莱，你真聪明，你大公无私，你忠诚，你正直；如果这个国家有50个像你这样的人，那就太好了，然而不是50，而是一万！”你在统一社会党的支部会议上，是绝对不可能遇到几千名、而只有几十名这样的人。我记得几次支部会议；我妻子和我都属于第十八区支部，我记得人们去参加的那些会议：书记提出了一、二、三项议程；“噢，那好”，其中有一个战士说话了：“我完全同意，只是第二个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个问题前面。”接着便是讨论，直到晚上11点钟，以便决定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放在第一个的前面或后面。晚上11点钟进行了投票表决；而后，当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本身的时候，那些最真诚的党员都离开了，因为他们早上还要去工作。

1967年，统一社会党对6天战争采取了一种非常模糊的立场；有些成员的立场实际上会导致以色列国的灭亡……生活已经无法容忍，我妻子和我离开了统一社会党，我们并不为此而觉得十分遗憾。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并不遗憾。这是关于叙利亚问题：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来问我的妻子和我是不是愿意作为到叙利亚去的代表团成员，因为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已

① 让·波佩兰(1925—)，以前是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论坛派创始人(1958年)；1960年为统一社会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971年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1975年以后任社会党负责全国宣传工作的书记。

经邀请了统一社会党的党员。我们立即说愿意；这是个重要问题，我们考虑，这个邀请是兄弟友谊和政治和解的表示。“但是”，他们后来说，“你们不能到叙利亚去了，因为你们得不到签证；你们的名字是达尼埃尔·梅耶和克勒塔·梅耶。”我们说，“你们必须要求签证”；我们期望他们作出某种团结的表示。你知道他们提出了什么问题？“好吧，也许我们可以给你搞到一份假证件。”他们承认了拒绝给犹太人发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对那些拒绝给以签证的受害者，没有表现出团结的态度，这就是必然对他们作出的判断。

问：统一社会党从一个左派党变成了一个极左派党，而独立社会党则代表着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是这样吗？

答：你讲得很确切。大约两年，我们不是任何党的成员；我必须说，对于那些自童年起就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我们觉得有点像是逃兵，我们很不安：“好了，我们再也不用参加斗争了。”后来，阿兰·萨瓦里取代了居伊·摩勒，非常令人高兴的一幕发生了。萨瓦里问我的妻子和我，他是不是可以来访；他刚刚被选为书记，我们当然说可以。他在一天下午来到我们家，并且开始谈话，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是书记，我们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党内，但可以参加一个新党。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写着我们名字的卡片说：“我猜想你们会愿意，我给你们带来两张卡片。”那情景是非常温暖和令人感动的。

问：在一定的時候，你的其他活动，例如你在人权联盟中的活动，是不是比你的政治活动更重要？

答：确实如此。可以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时间，那就是

1958年3月。人权联盟有一个主席，叫埃米尔·卡恩，已经81岁，大概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他一定觉得自己会长生不老，他丝毫也没有准备为其后继人让路；他于1958年1月去世。我1927年就参加了人权联盟，但我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为了找一个主席，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徒劳了两个月。后来有一天，《法兰西晚报》的一个记者乔治·贡博碰见了我；战争期间在伦敦时，他是《法兰西日报》的主编之一，这是一份由法国社会党人和靠近社会党、但敌视戴高乐的抵抗运动成员出版的一份报纸。他告诉我：“你能不乐于作人权联盟的主席吗？”这个想法就这样出现了，不过，出现的正是时候。如果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没有一个话筒，历史就可能会有所不同^①；如果希特勒在维也纳作画家时找到了工作，而不是失业……^②遇到一个人、一段时期或一种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乔治·贡博在6个月或两年以前，问我是不是想作这个联盟的主席，我会回答他：“肯定不干，因为我的政治生活等等原因。”但这是我政治生活衰落的开始，我已经模模糊糊感觉到，我就要辞去议会的职务了；我还是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但由于我已经告诉你的原因，事情正日益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作了14年的议会成员，但在这个时期内，我很少仅仅当一个议员，我是部长或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仅仅作国民议会议员；特别是巴黎的一个议员，很难使人产生兴趣，办公时

^①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曾在伦敦向法国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译注。

^② 希特勒在19岁时曾流落维也纳，靠打零工和出售临摹画维持生活。——译注。

问你呆在办公室里，杜邦先生来说：“关照一下我的社会安全问题好吗？”杜兰德先生告诉你：“我儿子要去服兵役，他能在巴黎地区服兵役吗？”这无论如何都没有什么意思，不仅是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是的，我看到一种空虚的前景，也许是对参加活动的需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的政治活动正越来越少，所以我答应了。后来，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任命我为这个联盟的主席，那是在1958年3月。我于4月29日辞去了议会职务，这样，我的活动变化了，但重点没有改变……我担任了17年这个联盟的主席，而后又成了它的国际联合会的主席。

问：在1965年总统竞选中，曾经就你作候选人的可能性进行过讨论。

答：统一社会党决定我作候选人。就要第一次作候选人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正在谋求提名，他来看我，并且问我是不是想作候选人。他之所以想知道，是因为他正在与共产党和社会党协商成为唯一一个左派候选人；所以我告诉他，如果只有唯一一个左派候选人，我参加竞选是毫无疑问的。

问：在你的政治生涯中，你曾经由于反犹太主义而苦恼吗？

答：这种不常发生的例外只有几次，我并不认为我曾经由于反犹太主义而苦恼；无论如何，我都不了解这种情况。

问：在你作为一名战士的生活中，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失败又是什么？

答：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而在于它所进行的改革的高速度及其重要性质，这些改革对于改变生活，无可争议地具有一种革命的本质；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

谈过了。自然，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当选，以及此后给了我们以绝对多数的立法机构的选举，都必须认为是社会党的成功。不过我认为，要估价这些成功的性质还为时尚早，目前，这些成功只是选举方面的；真正的问题是失业，这部分地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因为这不是某一特定国家的问题。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但取得失业的主要受害者的更多谅解还是必要的；这是一个悲剧，而且不只是法国。

失败，也许不是社会党的失败，不过，我认为是失去了一次机会，这就是1968年5月。我想，在1968年，革命的条件已经出现，我的意思是说，出现了一个全面发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它曾一度不仅要求改变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要求改变伦理道德。学生和工人的趋同之所以没有发生，基本上是由于法国总工会和共产党实际上背叛了这个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学生企图超越丰裕社会，而工人却还没有从丰裕社会中得到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和工人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这对于工人运动是一次失败，但也不是完全失败，因自1968年5月以后，再没有任何事情还完全像从前那样了，男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教会内部、工会内部以及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但把这种关系再更多地向前推进一点还是必要的。今天，参加1968年运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被击败了。

问：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答：无疑是同一种现象。在刚开始时，我并不了解这个运动，很快就明白的是我夫人，她对我说，“咱们到巴黎大学文

理学院去看看吧。”我非常深刻地记得，有一个年轻孩子和高中中的其他学生一块，到雷诺工厂附近游行示威，工人拒绝他们入内；法国保安部队^①在后面紧追不放，他们中有一个正跑着的学生，非常害怕带着警棍和枪等武器的保安部队。那个年轻孩子掉进了塞纳河，并且很快就淹死了。他家住巴黎第十七区，在阿斯尼埃尔门附近。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没有任何党派给他献花，年轻的高中学生们排着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束花枝很长的玫瑰；他们纹丝不动，令人惊奇的、绝对是令人惊奇的安静，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完完全全、非常深刻地记得这种景象。后来，那里发生了争论：是法国保安部队杀害了他吗？我还记得在互助大厅开的一次会，在那里，我还遭到了白眼，不过，人们后来就理解了。我说：“是不是保安部队杀的能使问题有什么区别呢？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总是保安部队的恐吓杀了他，是他们使他掉到了水里。”那孩子大概有15岁？我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记住，我希望我记得是……

问：最后谈谈你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好吗？

答：关于这个词的意义就有争论。我拒绝使用东欧集团所说的“社会主义”一词，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东欧国家的现实相提并论的人们，都远离了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欺骗。

第二种评论与第一种是对应的。自从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以及立法机构的选举之后，有的人说法国是社会主义政权，有的人说不是社会主义政权。按照目前的说法，当人们谈

^① 共和国安全部队是在解放以后建立的一支暴虐的武装警察部队，他们的名声是“残暴警察”，特别是对待学生。

到吉·德斯坦时,你听到人们说“在旧政权统治下”。旧政权是1789年以前的政权……我们仍然处在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我们力图改变它,所以会少一点非正义,略微多一点平等,这和社会主义绝对毫无共同之处。就我们看法而论,社会主义也许是一种思想体系,从最后分析看,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说,在国家最终消亡之后,也就是说,当再也不需要国家机器的時候,整个财富都将为大家所占有;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司法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将会使人类得到改造。我知道,我现在所说的都是几千年以后的事情。我所能说的这一切就是社会主义。

同时,人们还可以设想一种过渡性政权,在这里,某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按照改良以及为实现正义而奋斗的模式进行的,例如在瑞典。按照某种结构的标准,但是要加上自由,南斯拉夫的制度也值得仔细研究,这尤其是因为它不是那种僵死的制度;很久以前,我曾经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这本书一写成,它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南斯拉夫的机构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该看清楚这种情况。不过,如果广义地讲,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也是一种模式。毫无疑问,在我所看到的情况中,它们最接近于我青年时代所梦想的社会主义。每一个人都为大家工作,在他的岗位上,也就是说,在他所选择的、他力所能及的岗位上工作;最后,他们的工作还可以轮换,你今天洗碗涮碟子,但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明天可以组织一场埃斯库勒斯*的戏剧演出。洗碗涮盘子以及为你同志的孩子

• 埃斯库勒斯(公元前525—456),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之一。——译注

揩鼻涕，并不是不光彩的，因为你今天就是负责日托工作。社会主义就是这一切的结合，但是要有自由。

你知道，在我18岁的时候，我相信我会看到社会主义。你可以相信，我已经比较聪明了，我现年72岁，我相信看不到社会主义了，这一点比我18岁时的信仰更肯定。我仍然深深地相信，我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一定会到来，但正如一个属于犹太人同盟^①的朋友过去常说的，“生活的道路并不是超级公路”。

^① 犹太人同盟是1897年在西部俄国建立的一个犹太人社会民主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被取消，在独立后的波兰得以重建。

第二章 热夫·朗斯和比利时 社会主义

引 言

比利时社会党创立于1885年。^{*}它的意识形态是在卡勒农宪章9年之后确定的；从组织上看，该党比较接近于德国和奥地利模式，而不是法国模式。由于实行集体入党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的工会、互济会以及合作社的全体成员，都自动成为该党成员。在每一个城镇，人民大厦都是这个运动的总司令部，该党主要由产业工人构成。

就其学说而论，虽然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时间仍然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它的活动却总是改良主义的。由于过去比利时没有男性普选权，所以实现这种权利曾经是该党的主要奋斗目标；鉴于给予普选权问题以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该党实际上非常尊重议会政治的价值观念。1893年实现了男性普选权，但上层阶级都有双重选举权，直到1911年以后，才颁布了一个男子投一张票的法令（妇女的选举权是在第二次大战后才实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该党与比利时社会的一体化。在

* 该党最初的名字是比利时工人党，1945年更名为比利时社会党。

其他国家，社会党都可能为保卫祖国的功绩问题而争论不休；对于小小的比利时来说，它的中立遭到了令人吃惊的破坏，它作为德国暴行的受害者，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比利时的三大党派，天主教党、社会党和自由党都学会了合作共事的本领。1936年，它们合作挤垮了国王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又为维护比利时的统一而奋斗；在被占领时期，它们又共同为这个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工人党丧失了它对参加“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的敌对情绪，继续在内阁中呆了几年时间。它完全有资格作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因为它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对左翼具有重大“革命性”意义的反抗。尽管共产党在1921年搞了一次分裂，但它的力量有限，社会党人对工会的控制权，从来都没有真正受到过威胁。

然而，比利时工人党的发展也受到了遏制，因为它难以吸引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在1885年之前，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文化的一个分支，正像许多天主教国家的情况一样，左和右这些词，主要是反映一个党派对教权主义的立场。由于比利时工人党是反教权主义的，所以它吸引了那些非基督教化的工人，而不是天主教派的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主教派的工会成员，超过了社会党的工会；即使在今天，该党也是以反对教权主义为标志的。

社会主义受到由于语言和伦理道德原因而使比利时社会分裂的影响。比利时分为两个主要集团，即佛拉芒集团和瓦隆集团，第一个集团最初讲变异的荷兰语，第二个集团讲类似于法语的罗曼语；在19世纪，佛拉芒人采用了标准的荷兰语，

瓦隆人采用了标准的法语。比利时开始发展的头100年为法国所统治，所以工业地区分布于瓦隆人居住的地方，那里的佛拉芒工人也成了讲法语的人。政府工作、行政管理以及教育，都是用法语进行的，甚至佛拉芒人城市的资产阶级也讲法语。佛拉芒运动最终还是发展起来了，自1954年以来，人口统计的趋势以及经济动向，都已经颠倒过来了。由于语言不同而引起的分裂，成了划分阶级和宗教的直接原因，而老的党派的基础，就是这种阶级和宗教。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出现了双方妥协的局面，但在1961年之后，语言问题又重新爆发。以这个问题为基础的新兴党派，瓦解了传统党派的统治，每一个党派最终都围绕同一种语言分裂成了两个党派。为了避免把自己的选民丢失给那些按语言划分的民族主义党派，天主教党、社会党以及自由党，至少也都吸收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言词。今天，比利时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社会党，当然，二者之间的合作是毫无疑问的。

本访问记的主人公热夫·朗斯，大概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最受人尊敬的老一代政治家，他出身于佛拉芒工人阶级，是一个码头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家；由于为理想所吸引，他又转而求学，并且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曾经把自己的知识运用于解决工会运动和党在30年代所遇到的问题。

热夫·朗斯的很多观点都和亨德里克·德曼个人及其理想有关。1932年，朗斯曾经和德曼同在德国法兰克福学习，并且在德曼于1933年为开展争取实现“劳动纲领”运动而回到比利时的时候，又和他一道工作；但他们的道路却是不同的。1941年，朗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谴责了他过去的老师，

不过，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深入研究德曼人生道路的意义。

战后，朗斯当上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副主席，在那里，他对第三世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敏锐的认识。朗斯于60年代回到比利时，主持合作与发展顾问委员会、全国劳工委员会（等同于美国全国劳工关系局，但比它重要得多）以及全国科学委员会的工作，这些职位在比利时王国都是最受尊敬的。他的退休并没有减少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巨大好奇心，并没有减少他对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关注。

热夫·朗斯访问记

热夫·朗斯：

我的双亲都是典型的劳动人民。在一个10口之家中，我母亲年纪最长，全家人都在博恩制砖行业工作，我想，那是当时比利时最大的制砖中心。我母亲9岁时就外出劳动了，所以，她没有很多上学的机会，她结婚的时候还不知道如何读书写字，她是跟我父亲学会读书的，并且是一个积极而又对书很感兴趣的读者，她把一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一般是读小说和历史。她从没有严格学过写字，她写字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不关心宗教，但是在年迈时，她过去的信仰却又重新出现了，她是非常虔诚地在教堂去世的。她是一个非常慈祥的母亲，虽然她出身于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但就其举止而论，她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文雅的女士。

我父亲也出身于工人家庭，不过，他们不是制砖，而是刻

钻石，这在安特卫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在那里已经盛行三、四个世纪了。我父亲出身于一个比较相信自由主义的家庭，自由主义是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所以他对独立自主有极大兴趣。他非常赞赏克吕热总统，^①并且接受了克吕热的很多说法，诸如“好自为之，不求报答”。不过，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工人。他最后希望成为一个小业主，但没有如愿以偿，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很穷，他是在相当悲惨的情况下去世的，幸好我在场，但还是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和宗教也没有任何联系，尽管他的几个姐妹都信奉宗教。

无论是我的两个兄弟还是我本人，都不信奉宗教，但我像母亲一样，童年时代的信仰正在恢复；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信仰历来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信仰在我自身。

问：从你讲的看，你的家庭出身丝毫也不能说明你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加政治和工会活动。

答：是这样。我外公是博恩地区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他最小的儿子是工会成员，人们都认为他们是村子里的造反派。

问：你父亲在政治上积极吗？

答：不，我父亲反对党派，从自由主义一词在过去安特卫普地区的意义上看，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投自由党的票；他很能忍耐，他完全理解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想他是同意我的。看到我的工作非常出色，名字也上了报纸，他很高兴……不过，他对团结的意义不理解，可以说他是一个

^① 保罗·克吕热(1825—1904)是德兰士瓦共和国(今南非东北部的一个省——译注)总统，是布尔战争(英国与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之间1880—1902年的战争——译注)时期的著名领导人。

相当孤僻的人。然而在我母亲一方，我外公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

问：好，请谈一谈你的发展以及你所受的教育。

答：我 1921 年开始在米纳瓦内燃机厂（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我们已经于 1919 年从荷兰回来，战争时期，我们在那里是难民。后来我失业了，又到一个港口劳动。我没有遇到几个好年景，工作沉重，有些是搬运工的工作，多数时间是什么活都干的某种勤杂工。我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年轻人……不仅身强体壮，而且有力气和擅长运动。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我不可能下决心学习作生意，真的不可能，所以，我选择了这种相当沉重的工作；不过，我有一份合乎情理的收入。不时地有一些人失业，但不是很多。我的第二个弟弟学习不是太好，14 岁就离开了学校，开始按我父亲的建议，学习刻钻石的工作，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学徒时间很长。4 年之后，他成了那一行的高手，他们支付他一个熟练刻工的一半工资，是我的收入的两倍。此时，我已经开始在工人运动中作宣传员的工作，散发传单。我兄弟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对我说，“热夫，你不是一个傻瓜吧？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学刻钻石，几年功夫，你就会赚到两倍或三倍于你今天所弄到的钞票。”我说，“是呀，不过我没有很多时间了，我已经开始老了。”他又说，“好了，我来教你。”我花了三年时间，从来都没有成为内行。那是一个只允许参加钻石工人工会的人们就业的行当。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完全是第一流的钻石工人工会，它是由两个叫做亨利·波拉克和杨·范祖芬的人组织的，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小伙子，他们属于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优秀的

工会会员，因为他们认为，问题不只是为了要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较多的收入和较短的工作日，还有一个促进文化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工会的周报的确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他们把当时的工人造就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一个犹太人，他戴一项战前那种白色学生帽。我想，我生平就这一次产生了一种妒忌的感情，我慢条斯理地带着嘲弄的口气说：“你有资格学习，你父亲是一个富翁。”这样说不真实，他生气了，说，“只要你乐意，我干的你也可以干。”我还记得这次谈话，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你知道，你可以参加和中学期末考试一样的考试，它是由一个专门的官方机构提供的，这个机构每年会晤两次，签发和中学一样的毕业证。”他还非常慷慨地说，“我来帮助你，你的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全由我包了。”我思索了几天，后来去找他，接受了他的帮助，那大概是9月份。他回到自己房间里找了很多书，并且说，“就从这里开始吧！”他每周为我安排两段时间，每次两个小时，他使我迷上了代数和几何，他还给了我很多史学著作。我还有一个老师，因为那个官方机构的考试还包括把英语译为法语。法语对我是次要的，但根据母亲的建议，我还是经常到夜校去学习法语。母亲总是说，你必须落落大方，文质彬彬，不学法语，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问：对必须学法语你讨厌吗？

答：丝毫也不讨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佛拉芒民族主义者，但是我不讨厌学习法语。我讨厌当兵，我痛恨当兵，不过，我在军队中呆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耳朵有毛病。后来，肯

定是2月份，一个非常严酷的冬天……你知道，钻石工业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行业，衰退突然爆发了，没有人知道衰退来自何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灾难落在了钻石工人、同样也落在了商人头上。钻石工是一些非常奇怪的人，一旦他们劳动、赚钱的时候，他们就像是要炫耀一下自己似的把钱花掉，他们非常滑稽；在衰退来临时，他们就没有钱了。唉！他们不知道节约。我在家多次看到没有饭吃，所以就去找一位朋友，希望他母亲给片面包，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在这几个月里，我差不多每天能学习18个小时；后来，大学第一学期的入学考试到来了。

当时我的朋友说，“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如果你打算参加这次考试，你很少有可能被录取；不过，既然你从没有参加过这种考试，你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如何进行考试的经验。9月份你还会失败的，但下一年7月，你一定会考好的。”这样，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报了名。我应试在中心考场，并且第一次就获得了成功；我的法语几乎失败，我的历史、甚至数学，都考得非常出色。

就这样，我开始了大学课程，但我无法跟上班，因为我必须工作。我要不时地到布鲁塞尔去，至少是对每一个教授都拜访一次。我的工人兄弟给了我极大鼓舞，看到他们自己的人中有一个上大学，他们都兴高采烈。我这样干了三年，得到了社会科学文凭；第四年又干了一年，拿到了第二个，即经济学文凭。后来，接着1929年的华尔街崩溃，大衰退突然降临了。比利时是在一年之后才感觉到这次衰退的，因为我们举办了一个万国博览会，维持着某种有点儿是人为的活力。那次

博览会到1930年9月30日结束，第二天，当我回到商店的时候，它已经关闭，我没有工作了。

一天，我遇到了工人运动中的一位朋友居斯特·德默伊克，他是亨德里克·德曼的表兄弟，是我结识的最好朋友之一。他问：“和我一块工作好吗？”我从报纸上知道，他已被任命为佛拉芒语第一新闻广播电台的主任。他说：“我这里还有三个职位空着，一个是留给自由党的，一个是留给天主教党的，一个是留给社会党的，你可以作社会党的编辑。”因此我说：“你看我能够编排新闻节目吗？”他回答说：“噢，我连自己能不能干都不知道。”我是在1931年初开始这个工作的。

在我失业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赫曼·福斯^①，他是佛拉芒阵线党的领袖，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对于不同党派的人都有很大影响。他说，“与其浪费时间，啥事不干，你为什么不作些准备去争取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呢？”7月份，这个基金会的消息来了，我得到了两个奖学金中的一个。我被准予离开在电台的工作。

我首先到了柏林，不过，后来又决定去法兰克福。我带有一封居斯特·德默伊克妻子埃伊福恩的介绍信，介绍信是写给她兄弟亨德里克·德曼的，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

问：在讨论你在法兰克福的经历之前，能谈谈你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发展吗？

^① 赫曼·福斯(1889—1952)是一个知识分子和佛拉芒阵线的领导人，佛拉芒阵线是1919年建立的一个组织，它强调语言问题在佛兰德地区的重要意义。福斯后来参加了比利时社会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参议员，而后又出任首相。

答：我想，在我这一代年轻人中，我的发展是很典型的。当我在米纳瓦内燃机厂工作的时候，我就和该厂的工会有联系，我此时已经开始探索真理。我经常到一个老无政府主义者扬·马杜开的书店去，它座落在安特卫普市中心一个下层阶级的居住区，那是一个很小的旧书店，完全不通风。马道留着长胡子，他是他那个思潮中一个典型的、差不多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人物。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很多人的名字，他对我谈到过巴枯宁、^①克鲁泡特金^②以及厄里塞·勒克吕^③等等；我通过他买了一些有关这些人的小册子，他们对我产生了相当长时间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有关自由的概念，以及他们关于权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大的权力，权力会导致滥用权力和压迫的思想。我还在完全不同的著作中看到过这类思想，据我所知，它们是由一个原来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卡洛·罗塞利^④提出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知道，他是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被杀害的。他曾写过一本小册子《自由社会主义》，我认为，它包含着一种最全面的、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我

^① 巴枯宁(1814—1876)是俄国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与马克思的分歧加速了第一国际的破产。

^② M·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一位领导人和作家。

^③ 厄里塞·勒克吕(1830—1905)是一个地理学家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他曾经参加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

^④ 卡洛·罗塞利(1899—1937)是一个积极反对法西斯的知识分子，是正义和自由派的一个主要创始人。他组织过一支意大利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该共和国一边进行战斗。他被法国一个恐怖主义的法西斯组织卡古勒的成员所暗杀。

所知道的最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定义。

不过，我不只是到让·马道那里去。在安特卫普，社会党当时是很活跃的，所以我也到被称之为“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活动中心去，他们也有一个书店。我买了一些书，并且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是党员；我还参加了他们的会议。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在那个时候，党一个月至少开一次会议，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在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站起来说明一个问题；居斯特·德默伊克就是这样认识我的，并且很赞赏我，他是我所参加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头头。我正在寻求真理，我不受阻拦地接近属于不同类型的人们，最后，我认为我还是退回来站在了党内的所谓中左派一边，对党来说，这是一个审慎的、有时候是一个强烈的反对派。尽管我的朋友说反对是无用的，但我想，为了改变党，我必须留在党内，从外部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分裂出去变成一个很小的少数派，那是没有什么用的。

问：当时在社会党内有使你特别钦佩的人物吗？

答：是的，有好几个。有一个我所钦佩的人是卡米勒·胡斯曼斯，^①我是在很晚以后才和他熟悉的，在安特卫普，他是高级人物，我在当时不可能接近他。我更为钦佩的第二个人叫威利·埃克莱，他是一个冶金学家，他对青年人和学生，对居斯特·德默伊克所创立的青年工人运动很感兴趣，他鼓励这样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我感到骄傲的人就是我介绍入党

^① 卡米勒·胡斯曼斯(1871—1968)是比利时一个主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和佛拉芒领导人。他担任过安特卫普市长、社会党国际书记以及比利时众议院主席的职务，并于1946—1947年出任首相。

的赫曼·福斯。

我介绍赫曼·福斯参加了党。1932年，也就是在议会通过关于语言问题的第一个法律《比利时仲裁协定》^①之后不久，我和他有一次谈话。他说，“好了，这个立法清除了阵线党的基础，它再也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了”；我说，“我认为，在阵线党内，每一个人现在都必须到他在理论上所隶属的党内去。”我问他，“你呢？”他说，“按我的情况，我属于社会党。”接着我又问：“我把你作为一个候选人向党提出来好吗？”他回答说“我很高兴”。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极严重的混乱，因为最初反对他的人正是卡米勒·胡斯曼斯。我丝毫也不是孩子气，我完全知道，阵线党参议员、他们的报纸（发行量很小）主编赫曼·福斯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作为参议员的薪金。所以我说，如果允许他加入我们党，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指定的省级参议员职位。卡米勒·胡斯曼斯已经是一个候选人了；他是一个来自卢森堡的小伙子，甚至不会讲佛拉芒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像他这样的情况有好几个，当时，安特卫普地区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泰瓦博士，他就不会讲佛拉芒语，当然，这在目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威利·埃克莱很快就看到了吸收赫曼·福斯这样一个杰出领导人对我们是有利的，他可能会带来他的一大批选民，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问：现在也许可以谈一谈你在法兰克福的经历了，你在那里跟着德曼学习？

^① 《比利时仲裁协定》是1932年制定的，按照该协定，佛兰德地区和瓦隆地区的经营管理活动，完全用占支配地位的语言进行。

答：不只是德曼，我还跟着保罗·蒂利希、^①卡尔·曼海姆^②、卡尔·赛德曼，以及卡尔·佐斯曼学习。不过我认为，最有趣的是大衰退前夕整个德国的政治气氛。就是在这里，我决定努力准备一篇论述民族社会主义的基础的论文；1935年，我在布鲁塞尔提交了这篇论文，德曼和路易·德布鲁凯^③都是评审组的成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中间阶级的政治化和工人阶级沿着错误道路的激进化；我严肃地考察了民族社会主义问题。

问：德曼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答：就这个问题而论，我同意他的观点。从分析德曼所说的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化来看，德曼是正确的。中间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相反，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他们仍然企图有别于无产阶级并高居于其之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激进化，是沿着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相对立的路线发展的，他们认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任何地方也没有领导我们”，他们跟着希特勒走。我曾经看到真正的工人运动与希特勒的运动一道在法兰克福行进；对于它们，唯一的出路是团结，但这两个党都反对团结它们。社会主义工人党^④太小太弱，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集团，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在左派一方的整个舞台上，到处是一片混乱，

① 保罗·蒂利希(1886—1965)是一位重要的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

② 卡尔·曼海姆(1893—1947)是社会学家，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

③ 路易·德布鲁凯(1870—1951)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王德威尔德的亲密合作者，1935至1939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

④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一个左翼小派别，它力图组织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

分崩离析。

问：你何时离开德国？

答：1932年8月。

问：当你回到比利时时，你强烈地感觉到比利时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答：没有。你记得德勒的冒险吗？他企图制造一种群众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后来，老的党派自发起来反对，他们在选举中共同团结在候选人范策兰德背后，范策兰德给了德勒以致命的打击。我没有这种感觉。在危机或危险时刻，在比利时舆论中就会出现一种凌驾于不团结状态之上的奇怪趋势，至少在过去是这种情况。

问：这是一种由于脆弱而产生的力量，是由于认识到了该国所固有的缺陷；为了生存，这个国家就必须团结起来。当你回到比利时时，你认为哪些是必须解决的基本任务？

答：失业。

问：失业？

答：当我回到比利时时，我按照居斯特·德默伊克的许诺，我又回到电台工作。1932年底，我当上了工团委员会^①的杂志《比利时工团运动》的编辑；我要说，这是我生活中七、八个最好年份的开始，因为我很快就成了工团委员会的秘书处成员。秘书处有三个老朋友组成：卡米尔·梅唐斯、约瑟夫·邦达斯和爱德华·德弗拉明克，他们都比我父亲年长。他们三人都对我极好，不仅非常仁慈，而且给了我极大的、非常温

^① 工团委员会(工会委员会)是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最初的名字，说明他们是在社会党领导下活动的。

暖的同情，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有点厌倦了，给了我很多我可能承担的责任，任务是很重的。

此后不久，又约请我为韦尔维埃地区的一家日报《劳动报》，以及法语《沙勒罗瓦杂志》写每周专栏。开始，这个工作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5年以后，我在两个小时以内就能够写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领导人物。这两家报刊付给我75法郎的报酬，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的房租需要了。

我成了一个著名而敏锐的专栏作家，我相信我的事业。结果，我得到了越来越多请我晚上到各省议会去讲演的邀请，如果我全部接受下来（我曾经和妻子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她就永远再也见不到我了。所以我说，我必须为自己立个规矩，每周决不接受多于三次的晚会，每两个星期日接受一次讲演，我坚持了这个规定。在外省很多战士的眼里，我是一个糟糕的宣传家，因为我不到各地去。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有时间学习，补充我的思想，读一些书，同时认识国外正在发生的情况。

问：当时你认为这个运动应该如何对付失业问题？当然，反对“银行家政府”是很容易的，但你提出过什么积极措施吗？

答：实际上，我们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案。我们为改善失业救济进行了斗争，我们为那些非自愿失去其工作的人们提供了收入。由于德曼回国而出现了一种情况。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他希望使社会主义深入到属于其他社会范畴的居民中去。他组织了与中高级文职人员以及来自工业界的某些人士的讨论会，但不是人民大厦，而是在教育基金会。

问：对于比利时工人运动来说，1933年以后的时期大概

是一个激烈变化和极其困难的时期。你能谈一谈作为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人而结束其政治生涯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德^①的情况吗？

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王德威尔德似乎是属于特殊的一代人，就像莱昂·勃鲁姆和奥托·鲍威尔这些在1914年以前形成的一代人一样，他们相信，人类会通过教育逐渐变化，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完全是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选择的不是和列宁一道前进的道路。他们属于非常讲求实效的一代人，而且通常都出身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面对大衰退这个王德威尔德在60岁才遇到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所措手足。不知作这样的评价是否公正？

答：我想是这样，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非常确切的，除了你说的王德威尔德属于勃鲁姆这一代人以外。我想，应该说王德威尔德属于饶勒斯这一代人，与勃鲁姆相比，他更接近于饶勒斯，尽管他是勃鲁姆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问：当时，王德威尔德为比利时工人运动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

答：他是领袖，是保护人；他是唯一一个被工人极富感情地称之为主人的人，这个称号是属于工人自己的；他看上去像一个非常暴躁的小伙子，他个子很小。他是领袖，是一个领导

^① 埃米尔·王德威尔德(1866—1938)，是20世纪前30年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和思想家，他曾经在多届内阁中任职，他是1925—1926年普莱特—王德威尔德内阁的外交部长。王德威尔德既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人物，他使党团结起来了，他创立了党，并且在各地赢得了人民的尊重。按照他的改良主义的进化概念，他把党置于工会、合作社和共济会之上，他认为所有这三种组织都是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发展而创立的。我还记得一个差不多是悲剧性的事件，当时，根据我的倡议，我们召开了一次改变工会地位的特别会议，其中的变化之一是用比利时总工会取代“工会委员会”。当时，年迈体弱的王德威尔德参加了会议，他在走廊上乞求似地对我说，“朗斯，不要那样干，不要作那样的变动，让工会委员会仍然是党的产物。”我说，“但是，保护人，你应该谅解。”他非常生气地离开了，那对他是一次震动。

问：在二次大战前的比利时，社会党和工人运动对普通党员和工会会员，确切地说意味着什么？党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答：我认为是一种巨大的作用。我想，这种作用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像一个大家庭那样的作用。那时有一种友谊、家庭和亲密忠诚的气氛；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有一天，我们都将进入这个社会；如何进入这个社会，我们没有任何清楚的概念，不过，它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不同的和敌对的。认识到我们要完成的事业，认识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是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某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你所称的改良主义，费了我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是在最初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我才具有了一种理想社会的形象，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工人运动是以人民大厦——它在沙勒罗瓦称之为人民宫——为中心的，遗憾的是人民宫现在已经被出售，因为工人运动再也不可

能承担包含于其中的各种费用。在人民大厦，一般地都可以找到社会主义共济会、一个或更多工会和合作社的办公室；如果你是一个党员，而且要证明这一点的话，你每年都必须从这些合作社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其他东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是你收入的一个很大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世界，我并不是说它是国中之国，但它就是世界本身。它得到那些伟大的雄辩家以及地位很高的牧师们的鼓励，例如德布鲁凯、朱尔·德斯特雷^①、卡米勒·胡斯曼斯和安瑟尔^②。当然，那是一个用《圣经》说明未来的时代，那些鼓励的话只能是笼统的，并且使用玄虚的和个人的表达方式；它具有宗教的某些特点。

问：大衰退促进了对老一代领导人的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来自激进左派的批评，当时，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名曰保罗—亨利·斯帕克的年轻煽动者。你当时和这个社会主义行动集团有很多联系吗？

答：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处于某种中间偏左的地位，我在工会委员会中发挥一种仲裁人的作用，有点像王德威尔德在党内的情况。当我在电台工作的时候，我遇到了社会主义行动派的另外一个领导人瓦尔特·道格，他是法语台的播音员；虽然我和他没有共同观点，但我们是很有要好的朋友。

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使你对社会主义行动派有个概念。

^① 朱尔·德斯特雷(1883—1936)是他那个时代比利时的一个重要社会主义文人，是瓦隆运动的发言人。

^② 爱德华·安瑟尔(1856—1938)是根特的一个社会主义领导人，是合作社运动的一个创始者。

道格要我和他在弗兰尼召开一次会议，他是那里矿工的儿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标语：“瓦尔特·道格，博里纳日的矿工！”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矿工；“热夫·朗斯，来自安特卫普的一个码头工人将于8点钟在人民剧场发表演说！”当道格来布鲁塞尔工作时，他像我一样系领带，穿一条灰色裤子和一件入时的茄克，但在弗兰尼，他既不穿茄克，也不系领带，而且头发蓬松零乱，我们就这样发表了讲话。会议之后（按照瓦尔特的心理学观点，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到人民大厦的小卖部里喝啤酒，那里的经理——他是由合作社指定的——说道：“瓦尔特，你的行为是不正派的。”瓦尔特问道：“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工人面前就像你现在这样出现，好比朗斯先生，他至少是通过自己的穿着表明，他尊重我们工人。而你呢？你贬低我们工人，穿着你平时不穿的衣服出面。”这番话使我大为吃惊，我也在思想上敲了一次警钟。现在，道格的结局非常糟糕，他变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并且作为一个法西斯分子结束了生命。

我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人们还写得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提到的话。道格曾经安排托洛茨基和斯帕克在巴黎会晤过一次，我相信，这个问题还丝毫没有透露出来。我知道托洛茨基已经完全不记得斯帕克了，我从维克托·塞热^①那里发现了这一点，而且，我也从没有看到过托洛茨基有关这次会晤的文章。我多次问过斯帕克这个问题，但他总是回避。

^① 维克托·塞热(1890—1947)是比利时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曾经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由于他在西欧保护左翼知识分子而被斯大林释放出狱，免于可能的一死。塞热在布鲁塞尔一直生活到30年代末。

问：你可能会回想起斯帕克1949年在向社会党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所发表的一个评论，他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说，他刚刚第一次读了它，读后他认为必须作某些修正（笑声）。考虑到这一点，我怀疑托洛茨基是不是会对斯帕克产生极大兴趣。

答：不，斯帕克的评论不会产生这样的作用。

问：1933年，埃米尔·王德威尔德请亨德里克·德曼回比利时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德曼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劳动纲领”运动，你也积极参加了。这个纲领包括比利时工党为解决危机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旦选民授权给这个运动的话。后来，托尼斯、居特和德布罗克维尔的保守“银行家政府”崩溃了。

答：在一个周末，保罗·范策兰德^①领导下的政府取代了“银行家政府”，我们在范策兰德政府中发现了德曼和斯帕克。德曼使他的很多最亲密的合作者都极为失望，其中包括我、马克斯·比泽^②和伊莎贝尔·布鲁姆^③，这更多地不是因为他参加了政府，而是由于他参加政府的方式，他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警告，也没有进行说明，我们在我们的会议上再没有见到过他，他就是不来参加会议。德曼及其亲密的追随者和朋友习惯于参加每周召开一次的会议，一般的是在星期五，在议会后面的布里唐尼克酒店，在那里，我们为我们的下期周报

① 保罗·范策兰德（1893—1973）是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和基督教民主党人。曾在1935—1937年出任首相。

② 马克斯·比泽（1896—1959）是1945—1959年的社会党主席。

③ 伊莎贝尔·布鲁姆（1892—1975）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由于在冷战问题上与党发生冲突，在40年代末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

《纲领》作准备工作。德曼在当上部长后便不再来参加会议，也没有作任何说明，不管是书面的或口头上的。

斯帕克也在那个周末参加了政府。在紧接着组成政府的那一周，我们有一个学习日，就在党和工会所占有的海边一个疗养院里。我是乘火车去的，发现伊莎贝尔·布鲁姆在同一个车厢。有一个人走到我们这边来，原来是斯帕克。真是奇怪极了，令我惊奇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戴了一双高级皮手套，我以前从未见他戴过手套，我觉得很有趣。我没有多说什么，但伊莎贝尔·布鲁姆采取了攻势，她是一个说话声音很大的女人，她问：“你怎么能参加这种政府？你是社会主义行动派的领导人。”“我相信，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机会，一些有限的机会，我发现了我的机会，并且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就是斯帕克为自己参加政府所作的全部辩解。我必须说，他在政府中成了一个艰苦工作并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部长。在该政府组成之前的时期，工会运动中就有很多成员，特别是梅唐斯，就坚持把斯帕克开除出党，我总是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我说，我不认为斯帕克完全是一个极端分子，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我当时还很年轻，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判断。王德威尔德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上也采取同样的立场；他也没有被开除，他当上了运输部长，并且很快使运输工人的工会站在了他一边，因为他作出了为工人寻找工作的决定。他决定恢复布鲁塞尔北站和南站铁路联结处的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闲置的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停止了40年；当然，仅仅对布鲁塞尔，它就提供了几百个职业，而不是几个职业。

问：简言之，对斯帕克和德曼的行为的解释在于：一方面

是个人野心,另一方面是由于既定政府中的权力地位,他们可以服务于工人阶级,提供就业,改善生活水平。这的确正是范策兰德政府所做的工作。

答: 你决不应该忘记斯帕克属于这样一个家庭,无论在他还是个年轻孩子的时候,还是在他成为政治家的时候,他所从旁边走过的家庭餐桌上,坐的也都是诸如他的叔父保罗—埃米尔·让松^①、伊曼斯^②和雅斯帕尔^③这样的领导人物。对他来说,从家中的餐厅进入议会,只不过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些人,议会就是他的世界。他的母亲是社会党的一个参议员;政治仅仅是就权力而言的,在他们看来,只做一个议员是无足轻重的,必须做一名部长。为了能够认识斯帕克的动机,在你的头脑中必须有这个背景知识。

问: 然而,像斯帕克这样的人却为社会党人所接受,为什么呢?

答: 由于他非凡的雄辩才能。我认为,王德威尔德后来也一直在寻找吸引工人运动的青年分子。在王德威尔德这样的人看来,得到斯帕克是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所以他推荐他进入了有社会党人参加的第一届约瑟夫·沃特斯^④政府,他自己成了约瑟夫·沃特斯内阁的首脑。斯帕克有一种含糊不清、

^① 保罗—埃米尔·让松(1872—1944)是自由党的领导人,1937—1938年出任首相。

^② 保罗·伊斯曼(1864—1941)是自由党的领导人,1918—1920年和1927—1931年两次出任外交部长。

^③ 亨利·雅斯帕尔(1870—1939)是天主教党领导人,1926—1931年出任首相。

^④ 约瑟夫·沃特斯(1876—1929),是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和部长。

但比较现实的社会理论，这是毫无疑义的。

问：范策兰德进行了某些改革，尽管他所实现的比“劳动纲领”所包含的内容要少得多，他极大地降低了失业人数。后来，随着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总罢工爆发了……

答：1936年，法国的罢工爆发以后，我国的工人也完全自发地离开了车间，而且没有任何计划好的纲领。工人委员会办公署的成员集合起来说：“这将会是一次总罢工，我们必须提出一些要求作为罢工者的纲领公布出来。”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讨论，第一条要求是连孩子们也都感觉得到的，这就是极大地增加工资，由于贬值，价格上升了，而工资却没有跟上价格上涨的幅度。第二次是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每周40小时；而后，他们说必须把“自由结社”写进这个纲领，因为自由结社还没有为雇主所承认，特别是在瓦隆部分。这样，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会被推上了街，你不可能自卫。后来，我们的一个同志在队伍前进过程中插进来说：“我们必须要求得到6天支付工资的假期。”就这样，我们又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是正确的，在纲领的所有这几点中，最能够推动舆论的就是与有一个发工资的假期有关的一条。我国非工人的市民，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大多数同伴，一生中都没有假期。这次罢工是在6月初开始的，梅唐斯已经离开，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局的会议，几天以后，邦达斯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一心一意投入了这次行动，我想，我有一个月时间都没有在家睡过觉，有时候，我白天回家一小时、半小时，换换衬衣，亲吻一下妻子和孩子们。每天晚上都有三、四个会议。第一阶段是使工人离开工厂，紧接着就是与政府会晤，与范策兰德，与所有的部长，与

德拉特勒^①，有时与斯帕克，有时与德曼；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全国委员会会议；最后是在政府主持和参加的情况下与雇主会晤。生活就是这样，但这种生活很有趣。我已尽了自己所可能的最大努力。最繁重的工作在于结尾，在于结束罢工，向工人说明尽管他们没有赢得每一条要求的胜利，特别是缩短工时，但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们增加了15—20%的工资，最低限度工资定为32法郎；得到了结社的自由，赢得了6天发工资的假期，因此另外增加了2%的工资。但是你知道，正是在这个时刻，共产党人从黑暗角落里跳了出来，他们使工人们相信自己失败了。我花两周时间参加每一次粗暴的会议，甚至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他们使会议拖拖拉拉，所以使多数人厌烦，人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会场。最后，你遇到了极端主义分子的强硬核心，要取得对他们的胜利是困难的。罢工结束几周以后，我们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权衡一下我们所达到的和未能实现的目标。我们的矿工工会主席尼科拉斯·德蒂埃在会议结束时发言说：“我要宣布一项特殊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不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而是由全国委员会通过的。我希望我们此时此地就任命热夫·朗斯为工会委员会的正式书记。”我得到会议的长时间鼓掌欢迎，我当上了书记。

问：你是第四任书记。

答：梅唐斯非常细心。他作为代表大会的发言人，对我的成功显然比对他自己的胜利更加高兴。有一天他拜访了我，他说：“好了，在我们离开之后你还会继续留下来的，所以我们

^① 阿希勒·德拉特勒（1879—1964）是矿工工会的一位领导人，1935—1939年出任社会事务部长，并于1939年当选为比利时社会党副主席。

现在应该开始考虑我们的继承人了，你想想，看你打算培养谁，我们以后就可以讨论新的任命。”这样，我们提出了保罗·菲纳特、路易斯·马热和莱昂·瓦蒂隆；我真正喜欢培养的一个是矿工阿尔弗雷德·米塞特，但他的上司来找我说，“不要把他调走吧，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使我们工厂的斗争继续下去的人，一旦他离开，沙勒罗瓦矿工工会就不会再进行反抗斗争了。”我没有、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此后战争到来，德国人带走并杀害了他。

问：人们告诉我，如果你战后愿意当比利时总工会的书记，你能够很容易……

答：噢，你知道，你现在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问题之一。我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我由于没有回到比利时而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主要原因——这一点我还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过——在于，我没有回比利时是为了我的妻子，她开始变得——唉！我找不到其他说法了——讨厌，或者几乎是仇恨比利时了。在战争爆发时，我送她到北非她父母亲那里；德国人迟早都是会向前推进的，所以在1939年11月我说，“你最好还是到奥兰去，在那里等待未来事变的发展。”她去了，在那里呆了几个月；4月份，她既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回到了比利时。而后，当德国人进入比利时的时候，她暂时失去了理智。你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制造的残酷事件，所以她失去了理智，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逃到南方，她又疯了几周；战争期间我们分开了，战争结束时她到伦敦找到了我。我们有两个孩子，两个可爱的孩子，当我看到她对我必须回比利时感

到极为悲伤时，我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与我一块写书的多尔·斯默特曾经说过：“如果热夫·朗斯在1945年回到比利时，那么国家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就会有所不同。”1945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劳工局会议上，请我和路易斯·马热^①以及安德烈·勒纳德^②共同参加了会议。路易斯非常健谈，他说：“邦达斯就要结束他的活动了。”实际上，战前工会委员会中的退休年龄是60岁，邦达斯1941年就达到了退休年龄，1945年已经作出了他应该离开的安排。梅唐斯是在他60岁德国人进入时离开的，所以邦达斯取代了梅唐斯，我代替邦达斯作了代理总书记。根据安排，一旦邦达斯离开，我就继承他的位置。所以，路易斯1945年当着安德烈·勒纳德的面说，“邦达斯就要退休了，在今后几个月就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将提出辞职。菲纳特愿意取代这个位置，但我们二人一致认为不同意菲纳特，因为他的资格不够。安德烈想当总书记，但我不同意；我想当总书记，安德烈又不答应；不过，我们二人认为你应该接受这个位置。”

问：大概你是唯一一个能够与他们两个打交道的人。

答：是这样。佛拉芒人有一种说法：过去的事情不可能重演。

问：社会党人参加了联合政府，它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使许多军人愤怒，因为这个政府似乎并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

^① 路易斯·马热(1902—)是工会领导人，1952年以后为社会主义工会总书记。

^② 安德烈·勒纳德(1911—1962)是激进的工会领袖，1960—1961年总罢工的领导人，他后来创立了瓦隆人民运动。

的。王德威尔德到1937—1938年就失去了对党的控制……

答：对于王德威尔德，那是可悲的一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就我的观察而论，斯帕克一贯倾向于王德威尔德，但不是和他关系亲密，而是对他保持一种良好态度；德曼对王德威尔德比较冷淡，正如你可能从他写的东西中看到的，我认为，他关于王德威尔德的文章是令人讨厌的。

问：或多或少是他们迫使王德威尔德辞去了政府职务。

答：正是这样。我很高兴你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人们普遍不知道，王德威尔德不仅在看到希特勒当权之后把德曼召回国，而且尽其所能为他提供了收入。王德威尔德曾经同意一个工业家借给他大笔资金，以资助社会研究所；他任命德曼为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并给了他另外三个职务；他还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作调解工作，任命德曼为教授。所以我必须说，王德威尔德是把德曼作为一个真正有学识的人对待的，而他却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好处。你知道，我所批判的不是德曼的某些思想，而是他这个人；德曼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作为一个人，他是令人讨厌的。

问：你看，关于德曼我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自七八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对德曼似乎是越来越持批判态度。

答：不。我认为在30年代初，他对较好地分析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分析中间阶级的作用，分析中间阶级在物质和实际方面的无产阶级化并没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无产阶级化同步进行，都作出过贡献。他认识到，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干的那样，仅仅说国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不可能消灭民族社会主义，它还包括有更多的东西；资

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不可能形成有这么多人民群众参加的运动。但我也看到了他性格中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当然，那是多年积累起来的。

问：令人大为吃惊的是德曼在对外事务方面所选择的方向。我们从你所说的已经看到，法西斯主义并没有从内部真正构成对比利时的威胁，只要社会党人和其他党派采取一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政策；不过，来自外部的威胁却是千真万确的，王德威尔德比德曼和斯帕克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答：毫无疑问，王德威尔德、德布鲁凯和卡米尔·胡斯曼比德曼和斯帕克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对此，我思想上不存在任何疑问。

问：为什么？

答：也许是由于工人运动。社会党不应该参加政府，因为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布尔戈斯。^①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和佛朗哥和解，另一方面，政府之间的国际惯例，又总是迫使你实际上承认一个政府。

问：所以，为了追求实际成就，又一次牺牲了理想。在布尔戈斯事件期间，你是如何考虑亨利·罗兰^②1938年对斯帕克的指责的？罗兰说，斯帕克是“国际失败主义的代理人”。

^① 布尔戈斯是西班牙旧卡斯蒂利亚地区布尔戈斯省省会，1936年成了佛朗哥民族主义政府的所在地。——译注

^② 亨利·罗兰(1891—1973)是律师和社会党参议员，他曾经两次和斯帕克决裂，一次是他于1938年强烈反对和佛朗哥建立领事关系，另一次是他在50年代初支持建立欧洲防御共同体。

答：我认为罗兰比较正确。我不想深谈这个问题，因为对于党来说，选择只能是不参加政府，一旦参加政府，要摆脱斯帕克所采取的那种立场是困难的。

问：况且，伊莎贝尔·布鲁姆也非常正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斯帕克不仅采纳了错误的观点，而且，他是极其热情地采纳这些观点的。

答：是这样。尽管斯帕克采纳了错误的观点，但是由于他能言善辩，所以总是能够使党内多数人跟他走。

问：现在回头来谈谈你个人的立场吧。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德国入侵布拉格之后你在1939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代表着你对外政策立场的根本变化。到当时为止，就外交政策而论，你或多或少是遵从政府的立场的。你如何看待30年代的国际事件？为什么1939年3月表示出你的变化？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棘手问题。我是斯帕克政府的首脑，在我们看到政府政策的后果时，我们越来越相信这种政策是错误的。但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因此而采取离开政府和找到一种立场的步骤并非一件易事，所以在这个政府衰落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像我所认识到的那样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问：如果人们有可能重新生活在30年代，你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吗？

答：是的。我将不参加斯帕克内阁，肯定不参加，我将保持自己在工会运动中斗争和表达意见的充分自由，正像我在离开政府之后非常有生气地干过的那样，这一点我已经谈过

了。

问：社会党参加了一个它不能不为某种社会经济利益而牺牲意识形态要求的政府，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吗？

答：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不同于你前面提出的问题，在你前面提出的问题中，你说你知道你现在了解的情况；你前面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参加一个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政府。我认为，我们参加政府主要是为了尽最大努力消灭失业。当时，人们不得不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恐惧气氛——失去职业——之中，这种恐惧笼罩着每一个工人家庭。我认为，范策兰德政府改变了这种局面。贬值的結果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恢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有近10万人失业。

你不应该忘记，有一个问题使法西斯主义问题复杂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我们在欧洲工人运动内部，在欧洲的一切地方，都几乎把和平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点予以灌输；在希特勒已经当权并在使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时候，我们却还在实践那种迷信。所以，在我们方面不止一个弱点，这是真正的一个。我要说，英国过分强调和平主义了，不是和平主义者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愿意正视德国正在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危险，但在我准备自己的文章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我第一次认识到不能不从权力出发去进行思考，这是希特勒对我思想的促进，希特勒所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权力；但这却不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

问：你认为，你是在什么时候肯定了希特勒正在策划一场夺取欧洲的进攻性战争的？

答：1935年。当时，在一所大学的公共课程就我的防御

论点进行讨论时，有一个教授使我注意到了希特勒对和平的威胁。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作的总结是相当理想的，但我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我说，希特勒那样的社会经济统治，不可能经得起它自己的舆论的长期压力，那样的政权迟早都会从内部瓦解；这个教授问道：“你是否完全不认为，那样的政权会在它所挑起的战争中由于外部干涉而崩溃吗？”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

问：尽管你看到了德国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但在当时，你认为英国和法国强大，足以像 1914 年那样抵挡德国，这样说不正确吗？

答：这样说我想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完全错了。例如，我真诚信地相信法国军队是无敌的，即使在波兰陷落之后。当时还有一种宣传运动，你也许看到过整个法国都贴有那些用三种颜色写成的像一堵墙那样巨大的标语：“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看到，一侧是法国军队的形象，另一侧是英国舰队的缩影。

还有，你知道就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希特勒夺取政权是一次非常迅速的行动。工人运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痛苦经历，已经发展了一种和平主义观点，对于这样一个运动来说，要抛弃这种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在看到德国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希特勒确立他的权力那样，如此迅速地抛弃我们的和平主义。他走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当然，就是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反对民主的权力。你知道，民主的理想必须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和各种会议等发展起来。

问：你曾经向我指出过，德曼很快就认识到了民主政体的弱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德国的强大，他决定尽力使比利时不要卷入战争之中，并且在30年代末就准备了与德国合作的基础。

答：像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通过采取那种立场可以保持我们国家站在战争之外，对于我仍然是个极大的谜。

问：对于他期望或希望从采取这种立场中得到什么，你有所了解吗？

答：在考察了他后来的行动以后，我丝毫也不惊奇的是由于他的阴暗心理，他没有看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他没有决心使自己适应于那种统治，没有企图在那种新的机制内，在新秩序中为工人运动作出最大努力。如果说在希特勒实际蹂躏比利时之前，这一切就已经存在于德曼的头脑中，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然，我并没有证据。这还是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但看到德曼那样迅速地穿过边界，力图与新的独裁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解散旧的工会运动，建立在他领导下的新的运动，我对这个问题也就不觉得有任何惊奇了。

问：你曾经说过，德曼沿着反民主的道路发生的变化，是以两个问题为基础的：他认为民主国家在对法西斯主义作出反应时，它们暴露的弱点越来越多；他想当首相的大野心未能实现。

答：是的，我过去认为是这样，现在仍然认为是这样。现在，在欧洲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间，第一次对民主政体的弱点，对民主政体无能于正确解决我们时代的实际问题，提出了

广泛的批评(在荷兰、法国、我国以及奥地利,我都看到了这种批评);当然,如果你采取这种批判立场,你的倾向性会更大,一旦民主政体在对付这种新政权时失败的话。但从根本上说,德曼在1940年德国占领这个国家以后的所作所为,否定了他在很多著作中所说明的他自己的理想,例如在《社会主义心理学》和《社会主义理想》中;他的行动与他的理想是对立的。我正是在这里发现,德曼这个人是一个失去了身分的思想家,别无其他解释;作为一个人,他是令人讨厌的。

好了,我对你讲过我与德国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联系吗?①你知道威利·艾希勒这个名字,这个人在确定战后德国社会党方向的过程中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他属于德国社会党的这个很小、但非常非常有趣的部分,因为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而是把新康德主义作为推动其社会主义信仰的动力,他们相信一个叫做纳尔逊的教授的哲学。如果我记忆正确,纳尔逊是在马尔堡大学教书,他写了一本书,把社会主义置于伦理学的基础之上,这种思想成了自称为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这个组织的旗帜。纳尔逊很年轻时就去世了,我想是50岁,或者不到50岁,威利·艾希勒担任了这个组织的领导工作。他们人数不多,但极富献身精神,他们多数人没有结

① 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一个组织,它在希特勒当政之后继续进行反纳粹的斗争,特别是在国外。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威利·艾希勒(1896—1971),他在1924—1925年期间是哲学家列昂纳德·纳尔逊(1882—1927)的秘书。艾希勒曾经受到纳尔逊关于社会主义和伦理学的关系的思想的鼓舞。战后,艾希勒是德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关于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进一步情况,可参看沃纳·罗德的《1940—1945年格罗斯布里坦尼德国社会主义的流放组织》(汉诺弗1968年版)。

婚，尽管也有人结婚。他们共同生活在5—10个小组中，他们建造房子，把他们所有的收入都放在一个口袋中，只用很少的钱购买个人必需品，大部分都用于以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为目的的活动。冯帕潘当政之后，工人运动出现了极大混乱，年轻一代德国人的大部分感到无所适从。突然，一种新兴的日报《星火》出现了，一连几周在街头出售，它每期印刷四版，售价很低。它丝毫不像是宣传品，它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甚至基督教工会成员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它刊登的那些用极不平常的德语写的文章，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听起来像是在呐喊，它引起了轰动。但它对德国领导人没有产生影响，从道义上看他们已经死亡。几个月之后，这个报纸就销声匿迹了。接着，我便第一次听到了有关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存在的情况，它使我深感兴趣。

1939年9月或10月战争爆发后的一天，有一个自称叫皮埃尔·罗贝尔的人来找我，他的真实名字叫勒内·贝托勒特，出身于日内瓦一个老社会党人的家庭。我认识他的哥哥，当我后来居住在日内瓦的时候和他同属一个社会党支部。皮埃尔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他的目标是在德国活动；希特勒当权之后他仍然留在德国。他出版同一个《星火》报纸，反对希特勒，他曾被捕、受审和被判三年徒刑，于1936年获释。他1939年来见我，并且在寒暄了几句之后说道：“好，我不知道你对我打算提出的事情是不是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反问说：“你已经讲了不少，但又没有讲多少，有什么事情要办，就请讲吧！”他说：“我属于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这使我极感兴

趣，“我们有很多人已经转移出来，并且已经在巴黎建立了我们的中心。我们已经与第五局^①建立了联系；由于法国和英国目前正在和德国作战，我们觉得应该联合他们，为他们服务。”我问他有哪些服务项目。“我们在德国周围的所有中立国，破坏向德国运送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一切商品的火车和船只，所以，我们既需要有假护照，又需要有弹药。”我问：“你们已经组织了这样的小组吗？”他回答“是的。一旦你听到他们归什么样的人领导，你一定会吃惊的。我们在丹麦有一个小组得到丹麦工会联合会著名领导人延森的帮助；在荷兰，我们的小组以非常积极的埃多·菲门^②为首，他是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总书记，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尽管他政治上有点中立；我们在卢森堡有两个人”（其中一位战后当上了工党的部长），“在瑞士有社会党主席汉斯·奥普莱特博士，他个人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在南斯拉夫还有一个人，我忘记了名字。“然而，我们在比利时还没有人，我一直在考虑你；不过，你负责调整工资与价格的关系，负责限制价格等所有这些重要问题，所以我想，你的工作已经太多了，不应该参加这个活动。”我问：“这种活动包括哪些工作？”“在你了解到的装运可能和将要用于战争目的的物资的火车上放置炸弹；或者，用一块磁铁把炸弹放在船的吃水线以下。这些炸弹都是定时的，你可以在72小时的范围内调整爆炸时间。”我有点害怕。我说，“我不能立即回答，给我24小时考虑一下。”我决定把这个问题向邦达斯

① 法国军队的情报机构。

② 埃多·菲门(1881—1942)是荷兰工会领导人，他作为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书记发挥过重要的国际作用。

提出来，如果他说干，我就干。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觉。我刚刚从钢铁工人联合会那里收到一件礼物，一个带有4个抽屉的大钢制桌子，我想，可以用它来存放炸弹。我首先告诉了邦达斯，他听完这件事以后说：“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如果你有勇气，你就干。”当皮埃尔·罗伯特又来听我回话时，我问：“我怎么干？”他解释说：“几天或几周以后，会有一个自我介绍叫奥托的人来找你。”奥托·普菲斯特就是他的真实姓名，巴伐利亚的一个大个子伐木工人。一连几天和几周都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后来有一天，我正忙于写一篇文章，秘书进来说：“朗斯，有一个叫奥托的人想见你。”奥托进来了，他个头很高，比我高出一头，带着两个显然是很重的旅行袋。他说：“我叫奥托，我想说明一下工作如何进行”（他没有作任何自我介绍）。这些炸弹看上去小巧玲珑，你可以放心地把它们藏起来；这些炸弹分三部分，一是炸药，中间部分是定时器，第三部分是引爆装置。由于三部分互相分开，所以不会发生问题；但如果把三个部分组装起来，上了钟表的发条，并且把引爆装置放在一定的时间上，那就是危险物了。我问他爆炸力如何，他说能够“把这整条街送上天空”。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抽屉里面。这次谈话之后，我在列日建立了一个小组，除了其他人以外还有两名德国人属于这个小组，他们住在韦尔维埃，是父子。我每10天坐头等车到那里去一次，带着两个装满了炸弹的旅行包。有一次，生产军备的最大工厂科凯利尔工厂的厂长就坐在我对面，我带着两个旅行包坐在那里，和他谈论关于比利时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久以后，我决定让路易斯·马热参加这个工作，这样，

我们就有了一个了解安特卫普港的人。这个工作的最后一次，我们是一块干的，我们晚上7—8点之间离开了德国边界上的圣维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德国领土上的一个地方）；那里停着一整列装满了供飞机使用的大量排炮的火车，它们是由比利时一个炮火制造商昂勒伯特制造的。我们必须把定时器置于58小时的较长时间的位置上。我们在8点钟离开之前，问了我们的同伴、一个铁路工人有关德国一侧的形势，他笑了笑回答说：“最近几天听到了要越过边界的谣传，我们想，那一定是个重要日子，但今天一切都很平静。”马热和我乘列日到安特卫普的直达列车，晚上11点钟到达，次日早上6点钟，路易斯·马热又来到我家中，因为德国的入侵从5点钟开始了。这就是你问的我干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占领前的抵抗，违犯了中立的惯例，我们是带着负罪的心情这样干的。1941年9月我到达美国，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战时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你知道当时乘飞机旅行是什么情况，在飞机到达时，乘客的名字都写在一张纸上，斯帕克和我住在圣里吉斯。我几乎还没有打开箱子，门铃就响了。“朗斯先生，我是奥托。”“谁？奥托？”“奥托·普菲斯特。”我几乎是大吃一惊。“你从哪里来？”“我就在纽约。”就这样，他和妻子都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把他被捕和逃跑的情况都讲了一遍，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自愿参加了美国军队，1945年作为伞兵跳落在德国的后方战线进行战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当时，他就要在安特卫普乘一艘军用船只回美国去。我从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人们那里听说，他在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找了一个工作。

奥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们都是好人。皮埃尔·罗伯特在巴黎南部的平多拉马组织了一个由德国工会赞助的庞大技术援助项目，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他们都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战后，威利·艾希勒是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①的作者之一。

问：德国入侵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工作？工人运动有准备吗？

答：是的，我们作了准备，我们预料到战争会使我们遭到袭击；不过当然了，人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根据最后一次战争的情况去看待新的一次战争，所以我们想，至少总还会有部分比利时领土不被占领，那里可能就是政府迁往的地方。完全与社会党保持一致的工人运动决定，一旦政府迁址，我们也迁往同一个地方。我们认为政府可能迁到奥斯坦德，我们就到了那里，但政府已经预订了所有的旅馆和公寓，我们找不到一间房子，所以，我们决定到科西日德，该地与奥斯坦德相距不远，靠近法国边界，在那里租了一个大别墅。我们在奥斯坦德遇到了德曼。5月10日上午，工会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到了比利时总工会，德曼也来了一会儿，我们完全公开地讨论了我们能够到科西日德并驻扎在那里的的问题，德曼在场，一言未发。德国占领整个比利时以及比利时军队无条件投降以后，德曼为此事对工会领导人进行粗暴的攻击，指责他们花了工会成员的钱而又擅离职守，这个问题又是德曼阴暗心理的一个说明。如果他必须批评那个决定，他应该在我

^① 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个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们讨论的时候就提出来。

我们就这样到达了科西日德。在大街上，我们偶然遇到了两名部长巴尔塔扎和苏当，他们说：“德国人进展非常迅速，他们几天之内就可能占领布鲁塞尔。”当时我吓坏了，我想到德国人可能进入我们的办公室，发现那些炸弹。所以我对妻子——她当时已神智失常——说，“我必须到布鲁塞尔去，你在这里等候。”她几乎吓死了，担心我会被抓起来。我把这个危急情况告诉我弟弟，他有一辆车，我们顶着逃难的人流驶向布鲁塞尔，人们没有料到我会在星期二到达那里。这是召开办事处会议的日子，但已经宣布取消，所有的职工都在场，只是没有一个办公署人员。我说：“我们不能不这样决定了。我的抽屉里还装满了炸弹，必须把它们弄出去，因为一旦德国人发现，就会以此为把柄反对工人运动。”在这些职工中，有一个是白领工人联合会的门房，他说，“在我们联合会院子里有一个小洞，你可以把炸弹放进去，它们会流入塞纳河水中去的。”我们跑了两趟，把所有的炸弹都放进了白领工会联合会院子的小洞里。你可以想到，如果德国人发现这个职工，他们将会怎么做。事情办完以后，我和弟弟又回到了科西日德。

我们从科西日德又到了南特和特拉威尔的皮尔塞，这里，邦达斯知道书记处的所在地。紧接着德国人入侵以后的几周，是我一生中唯一最黑暗的时期。对我们来说，法国人无条件投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8月12日，我们在图鲁兹召开了比利时总工会办公署会议，我们决定了三件事：一，在敌对时期停止比利时总工会的活动；二，发给总工会和各大联合会书记一年的薪水，而后自谋生计；三，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他认为必

须从事的工作，留在法国，回到比利时，或者是到英国去。我去了英国，在那里见到了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所有领导人，后来又有很多工会成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英国，我应邀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每周一次，一次用法语，一次用佛拉芒语。

其中有一次是直接对德曼讲的，我一开始就对他说，他的行动是多么令人失望。我告诉德曼：“我实际上认为你是四重叛徒：由于你企图与侵略并占领了我们国土的那些人合作，你成了你的国家、我们的国家的叛徒；我们党所坚持的一切与希特勒是完全对立的，你成了我们党的叛徒；我认为，你的行动违背了你在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心理学》中所倡导的信仰，你成了你自己的理想的叛徒；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对你极为信赖，你成了所有这些人的叛徒。”人们告诉我，德曼听到了这次谈话，他对此耿耿于怀。

问：你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对社会主义富有价值？

答：我要说，间接的和一般的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间接的和一般的是什么意思呢？工人运动内外都有人相信，经济因素对于社会生活总的说是决定的因素；但只是间接的看，因为在宣传这种观点的那些人中间，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即使是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中，所以我说，马克思著作的直接影响是相当小的。我认为，他们读的著作很少超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

问：在你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你曾经在某个时候受到马克思的强烈影响吗？

答：是的。不过非常奇怪而又非常不奇怪的是，我认为我更多的是受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写的文章的影响。三年前我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亨德里克·德曼 1932 年论述马克思手稿的文章，该手稿是 1930—1931 年才发现的，篇名是《哲学和经济学》。

问：对你来说，比马克思更重要的理论影响是什么？

答：首先是饶勒斯和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①，厄里塞·勒克吕，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在以后的年代里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当选议员之前的克里普斯，^② 费边社以及兰斯伯里。^③

问：对于整个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呢？

答：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但主要是通过王德威尔德。我认为，王德威尔德对党的领导的理论影响是巨大的，首屈一指。

问：你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方向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严重差异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降了吗？哲学的影响普遍降低，而实用主义态度加强了吗？

答：我认为很像是这种情况。例如，一种新鲜的或新的乞求于心灵的调子被安德烈·勒纳德引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之中，不过，那完全是表面上的，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成为过去。

^① 蒲鲁东(1809—1865)，是影响很大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他鼓吹互助论和联邦主义。

^②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889—1952)，是英国的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947—1951年任财政大臣。

^③ 乔治·兰斯伯里(1859—1940)，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1931—1935年为英国工党领袖。

问：战争时期，你一直在直接为流亡的比利时政府工作，你发挥了什么样的特殊作用呢？你担任什么职务？

答：我的头衔是政府顾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一个顾问，我的特殊职责是：为解决战后问题准备方案，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后来变得很大的委员会。

例如，我们非常具体地为战前尚不存在的国务院^①准备了工作条例（它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实行了）；后来，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比利时居民对于谷物、石油、肉类等等的需要。我们用出售刚果矿产所得到的收入去购买小麦。

1943年，皮埃洛特请我作政府成员，我没有接受，我不认为我能够帮助政府，也许我是错误的。我说，我没有选民的授权，参加政府不会加强它的工作。政府只能由一个来自被占领的比利时的左派抵抗运动的人士组织；在我所推荐的政治人物中，皮埃洛特挑选了邦达斯，我曾经给成为政府成员的邦达斯写过信。

问：比利时不同于像法国这样的其他一些国家的问题是，它在战争时期就整个一系列问题达到了普遍一致的意见，这有助于比利时从自由主义社会过渡到福利社会。

答：的确如此，这是因为有了在整个战争时期都会聚在一起的来自不同党派、并且在小范围内发展了这种精神的人物，他们把这种精神扩大到了该国的其他人中间。

问：社会主义在比利时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时刻也许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期间，当时，社会主义理想为其他集团，为

^① 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管理机构，它通过政府协商研究立法建议的合法性。

其他党派所接受。在其中每一种情况下，你们都提出过一种比较接近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一致意见。这样说正确吗？

答：我说不是社会主义理想，因为那样说会引起不满，而是社会主义党派在以前提出的社会理论，后来也为其他党派所采纳。就此而论你是对的。

问：你如何估价比利时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

答：第一个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选举权，其次是一次大战后开始的每周工作 40 个小时，再次是建立劳资调解委员会，雇主被迫坐下来和他们的雇员共同协商，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还记得当一个雇主上街时，雇员们靠墙站立向他鞠躬时的情况，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最后，我想就是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个伟大的里程碑、1936年总罢工。

问：失败的情况怎么样？你认为有重大失误吗？

答：我是顺应目前形势的，但我认为，这种形势的弱点在于，工人运动没有能够保持它的团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党的工会有75万名成员，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会只有15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党工会有60万名成员，他们的人数下降了；基督教民主党工会达到了30万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目前，基督教民主党工会有120—130万人，我怀疑社会党工会的人数是否会超过100万。就社会党在主观上的问题看，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上人们会说，你们现在的会员人数是过去的5倍，但我不这样认为。你知道，工人们并不总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正像我从前遇到的情况一样。在结束了1936年罢工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

说服工人，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工人运动已经使工人的状况有了巨大改善，但它没有能够使他们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们最严重的失败。

问：对于社会主义分裂为佛拉芒一派和讲法语的一派，你作何感想？

答：我认为这是个悲剧，但它发生了。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佛拉芒民族主义，像一条蛀虫一样在内部起作用。有一些很小的佛拉芒民族主义的集团，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不同立场，他们对天主教党的年轻领导人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影响，一旦这些领导人接受了民族主义者的看法，他们在成为政治家的时候就会坚持这种看法。反过来，这些领导人还会影响自由党和社会党，它们在这类问题上也不比天主教党逊色。所以，在佛拉芒天主教派决定组织他们自己的党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争相效法，他们与原来的党派决裂，组织了典型的佛拉芒社会党和佛拉芒自由党。正是通过这些党派，佛拉芒人民受到了一种我认为是不幸的影响。

问：1944年，你决定不返回比利时，而留在国际组织中工作，从那时到你回到比利时为止，你作了些什么工作？

答：国际工人组织中一个官员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我历来认为，我是作为一个战士在发挥作用；我认为，我作为战前工会领导人的作用，和我作为国际劳工局官员的作用之间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除了活动的舞台以外。为了我认为应该属于工人的平等，我总是公开地积极出面活动，有一次，我决定采取公开立场，反对船主的观点，这使我在该组织中很不受欢迎。

迎,而且也使我不太受某些政府的赞赏。但我认为,我可以说我促进了世界不同部分的社会问题,向着进步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特别是在远东和南非。

问:你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它建立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吗?

答:不,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达到了它的主要目标。就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而论,它是一个无休止的使人类最优秀的东西不断产生并且在公共生活中发扬光大的变化过程。我的确认为社会主义与伦理价值观念有关。

人类自身有最坏的和最好的东西,以希特勒那样的运动为例,他们推动群众中最坏的东西发展:憎恨外国人,憎恨居民中的某些集团。我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以努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为基础的,在这种社会里,人类本身最优秀的东西——正义和渴望自由将占居上风,这是一种每一代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目标而不断进行的努力,这些目标又会一代一代的变化。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越来越完善,所以,可能就日益难于像王德威尔德、饶勒斯、倍倍尔以及马克思那样清楚地看到这些目标了。在他们的时代,社会(至少对于前三个人来说)显然是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情况已经结束,而是说不那么明显了。我们经济制度的整个活动,与100年前相比已经复杂多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不只是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都有一个任务,我们开始看到了这个任务;为了恢复最低限度的正义和幸福,仍然有大量要做的工作,一旦人们知道印度和南非正在发生的情况的话。我过去讲过,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在1944年没

有返回比利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令人欣慰的是，我能够看到世界各地的非正义、压迫、不公平待遇和剥削，我对此进行了斗争，我想，这是我作为国际工人组织一名官员所能够进行的最好的战斗。然而，欧洲工人运动却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刻不容缓的政治目标；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政治目标，在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中，我认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人是勃兰特。

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首要目标是关心第三世界的发展，这是一个尚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目标。我们还没有学会作一个世界公民。

第三章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引 言

我认为，社会党只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阐述当代意大利的问题，这就是里卡尔多·隆巴尔迪^①。

——乌戈·拉马尔法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是意大利左翼，实际上也是当今意大利最受人尊敬的老资格政治家之一。他由于强调社会主义有责任提供一种名符其实的社会—经济选择而对他的党的理论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隆巴尔迪主要关心的始终是精心设计一幅民主社会主义的蓝图；他认为，政治联盟是一步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据说，隆巴尔迪是一位理论家，而不是一个注重实际情况的政治家。的确，他和他的盟友从来都没有控制过社会党，尽管他们有相当大的影响。但难道他比南尼^②更不注重实际吗？

^① 引自富里奥·科伦博编：《战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纽约1981年版，第145页。

^② 彼得罗·南尼(1891—1979)，1921年担任《前进报》主编，30年代成为意大利社会党主要领导人，直至去世。

二次大战后，南尼先是支持同共产党人组成人民阵线，后又在60年代支持同天主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从而导致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使党丧失了独立性，丢掉了选民。克拉克西的政治活动也没有使社会党的选票在1983年有明显的增长。在1946年战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得到的选票不相上下；但在今天，共产党得到的选票却几乎是社会党的三倍之多，意大利是西欧唯一一个共产党比社会党更强大的国家。

为了了解意大利社会主义长期处于软弱无力状态的原因以及隆巴尔迪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回顾一下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北方的工业地区为社会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1870年以后，许多对统一的结果已经不再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是马志尼—加里波第的复兴传统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同时，波河流域的无地农民也被社会主义运动所吸引。

派别活动从开始至今天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祸根。革命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分庭抗礼，相互攻击，而工人运动的大部分又怀疑一切政治活动，属于无政府的工联主义。巴枯宁为改变意大利政治现状而进行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从1900年到1912年，改良主义者在该党占了上风，部分地是因为自由党领导人和长期担任总理的乔瓦尼·焦利蒂同社会党进行了合作，以社会立法换取他们的有力支持。意大利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的关系，同法国社会党人（至少是饶勒斯派）和激进党的关系很相似，都致力于政治世俗化。

然而，1912年的利比亚战争在社会党和掌握该党权力的

左翼之中，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对，该党最狂热的成员之一，贝尼托·墨索里尼成了党报《前进报》的主编，普遍的罢工和激烈的示威游行发生了。在本书《导论》中，我们已经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墨索里尼时期，意大利国内以及来自国外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相对来说是弱小的，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和卡洛·罗塞利创立的一个新的运动——自由和正义运动，它企图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综合在一起。社会主义者在1930年终于又重新统一了，他们宁愿与共产党人言归于好，也不愿与正义和自由派建立密切关系。1934年，社会党和共产党签订了《联合行动公约》，除1939—1941年苏德条约这段时间外，这个条约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续到1956年。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认为，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分裂是法西斯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分裂。实际上，由于社会党人在组织上的软弱和不团结，所以该党在联盟中从来都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成为左派中占统治地位的党。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盟军在南方登陆，德国人占领着北方，在那里，由共产党人以及正义和自由派的产物——行动党所支配的党派活动大规模发展，而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党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很小。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对继续保留意大利君主制持强烈反对态度，因为君主制在20余年的时间内同法西斯主义结为联盟，政治上表现灵活的共产党人同意先撇开君主制问题，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即使在那时，陶里亚蒂就已经在考虑同右翼搞“历史性妥协”的可能性。

在法西斯主义时期，里卡尔多·隆巴尔迪一直是一名积

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先是人民党左翼的一员，后来又参加正义和自由派以及行动党。他是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参加了反对德国人的暴动，并且在米兰解放时被任命为当地的高级官员。

意大利解放后，行动党的领导人帕里^①领导的内阁取代了不受欢迎的博诺米政府，这个内阁从1945年6月20日持续到11月24日。政治活动已经使抵抗运动的神秘色彩日益消失，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大选，行动党就会真正成为一个总参谋部，德加斯贝利^②和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三党联合的政府取代了帕里内阁。1946年6月2日的大选，使这三个党分别获得了18.9%、20.7%和35%的选票，行动党人的选票只有1.5%。

但是，这样的结果多少有点靠不住，原先投票支持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调的左翼政党的许多选民，后来都投票支持中间党派了。尤其是社会党的力量证明是暂时的；社会党确实有大量潜在的选民，但它再也没有能够赢得20%居民的支持。社会党人缺乏那种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相抗衡的组织力量；同样重要的是宗派已经复活，这是南尼不顾冷战已经开始，仍然决心保持与共产党联合行动的结果，因此引起1947年的分裂，萨拉盖特^③和社会民主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这

^① 费鲁乔·帕里(1890—1982)是一名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意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中代表行动党，1945年6月至11月担任总理。帕里是行动党右翼的首领，行动党分裂后参加了共和党，1948年被选为参议员。

^② 阿利奇德·德加斯贝利(1881—1954)是人民党瓦解前的领导人，他在梵蒂冈渡过了法西斯主义时期，他支持共和国，是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并于1944—1953年担任总理。

种形势与1922年相似，社会民主派、最高纲领派和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分崩离析。在整个这段时期内，里卡尔多·隆巴尔迪一直领导着党内反对南尼人民阵线的独立自主的潮流。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和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促使南尼打破了与共产党的联盟，考虑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同样，天主教民主党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愿望，考虑向左翼敞开大门，特别是梵蒂冈的政策在约翰二十三世统治下发生变化时；结果，社会党在1963年进入了政府。南尼像他过去支持同共产党搞人民阵线一样，坚定不移地支持同天主教民主党言归于好。隆巴尔迪希望社会党同天主教民主党保持距离，提出了一种进行社会主义选择的和革命改良主义的理论，在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这两大政治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使社会党成为从根本上对意大利社会进行长期改造的工具。“向左翼敞开大门”的政策使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66年迅速重新统一起来，但导致了社会党左翼脱离社会党。1967年，两党的重新统一又一次崩溃，使社会党在1972年大选中仅仅获得9.6%的选票。社会党人在政府机构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在组织和选举方面的弱点却有碍于他们对政策发挥较大的影响。意大利共产党在左翼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它的欧洲共产主义吸引了许多新的拥护者。

隆巴尔迪支持一个有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参加的、能够沿着他的进行社会主义选择的路线进行改革的政府。但这种政策从未为社会党所欢迎，也没有为共产党所接受。贝林格于

③ 朱塞佩·萨拉盖特(1898—)是战后意大利社会主义中社会民主思潮的领导人和1947年的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他1964—1971年担任意大利总统。

1975年提出的“历史性妥协”，也是号召与天主教民主党，而不是同社会党达成谅解。

1976年，贝蒂奥·克拉克西取代了弗朗切斯科·德马蒂诺^①担任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希望沿着法国那样的其他欧洲社会党的路线，促进意大利社会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1978年，克拉克西开始攻击意大利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的目标是夺取共产党在左翼中的盟主地位，试图使社会党重新获得力量，以便加强党在政府中的影响。为此，他决心组织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政治联盟。他的主要政治主张，同隆巴尔迪强调的结构改革大相径庭。南尼于1979年12月31日去世后，隆巴尔迪当选为社会党主席，但由于同克拉克西的冲突，他在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便告辞职。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访问记

里卡尔多·隆巴尔迪：

我是一个军官的儿子，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教育我长大成人，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锲而不舍地坚持对我进行宗教教育。我是一名工业工程师，曾就读于米兰工艺学院，多年从事工程师职业，同时，我从18岁开始就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由于我成长于宗教世家，所以在1921年前一直

^① 弗朗切斯科·德马蒂诺(1907—)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行动党成员，战后，他是社会党的领导人，并于1962—1968年担任社会党总书记，是克拉克西的反对者。

属于新的人民党^①，我在该党左翼中，也就是后来以议员圭多·米廖利^②命名的所谓米廖利派中活动。后来，我离开了人民党，因为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分子在那几年里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恐怖活动，而人民党却没有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非常充分地发挥作用。我在工艺学院学习期间以及结业之后，都一直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尽管我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不过，我和几乎所有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都保持联系，我活动的重点是搞地下出版物。

在1930年的一次公众反对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示威游行中，我被逮捕了，不是被警察，而是被法西斯主义分子；我被严刑拷打，失去了一个半肺叶，这就严重限制了我整个一生的活动。照医生的说法，我只能活到40岁，而我现在已经80岁了！在那次示威游行中，我处在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官方警察的两面夹击中。法西斯主义分子指责官方警察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抓住我，而官方警察即墨索里尼的OVRA（特殊公共安全机构）^③则极力大事化小，正是由于这种冲突，我才得以死里逃生。特殊公共安全机构的副手彼得里洛曾经很坦率地对我说：“你很幸运，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你杀掉，但那些白痴

① 人民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就成立的一个具有天主教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

② 圭多·米廖利（1879—1954）是律师和天主教工会的积极分子，是人民党左翼的领导人，他坚决支持将大宗财产以小份额所有的形式分给农民。由于他主张和马克思主义左翼合作反对法西斯主义，所以于1925年被人民党开除，他在流亡期间仍然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主义。

③ OVRA没有任何字面意义，它是特殊公共安全检查机构的缩写，是国家警察的一个部门，据说，它的目的是对付秘密反对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斗争，它经常与法西斯党的警察—国家安全自愿民团发生冲突。

一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他的原话)却把这件事给弄砸了。”此后,我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1939年以后,斗争甚至更加深入广泛。1943年巴多格利奥政变^①发生了。

问: 当时,你和你的同事采用了哪些行动手段?

答: 我一直下决心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任何可能成为我秘密行动证据的文件。在警察档案里曾出现过一个条子,是向墨索里尼提供的,它写到必须注意隆巴尔迪,他非常狡猾。我应当承认是这样。我干活,我做工程师的工作,因此,别人说不出什么来;我有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一家德国人生产汽轮机和化学产品的工厂里做事,因而我有双重掩护。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成功地走过来的。除了两次被捕以外,我总是孤单一人,虽然我非常积极。在那些年月里,我不仅和社会党人,而且还和在意大利设有地下机关的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在1926—1931年这几年里,我同共产党很接近,但从不隶属于它;在他们派往巴黎去的领导人牺牲之后,为了重建在巴黎的共产主义中心和意大利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系,我和他们一道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一个他们所信赖的人。我同共产党的联系是在1930年该党的路线改变之后中断的^②。那些我极信赖的共产党人被开除了。共产党采取了一种十分宗派主义的立场,所以,以前那样的情况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① 1943年7月末,法西斯主义的大国民议会驱逐了墨索里尼,由军队总参谋长巴多格利奥元帅取而代之,墨索里尼被关押起来;后来,墨索里尼得救并被带到意大利北部,在那里,他在德国人的保护下建立了所谓萨洛共和国。

^② 1930年该党路线改变指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步共产国际后尘,指责其他左翼运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政策曾遭到塔斯卡的反对,但他被开除了。

我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个人而不是政治上的联系。这样，我参加了一个新的运动——正义和自由运动，实际上，在这个运动正式形成之前，我就已经卷进去了。1926年，禁止政党活动和各种运动的特别法令实施时，我就同埃内斯托·罗西^①和里卡尔多·鲍埃尔^②合作，把一批受迫害的政治人物秘密地迁居到了国外。

问：30年代，你和在法国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有许多接触吗？

答：法西斯时期我到了国外，我是以秘密方式去的，所以同外界的联系很有限，比如说，我联系过的意大利人有屠拉梯^③、莫迪利亚尼^④等，有在法国和瑞士的共产党人，以及塔斯卡^⑤——在他被共产党开除以前。1942年，我是行动党创始人之一。该党由两部分人联合而成，一部分包括来自正义和自

① 埃内斯托·罗西(1897—1967)，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中，是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活动分子，1929年的正义和自由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30—1943年被监禁，战后，他是欧洲联邦主义的主要鼓吹者。

② 里卡尔多·鲍埃尔(1896—1982)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的新闻记者，帮助过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者迁居国外，1927—1928年遭监禁。他是正义和自由运动的创始人，从1943年起到意大利解放，是行动党军事组织的首脑。

③ 菲利波·屠拉梯(1857—1932)，是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是该党的改良派首领，他支持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1922年，由于他提出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制止法西斯主义而被开除出社会党。他于1926年在帕里和卡洛·罗塞利的帮助下离开意大利，并且成了流亡中的反法西斯主义派的领导人。

④ 古伊塞普·莫迪利亚尼(1872—1947)，是社会党领导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参加过重建流亡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

⑤ 安杰洛·塔斯卡(1892—1960)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右翼领导人，他反对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路线，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他到了法国，同法国社会党合作，维希政府时期他当新闻记者。他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史》仍然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杰出的著作。

由运动的许多社会党人；另一部分则具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其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以及以前的民主派和共和派，等等。我参加了行动党的第一个报纸《自由意大利》的工作，后来担任该党地下刊物《正义和自由杂志》的领导人。因此，在1943年7月巴多格利奥政变的时候，我是行动党出席反法西斯主义政党会议的代表，当然，这件事是经过多年准备的；1943年，我们开过一次会，我同代表天主教民主党的格龙基^①一起参加了会议，当时，该党还未正式成立，但已经在组建过程中。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一名共产党的代表马尔凯西教授^②，两名社会党的代表韦拉蒂^③和巴索^④，一名自由派，我想大概是卡萨蒂^⑤。在那次于米兰的普林西巴托出版社召开的会议之后，有许多其他人都考虑在政权危机临近的时候组织一次共同的斗争，就在政变发生时，我们已准备完毕。政变的当天，我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们向全国发出了组织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呼吁，并且谴责巴多格利奥政变

① 乔瓦尼·格龙基(1887—1978)是人民党的创始人。他帮助过德加斯贝利建立了天主教民主党，是该党左翼的一员，1955年当选为意大利总统。

② 孔切托·马尔凯西(1878—1957)，1921年以后就是共产党员。1943年，他曾同自由派联系，试图组织一次包括君主派在内的政变。战后，他一直是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③ 罗伯托·韦拉蒂(?—1943)是社会党北方地区地下组织书记，1943年11月25日当社会党的秘密总部被德国党卫军破获时牺牲。

④ 莱利奥·巴索(1909—1978)，是社会党内部的最高纲领派成员，作为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曾几度被捕。1945年，他担任社会党副书记，1947年又担任总书记。1963年因反对中左联合政府而脱离社会党。

⑤ 亚历山德罗·卡萨蒂伯爵(1881—1955)，早期是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1925年辞去公共教育部长的职务，1943年6月，他帮助在罗马建立了民族解放中央委员会，1944—1945年担任战争部长，以后是参议员。

是右派准备好的一种伪装，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没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占领这个讲坛，并以此为后盾把那些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赞成向君主制作一定妥协的党派团结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有利于未来，共产党决心同君主派进行合作。

在1943年停战期间，我在意大利北方解放委员会中是行动党的代表之一。你知道，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在罗马建立的，但我们很自然地就预见到了意大利的分裂，所以我们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我们各自的任务。我们预见到盟军将到达波河一线，毫无疑问，意大利的这部分领土将为盟国占领，他们会注意这个地区，即使他们可能晚一点到达前线。而在北方，我们安排的任务是：新闻报道，印刷地下文件，以及生产武器，等等，我们的准备工作几乎像共产党人一样充分。如果说继共产党人之后，行动党为地下斗争所作的准备是最充分的，那也决不是天意之举。

问：在组织抵抗运动时，为什么意大利社会党没有共产党那么成功呢？

答：总的看来，社会党人在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后，遭到了有组织的灭绝性屠杀。社会党人在左翼中是多数，共产党人是少数，自然，差不多所有主要城市的市长和所有工会组织的领导人都是社会党人和知名人士。因此，社会党人的迁居国外，使党失去了像屠拉梯和特雷韦斯^①等这样一些中层领导人和主要领导人，这对社会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使他们从来都没能像共产党那样，成功地在意大利建立起地下组织系统。

^① 克劳迪奥·特雷韦斯（1869—1933），是与屠拉梯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他于1926年逃亡巴黎，在那里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运动。

他们曾经与莫兰迪^①作过这种尝试，但莫兰迪回到意大利后很快就被逮捕和关押了，直到巴多格利奥政变后才被释放。许多人都批评社会党消极，但这是不真实的，原因在于社会党的领导机构遭到了残酷镇压，而且并不总是肉体上的。

因此，在短暂的停战期间，所有反法西斯的党派于1943年9月9日会晤并发表声明，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我们几乎什么准备都没有，不过，政治上的准备是充分的，我们已经挑选了一批主动承担这个任务的人；就行动党而言，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帕里先生，他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公认的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不少人都养成了一种所谓“要谨慎从事”^②的习惯；还有不少人说，我们应当联合法西斯主义者以反对德国人，或者同德国人搞联合以反对法西斯主义者，以便分化他们，他们的借口是：“如果不同法西斯主义者联合，我们如何能够进行武装斗争呢？”我至今仍然记得停战后的第一天，我同帕里讨论武装斗争问题的那次谈话，我告诉了他一些流传的看法，帕里对我说：“听着，既然如此，我们就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就是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我们一开始搞武装斗争，这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开始干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军事组织”，“没有必要等待尽善尽美的军事组织，我们

^① 鲁道福·莫兰迪(1902—1955)，是一位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先是参加正义和自由运动，后又加入了社会党，对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作出过贡献。他倡议同共产党密切合作；他1945年担任意大利北方解放委员会主席，1945—1946年担任社会党书记。

^② “要谨慎从事”是占领期间大部分人所采取的一种回避支持任何一方的骑墙态度。

以搞突然袭击开始”。这样，我和一些同志们便首先搞了一次突然袭击，那天夜里，我们利用天气有雾袭击了两个德国巡逻队，缴了他们的械，11月的米兰经常大雾弥漫，真是天助我也。整个1943年的秋季和冬季一直有雾，有一天夜里，我自己都完全迷失了方向。

当然，这个时期的生活是充满危险的，不过，应当承认我是十分幸运的。在米兰，法西斯党的书记，雷塞加先生被一个游击队小组处死了，为了报复，他们杀害了5名游击队员，其中包括一名行动党的领导人。替这个法西斯党的书记出丧那天，我妻子和我都在一家出版《自由意大利》杂志的秘密印刷厂里。我们大约是7点钟离开的，衣服里塞满了必须带到散发地点去的报纸，我们穿过了米兰的主要广场杜奥莫广场。我们并不知道替雷塞加送葬的队伍由法西斯主义分子护送，也经过杜奥莫广场；当送葬队伍到达广场时，有人从一座大楼的顶上向这群人开枪射击，法西斯主义分子扔下灵柩四处逃散，随后，就在我妻子和我经过广场的时候，他们很快又都重新集聚在广场上，同时，法西斯民团、军队和法西斯战斗队也封锁了广场，我们被堵截在里面，进退两难。我从来不想把这一点告诉那些请我写生平经历的出版家的，因为它难以令人置信。然而事实是：就在替雷塞加送葬的那天早上，法里纳奇^①的报纸《法西斯主义秩序》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下面这样的

^① 罗伯托·法里纳奇(1829—1945)是法西斯匪徒的领导人，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完全极权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他1925—1926年任法西斯党总书记，后来又支持与希特勒结为联盟。从1938年起他主编《法西斯主义秩序》。萨洛共和国期间仍然忠于墨索里尼。

话“暗杀雷塞加的罪犯是乔治·阿门多拉^①和里卡尔多·隆巴尔迪”。你看，警方已经掌握了我们在停战那天共同签署的文件，我们在文件中说：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分子，所以，我的名字就在那张报纸上出现了。如果我被捕，当场就会被打死，因此，我同我妻子试图逃出去。在托尼诺路的拐角处，你猜我妻子干了些什么？她把我们带的报纸都塞进她的胸腹部的衣服里，这样一来，她看上去就像是个孕妇。当我们来到持枪凶手的面前时，她使人相信她非常虚弱，说：“我是孕妇”，所以凶手们说：“走吧！”。你问我如何死里逃生，因为我一次又一次交了好运。

我应当告诉你的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妻子埃娃·维娅托的故事。她以前是一个共产党员，坐过监狱，等等。在多次同样危险的情况下，她都用难以令人置信的沉着和非凡的创造精神救了我的命。以她的故事为基础，我可以写一部小说。

哦，我们谈谈战争结束时的情况吧！也许你知道，我参加过同墨索里尼的一次会晤，但不是作为解放委员会的代表，而是作为起义委员会的代表。解放委员会接受了米兰大主教舒斯特红衣主教的建议，他提出解放委员会和墨索里尼进行会谈，因为舒斯特主教受某些幻想的毒害，相信我们能够不经过战斗而使法西斯主义分子离开。那是4月25日的事，解放委员会同意会晤，但命令是非常明确的，不作任何妥协。我们告诉墨索里尼，我们接受了盟国的条件，墨索里尼必须无条件投降。然而，我们还是成立了一个起义委员会，以防最后的结局

^① 乔治·阿门多拉（1907—1980）在1929年以后一直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活跃分子和共产党人。

可能是非和平的。我们强调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米兰将以不同于罗马的方式行动^①。当然，盟军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到达的，我们希望通过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战斗来解放米兰这座城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起义委员会，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党没有参加，只有一些左翼政党，社会党、共产党和行动党参加了，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但在解放委员会同意和墨索里尼谈判时，起义委员会派我作代表出席会议，以保证取得良好效果。我参加了那次会晤，墨索里尼此刻感到不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要求给他半个小时的考虑时间，以便作出决定。实际上，他回到官邸便逃走了。等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决定结束这场游戏，下令在米兰起义。我被任命为那天夜晚的米兰最高行政长官，攻占了墨索里尼的官邸。我的同志，社会党的安东尼奥·格雷皮^②被任命为米兰市市长。我们毫不耽搁地就把政权的各个部门安排就绪了，因为我们对任务和职责已经作了分工。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已作好了向米兰提供各种必需品的准备。在抵抗运动和德国人占领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与其他党派联合成立了技术小组，他们估价了供应大米、小麦，甚至工业品（橡胶、煤气、燃料，等等）的可能性。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从米兰驱赶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当天起，向居民分配面包，没有人在这座城市里看到反常情况，至少从食品供应看是如此，这是件大好事。我记得起义

① 罗马是由盟国军队解放的，没有人民起义。

② 安东尼奥·格雷皮(1894—1982)，是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一名积极的社会主义战士，是一个游击队员和意大利北方解放委员会成员。解放时期，他是米兰市市长，1958—1968年为议员。

那天夜里在攻占墨索里尼官邸之前，我曾到囤放燃料的冰宫对两个警卫说：“任何人企图抢走你们负责的这些珍贵东西，你们就开枪”。我认为，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形势一点一点地恢复了正常。

幸运的是，供应工作是极为严格进行的。米兰人遭受过饥饿的痛苦，所以，配给制第一次成为正当手段，然而，那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当时，有两位政府部长从罗马来，当我得知他们到一家黑市餐馆超标准吃喝后，便于当天晚上查封了那家餐馆。供应短缺的情况是存在的，因为出现了为本地区居民囤积供应物资的倾向，而且几乎不可能克服。比如说，诺瓦拉的行政长官就曾经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能给他自行车轮胎，他就给我大米。但是回顾那个时期，总的看和贴切地说，我认为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12月份，帕里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一场危机。帕里执意要我参加新政府，而我对有些事是很担心的。他来到米兰那天我正病着，他来看望我妻子，我力图回避就对他说：“我可以接受，但如果要我参加新政府，米兰的地方行政长官必然换人”。政府危机首先围绕这样的问题爆发了：自由党和天主教民主党不希望有政治上的行政长官。这样，我就去找新任命的德加斯贝利总理，他很尊重我，可能因为我是个工程师，善于计算，而他在数字面前总是手忙脚乱。我对他说：“米兰地区的行政长官必须不是文职人员”，因为文职的行政长官肯定是法西斯主义分子，德加斯贝利回答说：“不，这不可能。”然而，我们还是成功地安排好了米兰的行政长官，接替我的人是根据解放委员会的意见挑选出来的。因此，我就参加了政府，当上

了运输部长。帕里要我参加政府，首先是希望我能对即将召开的制宪会议发挥一些影响，因为这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写一个新的宪法草案。他希望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去处理一些政治问题。我在政府里一直待到制宪会议选举，从那以后，我就不想再接受任何政府中的政治职务了。

问：你是否期望过行动党战后能够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它的重要作用？

答：不，制宪会议之前，行动党就开始出现危机了。1946年1月，行动党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互相攻讦，导致了分裂，帕里与其他许多人，特别是来自民主共和派的那些人一起离开了行动党，留下来的是正义和自由派集团。我们参加了竞选，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对废除君主制进行公民投票。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只能选上一个议员，相反，我们有7个。例如在米兰，我没有提出参加竞选的名单，尽管这里是一个我在一定程度上受欢迎的城市。我之所以没有提出竞选名单，是因为帕里参加了竞选，我们宁愿牺牲一个或两个席位，也不愿与帕里发生冲突。这些就是一个有点出类拔萃的，一个有点小贵族式的行动党的实践活动，但我们坚持了这些活动，例如，米兰刚解放的那阵子，许许多多人都集结在这些政党总部的门口，要求参加，但我们行动党拒绝自动登记入党，25岁以上的男人必须证明他们不是法西斯分子。显然，我们没有吸收大批党员。我们不想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而只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党，自然只能是少数了。

我1947年参加了社会党，因为我们认为行动党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不仅仅是由于它在数量上太弱太小，首先因为

政治上的原因。问题在于：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战后还能存在下去吗？富尔顿演说以后，我们就确信：行动党必须解散。1947年7月，行动党在罗马的瓦莱剧场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我们邀请所有党派来参加会议，不只是发来贺信，而是派人来同与会者一起，完全平等地参加讨论。与会者有萨拉盖特、莱利奥·巴索、西洛内^①和塞基亚^②，他们共同讨论了行动党的前途。这个问题引起了所有民主派人士的兴趣。讨论之后，我们参加了社会党，同时发表了一份非常明确的拥护民主和反对极权主义的宣言。我们不要求在党的领导机构内有任何地位、职务，我们不想要任何特权。

问：1947年你参加社会党时，你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什么？

答：我已经在前面同你谈过，我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后来又有过一段令人奇怪的既是民主派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历。我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我认为，我属于左翼内部研究过马克思的那少数人的范围。如果人们讨论马克思的至高无上，就必然会提出前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称之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问题。长期以来，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都企图用蒲鲁东取代马克思。但蒲鲁东只不过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的是马克思。蒲鲁东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手工业的而不是工业的资本主

^①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1900—1978），是意大利杰出的小说家和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原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后来参加了社会党。

^② 彼得罗·塞基亚（1903—1973），是地下斗争的一名积极的共产党斗士，1931—1941年期间被逮捕关押。游击战争期间他是北方共产党的领导人，解放时期是制宪会议成员，后来为参议员。

义社会，即使在马克思时代，工业社会只是在英国开始发展，在其他地区还没有开始发展。马克思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我没有成为一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分析的魅力过去吸引了我，今天仍然吸引着我。如果有人问我，“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会回答“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用和切·格瓦拉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当有人问切·格瓦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回答说他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在今天，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一个人是伽利略或牛顿的信奉者别无二致。伽利略和牛顿都是必不可少的里程碑，尽管事实是，人们已经不再按照他们的模式，而是根据贝尔和爱因斯坦等人的模式进行研究了。同样，尽管马克思的一些原则已经不再适用于一个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但他依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丰碑。

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于莫兰迪和巴索，特别是巴索。必须说，社会党的真正缺陷之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了解一个人的祖先，了解一个人的历史是必要的。如果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那是因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在今天，说反对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即使人们看懂了那些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们的文章，也未必明白反对资本主义的意义。在意大利，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贡献的研究甚至在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对马克思的真正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分裂^①之前，绝大多

^① 指1921年的分裂。当时，意大利社会党内以波尔迪加、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人为首的左派，因为不满塞拉蒂领导的多数派包庇改良主义而退出社会党，另行组织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

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只是读过恩格斯的最后几部著作，例如《反杜林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读本；正像人们所预料的，这更多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而不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况且在1955年以前，马克思的许多主要著作在意大利都不为人们所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54年才问世，1932年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955年才为意大利所知。有人可能会说，《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和《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毫无共同之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但在知识界掌握有关著作之前，对这些问题争论和讨论就不可能发生。我担心，对马克思的批评会在各地演变成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有时，我选择马克思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研究对象，他有一种强大的分析力量，即使是分析错误的地方。

问：二次大战后，南尼和莫兰迪奉行同共产党搞联合的人民阵线政策，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答：我反对这条政治路线，即使这导致了1948年竞选运动的失败。在那份促使我们召开热那亚代表大会的动议上，我签了名，这次会议使我们这些自治论者取得了反对南尼、巴索和莫兰迪的合作路线的胜利，他们不但拒不接受我们的观点，还拒绝参加党的选举活动。所以我们是被迫担负起领导责任的，实际上，我们是少数派，只代表33%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受到了党内其他人的反对，因为没有人想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是一种软弱涣散的局面，我们坚持干了一年，到1949年。我们成功地粉碎了人民阵线，瓦解了这个联盟，为一种独立自主的政策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这次

最初的试验，南尼就不可能在1953年开始实行这个他从来都不承认的政策。

问：意大利社会党内发生的情况和西欧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截然不同，意大利是唯一一个社会党在40年代末同共产党人结成了联盟的国家，你对此作何解释？

答：可以有多种解释，最重要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经常出现分裂，比如说，某些时候是由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引起的。这种理论在意大利从来就没有多大市场，即使在最糟糕的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官方观点把社会党人视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仍然在地下斗争的基础上合作奋斗；抵抗运动中的团结是确实存在的。今天，尽管我们在政治上互不相容，例如我们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与自由党人，但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一条重要的纽带，它使我们考虑我们的政治斗争，并且为我们规定了这种斗争的范围。关于抵抗运动，在意大利可完全不是空口讲白话，因为我这一代人都还健在，至于以后如何，我就知道了。这就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原因之一。其次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他们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积极斗争，以及由于社会党的消失，共产党成功地赢得了社会党的那些改良主义的选民。

战后，社会党认为它还能够保持一批改良主义的追随者，比如在一些工业中心，在一些农业地区，以及在合作社中。实际上，共产党已经把这些地区全都抓在自己手里，社会党发现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我清楚地记得，1950年我住在米兰时，帕维亚省发生了一次农民大罢工。帕维亚省靠近

米兰，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社会冲突地区。当时情况和今天不一样，几乎没有人家里有电话，我们有些人是坐小汽车，有些人是乘火车，有些是骑自行车去参加罢工的。我记得那个小城市的市长，他现在是共产党人，但以前是社会党人，他对我说：他们之所以都是共产党人，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灭亡时，我们曾经想寻找某种联系，但没有找到，而共产党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区别”。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许是傲慢的，但它包含着许多真理。而且，共产党很注意不去确切地解释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宣传，至少在实际行动方面是这样。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样的：1948年以后出现了一次对工人的残酷迫害，例如，美国大使克莱尔·布思·卢斯就正式宣布，美国军队或美国机构是否向菲亚特公司订购军需品，取决于左翼工会是否失去它的多数派地位，这个声明造成了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团结的加强。

1956年，意大利议会成立了研究不同行业工作条件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我能够把握这种局势的动向。对菲亚特这个共同体的迫害，使许多联合的纽带形成了，在抵抗运动中已经出现，并且由于警察和地方官吏支持管理机构进行共同迫害而又重新恢复的这些纽带是非常牢固的。这种迫害可想而知。如果有人想通过竞争性考试成为一名军官，法西斯打手就递上一张说他是“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卡片，如果他家里有人是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那就可能阻止他进入军官行列。最后，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其他人一样进入了军队。1956年的军需部长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社会民主人士特拉蒙利，我去拜访他时对他说：“喂，结束这种搞法吧！”后来，我有

机会看到过一张那种卡片，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是法西斯打手。那些卡片上仍然注明本人是“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精神上的迫害，有助于强化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

问：南尼个人是否发挥过重要作用？

答：当然，南尼个人起过重要作用。在党决定参加联合政府时，他没有能避免分裂。这个政府是中左派合作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战士们退党，我们为一次严重的脱党现象而感到痛苦，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始终责备南尼没有为制止这种情况而采取任何措施。他确信这一少部分人一直阻碍他推行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的政策，所以他宁愿让他们退党，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那些左翼同志早就准备脱党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同志对1963年的分裂都是很痛心的。制止分裂并不需要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为了使这些同志留在党内，德马蒂诺和我进行了协商，他们提出了一些条件，例如“只要隆巴尔迪不在政府中任职”——我一直就没有参政的想法——“只要隆巴尔迪主持《前进报》的工作，使党保持一种独立于政府的资格……”。这些条件也许是一种策略，然而，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诚实的；但就在德马蒂诺、我和其他人正在进行协商的时候，南尼向管理委员会指控左翼不守纪律，对此，南尼负有重大责任。可以这样说，一旦南尼想出一个政治方案，他就一定要付诸实施，这正是他的伟大所在，中左派那次政治行动的方式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制止1963年的分裂，中左派的命运就可能有所不同。电力部门国有化以后，天主教民主党不想再搞新的改革了，当时，我

们可以通过暂时退出政府以补救那次分裂，因为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反对同天主教民主党的一切合作，他们同意进行暂时的、有限的和有条件的合作。

实际上，当我开始为《前进报》写文章，反对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之间的联合政府，一种似乎就要变成永久性联盟的时候，许多离开社会党的同志已准备回到党内来。只要中断、哪怕是短暂中断这种联系。长期联盟的形势终于出现了，即使分清了责任，也难以给人以安慰。

问：让我们暂时再回头谈一下1947年的情况吧！你参加社会党的那会儿，正是萨拉盖特和社会民主派人士离开社会党的时候，那次分裂是能够制止的呢，还是不可避免的呢？

答：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次分裂符合萨拉盖特和巴索的愿望。巴索曾公开宣称，他的目的是要把萨拉盖特的改良主义清除出党，理由是他想建立一个意识形态的党；这个想法使巴索陷入了困境，因为它是与巴索行动上的实用主义——一种和他那僵硬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相矛盾的。南尼不希望破裂，令人费解的是，像南尼这样一个凭直觉的人，竟然直到最后还相信萨拉盖特会留在党内。我记得，在标志着分裂的那次代表大会的前几天——当时，我还在行动党内——我拜访当时还在基利宫的外交部，南尼对我说：“不要相信会有什么分裂。”萨拉盖特改良主义者和创造派社会主义者都被清除出党了；后面这一派企图从左的角度挫败共产党，它指责共产党是温和派。巴尔贝里尼宫的这次分裂就是这两派造成的。

问：在你思想上有两个固定不变的观点——“社会主义

选择”和“革命的改良主义”，你能解释一下这两点的含义吗？

答：这两个论题是相互关联的。革命的改良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等以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验之后，我坚信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国家要走的道路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但我提出了“改良主义”和“革命的改良主义”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远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区别：改良主义政治是一回事，改革（政治改良）则是另一回事。就伯恩斯坦等人以后改良主义一词的历史意义来看，它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它可能包括这种制度内部的某些改革，以便消灭它的弊端和严重不公正，但它并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机制。遵循这种改良主义方向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派已经进行了大量改革，改善了工人阶级和一些下层阶级的现状，改革了社会，使不公正越来越少，平等越来越多，等等。把生产方面的主要责任留给资产阶级，以及把改革局限于分配领域的政治路线已经得到贯彻，特别是在瑞典，那里已经出现了最令人感兴趣的试验：允许资本家追求利润，允许他们在不干预社会事务的条件下发挥主动性，同时，国家对分配问题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在一定的時候，这种形势会碰上今天称之为的财政危机，用于重新分配的利润消失了，税收几乎占用全部收益。相反，政治改良则意味着社会干预和国家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仅局限于利润的再分配，而且涉及生产领域，包括为防止苏联式的蜕化而采用的自治形式的和民主形式的非国家计划项目，因此，国家负责生产规划，不再用以满足企业家们的愿望。这就是我的看法，不只是我本人的看法，它是“革命改良主义”的原则。意大利和其他

国家的许多社会党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认为，必须进行一系列和平改革，这些改革不应只局限于再分配领域，而是要扩大到计划、资源利用、产品选择、以及如何和为什么生产。这并不会妨碍执行一种能源和地区性政策，或者是一项有关第三世界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因此，这是社会党人的任务，经过一系列改革，一步一步地将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成为自治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转变呢？必须形成协调一致的多数派；首先是就意大利形势而言，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难于在保守党和进步党之间形成一个明显的反对派，我们几乎总是被迫组成联合政府。另一种情况是建立一个和谐一致的左翼政府，有许多选民虽然分属各个政党，但他们的心是倾向左翼的。因此，必须尽可能快地消除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是由历史上的争论造成的），促成一条左翼政治路线，以便建立左翼讲坛，清楚地说明这种革命的改良主义纲领。这就是存在于革命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之间的纽带。

当然，只要意大利共产党还同苏联保持紧密联系，只要它的所作所为还像革命力量中的害群之马，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提出，因为意大利共产党是左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那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必须承认意大利共产党已有许多进步，我们应当在不作让步的情况下鼓励共产党内的改革趋势，而不是孤立他们。应该对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左翼政治活动的符合天意的、历史性的代表这一借口提出挑战。我承认，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且共产党思想的深刻变化过程是共产党政策变化的必要条件，推一

把也许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在政治上也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最后一步可言，因为最后一步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一往直前，永不满足，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满足过。

问：所以自1963年以来，你就对与天主教民主党内先进分子协作的可能性失去了希望，是这样的吗？电力部门国有化以后，你就确信中左派政府不再能够执行作为基础的革命改良主义的纲领了。

答：是的。我参加过中左派的许多政治活动，我支持和天主教民主党联合，目的是把社会党从深渊中拉出来，社会党是由于自己的错误，是由于它同共产党结成的为共产党所支配的不平等联盟而陷入深渊的。因此，我认为同天主教民主党联合的政策，是向着我们的政治目标前进了一步，尽管这种联合是暂时的，但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我同南尼联合的原因，当时，我们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左派的方向。但在我看来，同天主教民主党的联合只能是暂时的，局限于促成某些迫切的改革，开始一个具有革命改良主义基本特征的一系列改革的广泛发动过程。南尼无疑是个伟大人物，但他善于运用政治策略，而不善于解决实质性问题，在他看来，这种联合实际上是长期的，根据政府的政策即可完全看出它的目标。这种目标是重要的，但我认为，对社会党是不够的，所以，我支持与天主教民主党联合组成第一届中左派政府，我支持它，但我本人拒绝参加，为什么呢？我认为，而且确实认为，这种暂时的联合是有时间限制的，只能完成某些改革，尔后就会寿终正寝。就天主教民主党的性质、选民基础、传统、历史和意识形态来看，为了完成一些最初的改革，它是一个可以与之达成某些协议并

作出某些暂时妥协的政党。但同天主教民主党联合的某些限制很快就被突破了；确实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因为第一次税收改革、电力资源国有化以及教育改革之后，我们就改革纲领的第二部分发生了冲突。在这个阶段，我们遭到了天主教民主党十分明确的强烈反对，它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以政变相威胁。1963年7月，也就是第一届中左派政府组成后才几个月，天主教民主党内的某些不法之徒（借助共和国总统，天主教民主党人塞尼先生的崇高职位），便以武装力量情报局（官方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组织）搞政变来威胁我们。制定这个政变计划是为了威胁社会党，如果它坚持已经计划好的第三个重要改革、有关区域划分、住宅政策和城市化等等某种对意大利极为重要的改革。就武装力量情报局组织驱逐左翼领导人而论，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政变。

那时，我正在领导着党的喉舌《前进报》的工作；我要求完全控制这个日报，以避免党的政治政策完全而永远和政府的政策相吻合。我希望保持党的行动自由；社会党是一回事，中左派政府则是另一回事。7月份，当我拒绝继续支持政府政策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政变计划，我知道天主教民主党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实施改革纲领。报界的披露促使人们调查并证实，政变已经安排就绪。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的确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实际上有一个政变计划，但这次政变与改革纲领的直接联系是晚些时候才知道的。南尼真诚地对公众说过：共和国总统曾经以不签署议会可能通过的法律，特别是关于城市化地区的法律对他进行威胁。南尼甚至还补充指出，共和国总统塞尼先生（1962—1964年任总统）对他说：“如果狂热的

隆巴尔迪和苏洛（天主教民主党人，他相信改革政策是正确的）在电力能源首先国有化之后继续那些行动，如果他们企图根据城市化法律又一次搞什么疯狂活动，那我就不签署这个法律。”这是塞尼的私房话，但南尼把它公诸于众了。此后已经十分明显，社会党人认为中左派的目标已经不再有什么前途。但就政府的稳定而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政策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我并不拒绝作某些妥协，但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干一些在政府中有机会获得成功的事，哪怕只是些小小的改良。不过，人们永远必须看到要达到的目标：做点小事也不错，只要符合我们所希望的方向。正是这个问题在我与党内一些同志之间引起了长期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问：所以，你不愿意在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中看到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之间的历史性妥协；这种妥协仅仅是为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某些特定目标而结成的暂时联盟，如果政府拒绝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下去，那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政府中。

答：是的，但“历史性妥协”这个词不确切。我一直说我承认妥协，但不是历史性妥协。妥协这个词就其政治性质而言指的是政治行动，而形容词历史性则是虚幻的。甚至南尼在1963年谈到同天主教民主党的历史性协议时，也流露出他的真实意图；后来，共产党又一次拾取了那个词。“历史性”的问题并不是词义之争，你明白我的意思，它是一个实质问题，一个现实问题。

问：因此，你对共产党的“历史性妥协”的概念也提出同

样的批评？

答：是的。1975年的一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先生在我认为是对智利发生的情况作出错误解释的时候，他宣布了“历史性妥协”的政治路线，当时，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正在召开一次会议，我立即发言批评了“历史性妥协”的概念。共产党认为这个政策有某种新东西，但这只不过是旧改良主义的一种欺骗形式。同天主教民主党人合作共事，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天主教民主党的选民并不是进步力量，尽管它包含有某些进步阶层。如果天主教民主党奉行改革政策，它就要冒失去相当大一批选民支持的危险。这就使必须达成的这种协议是暂时的，即使不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些协议还要受到时间、目标以及实行妥协的实质等等的限制。今天，我们正在吞咽这种“历史性妥协”的苦果；因为在共产党固执地主张他们希望和谐一致等等的岁月里，实际问题被抛到一边，什么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从经济上来看，如果说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也是由于共产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之间在那些年月里的所谓谅解的痼疾所造成的。

问：你认为当前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怎么样？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像克拉克西等这样的“年轻一代”领导人。

答：毋庸置疑，他们是有着重要变化的一代，这是好事，党不应该再为一批老年人所把持，但要防止出现一批假年轻人，一批假青年，因为有些年轻人实际上比老年人还要老得多；比如说，克拉克西无疑是一个具备某些品质的年轻人，他有个性，有毅力，等等，但他和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南尼有同样的毛病，也就是说，他所想的几乎全都是政府问题，即所

谓政治问题。他的政治观点不符合社会党的传统,那是一种必须予以尊重的传统。他发动了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势。社会党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党内,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认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在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我总是这样开始发表我的看法:“让我们首先找到今天的资本主义在哪里,它的任务是什么,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它有什么新的姿态,其他等等。让我们认识敌人,以便更好地同它战斗。”要决定党为了改变事物而采取的立场,人们就必须认识形势,否则,我们就会始终摆脱不了机会主义……

问:为什么你在1977年辞去了意大利社会党主席的职务?

答:我是在和党的书记发生意见分歧后20天提出辞职的。如果党的主席和书记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就无法进行工作。

问:社会党今天的政策,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50年代的政策似乎很相近。我担心,这种倾向最终会有损于意大利社会党,因为对意大利共产党的任何攻击,都会产生一种正是社会党人在分裂工人的印象。

答:是的,这是一种不幸的后果,它会使共产党内部为实现真正变革而奋斗的潮流失去信心;它会使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分歧更加突出,他们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许多分歧。我是说,共产党和社会党不是一回事,这不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认为,统一行动在意大利是很有必要的,鼓动分裂则是为了阻止左翼得到它应该得的力量。有些人认为这种

形势是令人沮丧的，但在我看来，意大利鼓舞人心的事实在于，所有的政党都处在分析和改变自己的过程之中。在意大利，由于资源、主动性、想象力和奋斗的愿望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所以形势不会是毫无希望的。外国人自然会首先看到意大利的恐怖主义，看到某些形式的不满情绪，但是，意大利形势还有令人鼓舞的一面。

问：你认为，当前社会党的态度应当是什么？

答：我已经多次提出，首要问题是建议共产党安排一次会议，澄清两党之间的矛盾，制定出在意大利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即使承担不那么受人欢迎的责任也在所不惜。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能对付竞选，甚至参加竞选。我的党不愿意引起有可能导致在预定的选举之前就解散立法机关的政府危机，那将会造成第四次解散立法机关，对此我完全理解。但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型选举运动，如果整个左翼、共产党和社会党能够在10年之内第一次团结起来向选民提出一个共同纲领，那么，这些竞选就不会不同于以前的竞选。我认为，左翼的第一次尝试不会获胜，但它将第一次提出一个现实的选择。

5年前，我曾经向共产党提出一个共同纲领，但被他们断然拒绝了，因为那时他们正热衷于搞历史性妥协，同社会党搞共同纲领则意味着拒绝历史性妥协。现在，在我80岁生日之际，乔治·纳波利塔诺^①发表的一篇论述团结的文章第一次写道：他认为，共产党断然拒绝我关于共同纲领的建议，可能是非常错误的。今天，困难来自新的社会党领导人。要是以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好了！5年前，我发起过一场运动，它并不

^① 乔治·纳波利塔诺(1925—)是目前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像某些人捏造的那样是一场亲共产党的运动。在我的党内，人们对这场运动不怎么关心，有些人甚至持敌视态度；从共产党那里也没有遇到很多接受这个运动的听众。我认为，那使左翼政治目标的形成大大推迟了，再要获得这样的时机是困难的。

问：实际上，你提出的建议接近于最近10年法国社会党人的路线。

答：是的，密特朗仿效了我的路线。在共产党掀起一场猛烈攻击他的运动时，他曾说过：“我希望两党团结起来，由于共产党不赞成统一，所以我同意以他们的名义联合起来。”法国的选举制度使密特朗受益匪浅，共和国总统享有极大的权力，而且是7年大选一次；这种选举制度不要求组成联合政府，而可能产生明显右或左的政府，在那里，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政府要容易得多。因此，我支持克拉克西的建议，改变意大利的选举制度，使之简单化。我赞成比例代表制，但不是指必须组成联合政府。在意大利，左翼和右翼之间几乎完全势均力敌，法西斯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如果利用法西斯主义分子，右翼就会占优势，但有一个协定把法西斯主义分子排除在了民主竞争之外，10票之差就足以改变这种均势。

问：有实行总统制的可能吗？

答：有这种可能。在制宪会议期间，我还在其中的行动党是唯一赞同总统制政体的政党。这种体制之所以不受欢迎恐怕是有原因的。制宪会议是紧接法西斯主义以后产生的，人们担心会出现一个极其专横跋扈的行政首脑。然而，我却没有因此而担心过，因为要造就出一个新的墨索里尼，我们非要有一个常胜将军不可；我们还没有一个表现出是这种命的人；我

们不仅没有这样的人，而且像戴高乐那样的人也没有，连像勒费弗尔将军那样的人都没有，绝对没有，只有失败的将军。

问：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么你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工人自治（共同管理）将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你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国家控制生产资料。你能解释一下你是如何设想后工业社会中工人自治的吗？

答：应当承认，自治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地方有进行这种试验的可能性。我想强调的是：存在一种思想运动，它迄今为止还仅仅是理论上的，首先是在法国。我们在意大利紧步其后尘的这种思想运动，正在努力形成一种实际意见。不过，可以用否定的形式确定一下自治的概念。首先，自治不局限于工厂，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我们可以从共同管理开始，例如德国所实践的那样。重要的是开始这方面的实验。在意大利，我们还没有进行很多研究，以确定工人和技术人员等参加企业管理的计划，首要条件之一是了解有关企业的全部实际情况，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另一个条件是必须有一批具备所需才能和必要基础的人才。这就是说，把自治局限于企业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自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本身不会组织基本的社会事业，国家为地方组织，或管理集团，或市政机构，或地区团体提供手段和权力，由它们去组织社会事业；国家提供使社会事业分散化和地方化的手段，其途径是使这些组织、集团和机构独立自主。这就是理论家吉尔·马蒂内^①所说的把国家篡夺了的权力归还给市

^① 吉尔·马蒂内(1916—)是法国一位主张“合作管理”的理论家，是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后来参加新社会党，并被密特朗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

民社会。国家管的实在太宽，甚至在社会改革方面也是如此，国家主义的管理已经证明是软弱的和具有破坏性的。自治也可能会出现错误，但不会比国家试图靠集权去统管一切所造成的弊病更严重。这不是一个用公有财产的逻辑取代私有财产的逻辑问题，我看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财产所有权必然要受到挑战；我不是说财产是偷来的。我说的是另一码事，即从今以后，企业不再是建立在一种，而是多种权利的基础上：国家有税收权，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有权利收税；股东有权利；董事会有和股东们不同的权利；工会也有权，它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同所有者进行谈判并达到协调一致，有时候，这种协调一致可能是自发的。因此，按照这个逻辑，必须通过立法结束那些正在行使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的企业里不会再有唯一一个人权力，是的，从法律上来讲，大权掌握在董事会手里，但实际上，这个权力是共享的，这个权力是分散行使的。所以，必须找到一种如何去组织共有社会的途径，在这样的社会里，使不同的权力和不同的责任通过法律制度化，但这些都通过实验。

我不赞成马上就动手干这些事。必须从有限参与形式着手，教育工人，以便他们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他们工作的企业里，学习和运用自己的知识。这种实验还要同我刚才谈过的国家权力分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才行。

我不同意制定一天又一天的自治计划，人们必须循序渐进，但又总是沿着减少国家权力的逻辑进程，以便在可能的范围内，把组织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权力交给社会。我认为，今后可以在国有化企业里建立自治管理机构，这是一个意大利各

地都在探讨,但还没有实践的想法。

将来,可以先确定一批很快就可以实行自治的中小型企业,甚至确定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合作社企业,我们正在这么干。所以,可能有两个部门:采取国家干预形式的私有部门;采取某些控制形式和越来越需要干预手段及合作管理的国有化部门;中小型企业部门和合作部门。可以构成一个框架,一旦付诸实施就能够产生有关市场和计划之间关系的思想;还可以提出一个我们自然也是不能摆脱的国际联系的建议,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许多制约因素的国际社会中。我们能够看清楚计划在何种程度上和一定的市场自由是一致的,市场自由过大,会妨碍社会主义发展,太小又会造成独裁。我们必须找到市场和计划之间的正确关系,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计划,方案和市场的关系。由于多国公司的存在,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这些多国公司不受国家控制,而且还倾向于摆脱自治体制的控制。这显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最感到苦恼的问题之一,不管是社会党人还是资本家,都还没有为此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使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多国公司的存在也是一个问题,它很有兴趣管理多国公司,却不知如何下手,共同市场为管好多国公司所作的全部努力的失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问题确实难办。我们处于一种由逃脱了我们控制的权力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状态之中。

常见的情况是问题多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本身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所以对我们每天都会碰到新的难题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必须适应于新的形势。

问：我可不是奉承你，你看起来不像80多岁，更像是40多岁，因为你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关注。

答：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是什么帮助我活到今天倒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我对各种事变都很有兴趣，这对我延年益寿大有裨益。我在前面对你说过，有假青年，也许还有假老年。重要的不是到了衰老的年纪，令我担心的是临终了还优柔寡断，那是令人讨厌的。问题在于当人们到了那一步的时候还认识不到。

问：我想你离那一步还差得很远呢！

答：谢谢你的鼓励。

第四章 斯堪的纳维亚的 社会主义

引 言

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其原因在于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所特有的性质。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度，有些地方，例如挪威，几乎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贵族；甚至农民也早就参与国家的某些政治活动，古代的瑞典议会中的第四等级就是一例。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各国的社会情况比较相似。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瑞典、丹麦、挪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极其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争取政治平等和民主的斗争与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是协调进行的，社会民主党是这两种斗争的主要承担者。此外，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实际地修改了他们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纲领，以吸引居民中产业工人之外的某些集团。所有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者对群众组织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建立了大量工会联合会，使得社会民主党远远超出了纯粹政治现象的范围。和有些天主教国家相比，社会党人幸运的是他们不存在对付教权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很快就吸收了受福音派保护主义者支持的一些要求，

诸如戒酒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党人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一起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在30年代的瑞典和挪威，他们又在努力减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痛苦中，得到了农民党的支持。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在维护党的统一方面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面对一个至少分裂为三个党的“资产阶级”的反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在各个国家都已经成为最大的政党。

20年代，瑞典、挪威和丹麦都出现了短期执政的少数派社会党政府。就所有这三种情况来看，社会民主党人几乎都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会，也没有立即行动的明确纲领。大萧条迫使社会民主党人重新思考党的战略，他们同其他政党合作，成功地运用反循环经济政策与萧条作斗争，同时也在社会福利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他们在进行这些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们在瑞典和挪威成了典型的执政党；在丹麦，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政党，但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

从30年代开始，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就对医疗保健、教育和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实行税收再分配的政策，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同时，他们还强调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效率，但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视福利国家是他们运动的最终目标。

尼尔斯·卡勒比和恩斯特·威根福斯对发展具有瑞典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卡勒比(1892—1926)试图证明，和考茨基的信条相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不同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

行。卡勒比坚持认为，财产实际上是一些能够改变和再形成的不同的权利；他还论证了市场经济的优点，证明通过改革分配，就可能使这样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

恩斯特·威根福斯(1881—1977)，1928—1952年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1926年以及1932—1949年两度出任财政大臣。由于他使瑞典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危机，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因此赢得人们的极大信任。蒂莫西·蒂尔顿对作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杰出理论家的威根福斯的重要性作了如下概括：

因此，威根福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是一种持久改革的政策……任何一系列改革都是为了发动新的改革和削弱资本主义的特权……他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他指出，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把安全系统扩大到了防止其人民免受可怕的贫困，并努力保持充分就业；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却原封不动地遗留下来了。大量财产仍然是阶级差别的基础，企业管理依旧是寡头式的。威根福斯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可能而且也应该让位于无阶级社会，让位于以地位普遍平等、制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社会计划，以及工业民主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设想，只把社会化当作争取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绝对必要，而且，它表明不倾向于消灭雇佣劳动；不过，它强调的平等、民主以及公共管理社会经济资源却反

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①

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进入了一个沃尔特·科皮称之为对资本“历史性妥协”的时期：

3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逐渐为我们所说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历史性妥协所支配，这种妥协的可能和必要在于政治权力已经同经济权力相脱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性妥协已经引起了这样一种变化：从“两败俱伤”的斗争形势转变为“各得其所”的阶级斗争战略，这种转变是以工人运动和资方代表为增进经济发展而合作的公式为基础的。生产领域的决策权基本上留给资本；工人运动所担负的责任是按照社会正义的标准，运用政治手段，通过政府对分配日益增加的产品发挥影响。此外，这种战略还被认为是加速资本主义成熟，因此也是促进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历史性妥协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一大成就，它之所以可能形成，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所以，这种妥协为那些对雇佣劳动者产生重要的实际结果的政策提供了基础。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劳动市场政策，它有可能使瑞典在30年代就减少失业，并且能够在战后时期到70年代，当西方各国政府面临失业

^① 参见蒂莫西·蒂尔顿：《通向社会主义的瑞典道路：恩斯特·威根福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76卷（1979年6月），第518页。我还要感谢蒂尔顿教授，他让我阅读了一篇尚未发表的论述卡勒比的文章，我的评论正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的。

和通货膨胀困境的时候，使瑞典保持很高的就业水平。^①

这种历史性妥协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负责促进经济增长，否则，福利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但经济无限制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后果，如环境破坏，并且有助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社会民主党不过是这种制度的附属品。60年代后期，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更新了社会平等的要求，其中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和关心低工资的工人。70年代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促成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想法，即所谓“雇佣劳动者基金”。

社会民主党人对滞胀趋势十分关心；工资的增长加剧通货膨胀，同时，投资日益减少。这两种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历史性妥协的疑问。1976年，在鲁道夫·迈德纳领导下的工会委员会提出设立“雇佣劳动者基金”，该基金由工资增加的部分构成，从而阻止通货膨胀，它们也可以为投资提供资本，同时，还能够使工人最终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1976年大选前，这一想法提出的形式还很不明确，可能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失败。1981年10月，党代表大会原则上接受了这个思想，尽管遭到强烈反对，1983年当选的帕尔梅政府还是试图贯彻这个修改后的纲领。这标志着“历史性妥协”的终结，说明瑞典社会民主党正在走上一条独创的和富有革新精神的道路。

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愿意进行实验，证明科皮的论点是正确的：他们仍然是真正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而不只是社会改良派。这种以社会平等和希望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成公有制

^① 沃尔特·科皮：《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伦敦1978年版，第320—332页。

为基础的社会观点并没有被舍弃，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缓慢地、但却是不可改变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因此，他们很快成了欧洲社会党中最为改良主义的和真正最激进的政党。

挪威工党的历史有所不同。挪威的农业地区更大一些，工业化不是发生在城市，而是发生在孤立的农业地区。和瑞典相比，挪威是一个具有较多个人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边远社会。迅速工业化以及从以前的农夫或渔民形成的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例如该运动的杰出人物马丁·特兰梅尔就曾经移居美国，并且在返回挪威成为社会党领导人之前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因此，挪威工党加入了新成立的第三国际。特兰梅尔和他的朋友们把俄国看作是革命的工联主义的一次成功尝试；但当他们看到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便于1923年退了出来。到1927年，工党多数派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派一翼重又言归于好；不过，挪威工党一直倾向于在激进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正如党的前主席雷伊乌尔夫·斯坦恩所指出的那样：

在左翼方面，你会看到有些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在右翼方面，你会看到一些并不认为这样称呼十分重要的人，如果要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则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那是表面现象，一旦触及政治现实，你就会看到，左翼在诸如发展工业民主这样的问题上是一种推动力量。以目前的石油政策来说吧，左翼试图使国家尽可能多地进行国家控制；右翼则

持更实际的主张，他们说，应当允许私人势力参加石油资源的开发。左翼比右翼更加接近于工会，至少是传统工会、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我属于工厂的工人工会，据说，该工会是站在左翼一边的。在涉及对外政策时，右翼坚决维护北约组织的立场以及同美国的联系；而左翼则更多地持批判态度，他们承认作为北约成员的必要性，但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们对美国的制度以及同美国的力量一体化更多持怀疑态度……这种分歧与其说是观点之争，不如说是一种情绪的反映。^①

本章所访问的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30年代以隆德市议会成员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塔格·埃兰德，1946—1969年一直担任瑞典首相，任职时间比任何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首脑都长。在他任职期间，瑞典巩固了其福利国家的地位，并且进行了养老金和教育制度的更大改革。西格里德·埃肯达尔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女权主义观点的代表，她的经历揭示了妇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碰到的重重困难。1937年，她当选为旅馆和饭店工人工会的巡视官，1948—1964年领导瑞典总工会的妇女委员会，1941—1948年和1957—1968年在议会工作。特吕格弗·布拉特利1951—1955年和1956—1960年担任挪威财政大臣，1960—1964年担任运输大臣，1965年当选为挪威工党主席，1971—1975年任挪威首相。

^① 1981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与斯坦恩的谈话。

塔格·埃兰德访问记

塔格·埃兰德：

我父亲是我的故乡韦姆兰省的一名教师。他是一个自由派人士，对工会不怎么同情，因为他认为工会会破坏自由市场，还像对其他许多自由派人物一样，自由市场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其他问题上，他却是相当激进的。他曾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在本世纪初，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对于那些激进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对社会改革也极有兴趣，对宗教虔诚、笃信。在本世纪初，尽管一个教师的薪金收入是很微薄的，但他还是想方设法送我到瑞典南方卡尔斯塔德省的大学预科去学习。卡尔斯塔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富裕的省份，但那里的农业工人却极其贫穷。我们一直在说韦姆兰是一个贫穷的省份，然而，我在富裕的斯科纳地区所看到的贫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农业工人中的这种贫困状况成了我的出发点。我记得1923年，我亲眼看到在一次罢工中，许多农业工人被从家里抓走了，给我的感觉是：瑞典不可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谁能使这种状况好转呢？当然，是工会和工党了。当时，我有幸读了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书的瑞典文译本。真是雪中送炭，它解释了为什么工人的生活状况如此骇人听闻的原因。此后，我就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先是在斯科纳地区从事工会工作，后来又搞党的工作。

问：你是直接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还是只间接地了解

一些马克思的思想呢？

答：我直接读过的马克思的著作不多，我认为这是件好事（笑），因为我很早很早就隆德大学的学生中间从事实际政治工作，后来又忙于隆德地方当局的工作。我买了《资本论》，现在身边就有，但我不能说我真真正正细心读过。

问：你是否受过瑞典党内某些特殊人物思想的影响？

答：当然有。20年代是前一代领导人日益衰老时期，布兰廷于1925年去世；同年，他的合作者，财政大臣托尔森也去世了。我参加了他们两人的葬礼。两位年轻的党的领导人是恩斯特·威根福斯和奥古斯特·米勒。他们经常到隆德大学看望激进的学生，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威根福斯正忙于福特和平运动，这是一次反对战争的伟大尝试，在瑞典它是由威根福斯领导的。威根福斯正试图创立民主社会主义，他特别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但提倡工联主义。奥古斯特·米勒是社会主义瑞典的创始人，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由国家接管经济生活。不过，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碰上社会民主党这样两位十分年轻、但在重要问题上看法却截然不同的领导人是十分有趣的；因此，矛盾产生了，一种十分有趣的政治生活场面也出现了。此后是卡勒比，他根据瑞典的实用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他的著作于1926年问世，对青年人影响很大，当年，他病重去世了。他是党所追求的实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问：在你们谈到瑞典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时候，指的是那种建立在非常明确的思想观点之上的实用主义呢？还是

美国人那种干了再说的实用主义呢？

答：不，不是的。我们把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理论；就其基本特性而言，它遵循改革的一些指导原则，这些改革比较符合未来的正义社会。卡勒比非常突出地发展了这种理论；威根福斯坚持了卡勒比的分析，他是一位伟大的实践政治家，并且多年担任财政大臣。

问：你作为首相，对瑞典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否总有一种独特的想法？

答：不，不是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发展总会使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努力争取平等和充分就业，等等，这是明确的，但我们没有搞什么直接计划。我们的实用主义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力图搞清楚，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的许多方案是长远的，例如养老金制度。它既是维护未来安全的一项改革，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福利事业奠定基础。

问：如果说“雇佣劳动者基金”的建议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可能导致实际上由工人控制企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可以这样说，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人们必须回头看一下党在 20 年代初的历史，在奥古斯特·米勒领导的力量中有一些很强的势力，自认为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在我第一次出席的 1932 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于资源社会化和计划化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威根福斯成功地使党代会相信，以前的那些社会化计划不是党要走的道路，所谓的改良主义道路更为可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只占 8 票的优势。

从那以后，党就根据局部改革的路线进行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出现了稳定的集团，我们有许多文化和社会改革计划摆在面前，涉及到家庭政策、住宅政策、粮食政策，等等。我们允许私人企业不受国家干涉，科皮在他的著作中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伟大的历史性妥协”。这就意味着私人企业可以自我经营，但我们取其收入进行分配。我们完全知道，自由经营体制一向是需要国家控制的，它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自由。进入60年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和失业一样危险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国内和国外都有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许多人都因此而倒下了。环境的破坏证明，不能让私人企业像历史性妥协设想的那样自由发展。因此，1971年瑞典总工会的代表大会成了转折点，当时，我们开始讨论如何使工人的影响扩大到足以避免人在私人企业里受到损害，也正是在那时出现了迈德纳的基金计划。重要的是要看到，国际危机突然向我们提出了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又想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些想法，即给予私人企业体系以必要的投资。

席卷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使我们在70年代初所形成的想法全破灭了，但我们希望世界将来会重新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世界，我们可以恢复那些想法。如果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让工人在他们企业里发挥更大影响的思想就会再次提出来，这些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仍然存在。但我们强调的重点已经更多地放在了恢复生产的必要性上。

问：不管怎么说，这标志着历史性妥协的破灭。为了增加投资，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生活中，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分配

领域中加强它的作用。

答：确实，你说得太对了。

问：在30年代，你本人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察觉到瑞典不仅有来自大萧条，而且还有来自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呢？

答：瑞典邻近德国使我们非常担忧。社会民主党一直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将不得不保护它们自己。他们对挪威工党和英国工党大幅度削减防卫能力的愿望十分担心，如果他们的愿望实现了，那么，当希特勒到来时，欧洲将无力自卫。保卫民主制度包含有相对强大的防御力量，当然，这种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国的入侵。

问：怎样才能使中立和保卫民主一致起来呢？

答：当然，这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我们认为，和平不只是对瑞典是重要的，对我们的邻国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作出的贡献不大，但由于我们的中立地位而使全世界所有国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问：你们和别的国家的抵抗运动有过很多联系吗？

答：当然，我们同它们有过不少联系。瑞典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喘息的地方，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都在这里，包括布鲁诺·克赖斯基、维利·勃兰特、赫伯特·魏纳以及大量普通党员。同时，我们还努力帮助过挪威人和丹麦人，我们还接受了几千名流亡者。在1944年战争快要结束时，我们向抵抗运动提供了一大批武器，我们还在瑞典训练了将近一万名挪威士兵，或许这些并不完全属于中立的范围！开始，在德国人几乎占领了所有欧洲国家（起先，他们还同俄

国人结为联盟)时,瑞典政府的行动自由还不是很大,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德国的战争机器大大削弱了,以致对付只有有限作战能力的我们也成了问题。从1943年8月起,我们就有了相当独立的政策。但最初几年可不那么令人乐观。

问: 战争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有影响吗?

答: 战争年代的经验教育我们,瑞典社会有着几乎是无限的资源。战前,我们讨论过改革,认为要花费1000万到2000万克朗,这个代价太大了。当战争到来时,瑞典的国防费用一下子由1400万克朗上升到20亿克朗。由于我们知道了自己所具有的生产资源,所以,我们在战后就可以用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方法看待社会改革。战争后期,我是一个叫做“建筑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计划瑞典建筑业总的投资政策和结构,建立一个能够维持所有这些费用的生产机构。在“建筑管理委员会”里,我们认识到这种生产能力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大得多。同时我们也知道,集中刺激投资资源还有很大困难;战后,我们允许私人工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要比我们开始时所想的大得多,我们为自己缺乏能力而担心。

问: 1946年你出任首相直到1969年,这个任期在民主国家是最长的……

答: 瑞典人是宽宏大量的。

问: 在你当上首相时,你是否有一系列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你提前多久作好了计划?

答: 我倒乐于回答说我没有任何计划,但没有计划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创造充分就业的条件;其次,要让更多的人受到与新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教育。因此,我把重点放在充

分就业和新学校方面。在新的学校教育中，我又把重点放在技术研究的发展上。今天，我想人们已经认识到，增加福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对人民进行高等教育。如果你对欧洲人口中的阅读能力进行一番比较，你就会发现，瑞典早在1875年就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在本世纪20年代，瑞典人口的99%具有阅读能力，其次是德国，占人口的97%，法国和意大利要低得多。有位英国作家最近指出，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法国。

问：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附会。

答：只有80%的法国士兵能够看书。

问：这个问题主要在于他们的将军们，他们会看书，但不会思考。

答：我们很幸运，在瑞典，人民有文化的历史已达150年之久。我完全确信，我们强调技术和医学科学已经在我们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问：1945年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瑞典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一直保持其中立地位，你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答：我们从来就没有接受俄国人有兴趣征服欧洲的信条。俄国人有许多国内问题。我们都看到芬兰人是如何保持其独立的。因此，我们不同意英国工党必须组成一个联盟的主张。我们曾试图同丹麦和挪威组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联盟，我现在还认为，这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发展。

问：主张无核区是这一看法的继续吗？

答：两个超级大国曾经一度一致同意防止形成一个中立

的斯堪的纳维亚。我曾经问过赫鲁晓夫：“你们和美国很少取得一致意见，为什么一致阻止斯堪的纳维亚中立呢？”

问：我怀疑你们的国内外政策在逻辑上是否主要在这两方面，瑞典都是走自己的道路——在对外政策上独立于两大集团，在国内实行一种介乎于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的社会经济政策。

答：谢谢，那确实正是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

西格里德·埃肯达尔访问记

西格里德·埃肯达尔：

我出生在有8个孩子的大家庭里，父亲有一个小型农场。我只上过6年学，再也没有进过学校，以后就靠自学。我十三、四岁时不得不外出谋生，第一次找点工作干，挣点钱以补家用，我第一次工作是在一家养老院里。后来，我又到斯德哥尔摩，开始在一些小酒吧和咖啡馆一类的店铺里找点活干，工作十分辛苦。我感到很纳闷，难道就没有人能够给予我们一点帮助吗？有一次，我同一位老年妇女谈起此事，当时我才20岁，她已经是60岁的老妪了。她对我说：“到工会去，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这里争取到较好的条件”，我真的去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参加一些会议，它们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召开，因为那些酒吧、咖啡馆要到这时才关门。很快，我就成了工会委员会的成员，10年以后，我们就拥有2500名会员了。他们选我当他们的代表，按我们瑞典的说法叫巡视员。这样，我就不得不辞去女招待的职业，只搞工会工作。我到咖啡馆、小吃店去，

动员姑娘们参加工会。我作为一个组织工作者或巡视官来到了瑞典总工会。

问：你受到过什么思想家或书籍的影响吗？或者说，你基本上是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

答：在酒吧或餐厅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周60个小时，有时一天要干12个小时，因此，没有很多时间读书。但我们还是争取去职工教育学校学习，参加一些自学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旅馆、餐厅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头一天下午5点钟下班，第二天就要干到晚上10点或10点30分。

问：我特别想问一下有关你作为一名妇女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历的问题。首先，那些男性工会成员和男性社会党人承认你吗？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使你感到别扭？

答：我一生所在的工会是只有妇女的工会，有2500名妇女和29名男人，以及一名雇来的男干事。1937年，当我们必须再找一个办事员时，那个花钱雇来的男干事和工会里29名男人努力想再找一个男的来。但大多数女会员，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说：“不，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原则性讨论，看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男的还是女的。”经过2个小时的讨论，大多数人决定要一个女的。尔后，那些男会员说：“你们有这样的妇女吗？”我们没有。这时，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作女招待的姑娘说：“西格里德，你就把这个工作担起来吧！”我说：“不行，我不行，我可干不了。我只念过6年书，而且我不会写东西……”，她说：“在整个讨论中，你一直在讨论妇女问题，你是

哪种类型的妇女呢？”这样，我只好说：“好吧！我来干。”后来，全国工会，就是那个全国旅馆饭店业工会的男人们说：“等着瞧吧！我们认为那行不通，让她试试看！”每时每刻都有妇女站在我一边，她们说：“我们帮助你，如果有什么事就叫我们，我们来帮助你。”后来，当她们要求党的议会名单上有一位工会妇女时，斯德哥尔摩党组织决定说：“好的，我们试试看。她的经验如何？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知道她对工会工作很努力，但她在政治方面怎么样？”你笑了，我今天也感到好笑，但当时确实是这样。我的名字排在名单的第12位，谁也没有想过我们会获得12个席位，但我们得到了。当时，我必须再次表现出我懂得政治，我必须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劳动市场问题，妇女问题、日托托儿所问题，一切妇女能使其容易解决的问题以及和家庭有关的问题。后来我可以说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但我在前面同你提到过的那个受雇的男干事却说：“你不能干这个工作，也不能当议会议员。”我回答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一下工会委员会。”工会委员会中全是妇女，主席是一个大餐厅的厨师，她说：“我们要让西格里德试一试，如果她不能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再提出这个问题，但不是现在。”那个人不得不就此作罢。议会每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开会；接着，议员就会到居民中去，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做工作。妇女们对我说：“我们会帮助你的，请告诉我们干什么！我们可以到酒吧和咖啡馆和工人们谈谈，然后你来和他们协商。”

问：如此看来，支持你的那部分妇女有着一种十分强烈的团结一致的意识，是这样吗？

答：是的，确实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是一种良好的感情。在我1947年进入瑞典总工会时，我不能不努力使妇女的工资有所提高。1960年以前，妇女得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报酬，在1960年，我们达成了同等报酬的协议。

问：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工会和党内的男人们支持妇女的努力吗？

答：是的，最后他们是支持的，但开始时不支持，他们不关心日托托儿所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现在他们是支持的。

问：在你们党内或工会内部，讨论过有关妇女的理论问题吗？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是在党的集会上讨论的呢？

答：不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而是在1946年瑞典总工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写过一些议案，要求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我们妇女应当有为使妇女在工会和总工会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而工作的措施。当然，那些男人都说：“为什么？妇女们有这一切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吗？”然而，代表大会还是作出决定说，我们应当有一个提出这种建议的委员会。于是，我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瑞典总工会的一个男青年任书记；他是一个公正的好青年，他的看法是，如果妇女能受到同样的教育，得到同样的机会，她们就完全能够像男人干得一样出色，他提了一份很好的建议。瑞典总工会委员会决定，我们应当在总工会里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并任命一名妇女担任书记，他们挑上了我。我不得不走遍全国，请男人和妇女让妇女们参加组织。今天，妇女们参加组织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当时却困难重重。不过，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非常有趣。

问：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建立了有效的

养老金制度，以及为退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中也出现了大量批评，认为瑞典已经变成了官僚国家，老年人被排斥在其他居民之外。你认为这种批评正确吗？

答：哦，当然了，如果你离开了工作，失去了你原来的社会交往，你就不得不寻求其他社会联系。我想，这对男人比对妇女更困难，因为女人总有一些家务事可干，况且，在我这一代中，男人们还不习惯这种生活。现在，我正在老年人组织中努力工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组织，大约有40万人，我是本地一个地方组织——有400名养老金领取者——的主席。同时，我还是一个有37000名成员的区级组织的委员会成员。我们努力和那些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领取养老金者保持联系。

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还继续在发挥同样的作用。

答：是的，我实际上是在这么做的。我认为，做好老年人工作和做好青年人工作一样重要。

问：你们的老年人组织为争取什么样的变化而奋斗呢？

答：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社会和政府拨款，改造那些老房子，这样，人们就可以继续住在他们自己家里。城市的许多房子没有电梯，如果不加以改造，老年人就无法居住。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如一，每时每刻推动解决这个问题。请记住，我们辛勤工作，奋斗了一生，我们不想手拿帽子，站在路边向人们乞求：“我们能得到这个或那个吗？”我们应当得到！青年人要求游泳池，我们则要求较好的通讯设施，医院和家庭服务，要求人们来看望我们，给我们以帮助。我擦不了窗子，重一点的活自己也干不了。我们必须使社会和政府认识到，为老年人大声疾呼就像为青年人大声疾呼一样重要。

特吕格弗·布拉特利访问记

特吕格弗·布拉特利：

我父母于1908年在奥斯陆海湾的一个小镇上定居，离奥斯陆大约20公里。父亲是鞋匠，在本世纪初就满师出徒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手工业者，能制作新鞋，同时，他还有一个很小的农场。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是12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也是有6个孩子之家的老大。他们共有11个孩子，我排行第四。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很糟，除了辛勤劳动，别无他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的工厂使许多手工业鞋匠都破产了，这对我的家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我父亲像当时情况下的许多手工业者一样，很敌视那些制鞋工厂，不愿在那些工厂找活干。他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当了一名市政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我和父亲同时参加了工党，当时我17岁，他比我大30岁。像那时许多手工业者一样，父亲开始时比较保守，但是几年以后，尤其是成为市政工人，并且和工会有联系后，他参加了工党。1927年是挪威政治上大动荡的时期，大选导致了第一届短命的工党政府。就在圣诞节我同父亲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成了工党成员。

1928年，我要求移居美国，但没有获准。30年代初，我接到美国领事馆的通知，说我可以再次提出申请；不过，当时我已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所以就不再想移居他国了。

问：你是怎样被卷入政治活动的呢？

答：那是一个我们国家十分困难的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没有工作。我参加了工党，很快又参加了青年组织，所以十分热衷于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1932年，我找到了第一个政治方面的工作，被派到北方很远的一个工业小镇上去。从那以后，除了战争和在集中营的岁月外，我的工作一直是从事政治活动。

问：对你比较大的意识形态影响是什么？

答：主要问题是经济，这是我们的基本路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1933年大选就是围绕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进行的，我作过大量研究工作，但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青年组织和社会党内一些有组织的团体内。起初，我是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战后，我被选为管理党的总书记，还是战后防务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我一直是在组织工作中以及实际政治工作中受教育的，经过几年努力，可以这样说，我对经济学的了解，要比那些在大学里学了几年的青年人强得多。我花了很长时间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当过两届政府的财政大臣，一共7年，制定过8个国家预算，比任何人都多。

问：30年代，工党是如何考虑来自挪威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威胁的？

答：北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对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是有所警惕的，除英国之外，它们都为坚决抵抗法西斯纳粹的扩张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在欧洲的这一部分，法西斯主义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回顾过去，可以这样说，北欧地区

当时有一种民主大团结的气氛。

问：概括起来说，占领和抵抗对于挪威和工党具有什么重大影响？

答：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影响。如果以该国民主政策的基本方针为例，我想从30年代开始到今天，这是一条几乎没有中断过的基本路线，是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它的最大预言家就是凯恩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我同一些青年朋友讨论过许多问题，我们经常讨论战后干什么——这是一个很让人高兴的题目：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即进一步贯彻30年代的政策：充分就业、良好的教育、更多的社会正义等。战后，工党变得更强大。真正转折是30年代，在其他方面，在对外政策以及防御政策上都发生了变化。

在讨论未来时，我们认为不可能指望用30年代的防御政策保卫我们这个国家。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必须使许多国家团结起来。在挪威受到实际进攻时，它的中立在人们的感受消失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许多挪威人难于相信有这种可能性。至少从1905年我们同瑞典断绝旧的联系以来，挪威人就认为只要我们不向别人挑衅，就不会有人来攻击我们。法西斯纳粹的占领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为什么我们的外交和防御政策能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使挪威最终成了北约组织的成员，这就是原因之所在。

问：在本世纪内，挪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是令人惊奇的。

答：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经济情况不可能发生真正深刻的变化。重大突破在于看到通过控制经济情况的适当方法是可能作到这一点的。今天，我们又处在这种

讨论之中了,对我来说,听到这些 20 年代的论点,确实感到很震惊。

在我童年时代,多子女被看作是十分自然的事,尤其在农村,几乎全挪威都是这样,每家都有 6—11 个孩子。到 30 年代,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而且不是靠宣传。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挪威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基础,大群大群的孩子对 30 年代的失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这一代人结婚时,他们反对这样的大家庭,正如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这 10 年时间内并没有借助任何宗教或政治力量。

问:什么原因使挪威工党比——例如瑞典社会党——更为激进呢?

答:挪威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快,年轻夫妇们纷纷离开家,抗议他们所在新工厂中的生活条件。

问:这种情况似乎是 19 世纪初英国发生过的那种情况的翻版,只是节奏加快了,唯一例外的是:这里已经有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它能够沟通被剥夺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激烈感情,然而在英国,这种抗议却常常转变为卢德主义,工人阶级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形成有效的学说和组织机构。

答:马丁·特兰梅尔就是一个例子。数十年来,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他出身在农村,确实是从来没有在城里的家中待过。他对工业化以后的许多事都极其怀疑,他是两代人的典型,是那些根在农村和小城镇的青年人的典型。他对俄国革命所产生的那种新的政治联盟深表怀疑,是挪威国内的反对共产国际的主要人物;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把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是一个典型的挪威人。由

于这个原因，你在这里看到的完全对立的倾向，要比瑞典和丹麦明显得多。

问：你在对欧洲共同市场进行公民投票时是首相，投票失败后辞职了。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分歧意见呢？

答：我曾努力研究过德法战争以来欧洲发展的基本路线。我过去坚信，现在仍然坚信，只有各国之间的联系得到发展，并且正常化，欧洲的稳定才有发展。挪威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条件已经接近于成熟。战后，我对各国之间新形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的思想是支持的，目的在于为世界的这一部分更加稳定的局势和更加安全的未来奠定基础；但你在这里看到，我们整个几百年的历史又重演了。在后来的讨论中，所有的传统都有代言人。在我们党内，在党的组织中，我们始终得到坚定的支持，但也有各种批评意见。后来，我们决定进行公民投票。政府一致同意采取这样的立场：如果公民投票不支持政府准备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建议，那么根据议会规定，政府就不得不辞职，因为参不参加共同市场是个事关长远的问题。今天，挪威同共同市场的经济联系，要比决定不参加共同市场的时候多得多。我说不准经济上的一体化会更快发展，如果我们成为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话；但不加入共同市场的最重要后果在于，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

问：我想最后问一下，你认为工党作出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本世纪所剩之年你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70多岁了。我记得我亲眼看到过的小城镇和农村，那真是千真万确的阶级社会。挪威和30年代我20多岁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小农和有一定

规模的农场主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联系。例如，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挪威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在他 50 多岁时，才通过救世军找到他的父亲。他父亲曾经在一家农场做工，农场主有个女儿同他父亲同岁，俩人接触后想结婚，但女方的父母不同意，结果，我朋友的父亲只好不辞而别了。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农庄，也是不能答应一个毫无社会和政治地位的真正无产阶级，娶一个挪威农夫的女儿的，那是真正的阶级社会。今天，已经非常不同了。我访问苏维埃俄国的时候，看到那里从旧的阶级社会中继承下来的东西要比我们多得多。

问：在本世纪剩下的年代里，你们考虑的重点是什么？

答：概括起来回答，就是沿着同样的方向继续前进。

第五章 布鲁诺·克赖斯基和 奥地利社会主义

引 言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由维克托·阿德勒在1889年的海因费尔德代表大会上创建的,1918年前,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该党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不仅力争在选举中取得群众的支持,而且积极扩大党的队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党的党员人数始终占奥地利总人口的10%左右。社会党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这种状况导致奥地利社会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分化成为三个互相对立的营垒。

奥地利的社会运动基本上依靠三个支柱:社会党、工会以及合作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试图将所有政治派别纳入自己的组织,因此,它的活动实际上变成了中立的性质。虽然社会党在工会联合会中占有明显的多数,但目前党与工会的关系仍然是有限的,特别是关于工会对社会党的财政支援。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不再是一对“连体双胞胎”,不过两者之间仍然保留着一个联锁理事会体制;合作社运动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虽然与党有联系的许多组织目前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它们仍然举足轻重,例如,“运动协会”目前拥有70万

左右的会员，“自然之友”组织也有12.6万名成员。

奥地利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1934年前，他们在党的领导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社会民主党有一条非正式的规定，党的执行委员会中犹太人不得超过半数。维克托·阿德勒或奥托·鲍威尔等领导人与党之间差不多是一种家长式的关系。阿德勒、鲍威尔、马克斯·阿德勒以及卡尔·伦纳都是非常激进的思想家，他们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新康德主义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等流行思潮于一体。社会主义者的对手所杜撰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很快成了这个起刺激作用的运动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摆脱了缺乏创见的党内庸人和官僚主义者的统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不断减弱，原因之一是维也纳犹太人组织的解体，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奥地利社会主义非常强调党的团结，它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分裂局面。党的领导者懂得如何顺应潮流的变化，避免党内团结的解体。共产主义从未十分得势。

帝国时期的奥地利社会党基本上是一个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的政党；各个民族创建了它们自己的党派。最初，帝国当局是反对社会党的，但不久却采取了宽容的中立态度。社会党在奥匈帝国中属于少数具有向心力的政治势力，他们想在帝国内建立民族自主权。1906年确立了男子普选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党成了奥地利议会中最大的集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社会党领导曾支持奥匈帝国向其仇敌俄国的独裁政府开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战呼声高

涨。1916年，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刺杀了帝国总理施蒂尔克伯爵，从而成了许多战士眼里的英雄。他的行动不仅表明他不赞成父亲奉行的政策，而且也是对帝国政策的抗议，它使党避免了战后的严重分裂，并使党更加坚定地沿着反战的道路阔步前进。

由于帝国崩溃，许多社会党人希望奥德结盟，但盟国无意如此，因此，残破的奥国只得依然如故。社会党作为一个主要政党参加了1918—1920年的临时政府。在此期间，奥地利社会党显示出了远比德国社会党高明的见解，它认为党的敌人不是左翼，而在于右翼。它没有强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也没有与右翼同流合污，而是向左前进，至少在言论上是这样，从而限制了共产党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党还试图建立一支忠诚的共和国军队和警察。

遗憾的是奥地利社会党没有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由于党的左倾，1920年后，它不愿与基督教社会保守党继续携手合作。此后，右翼的联邦政府，社会党人控制了维也纳。维也纳成了新社会的样板。在那里房租得到了控制，大批综合性的公共住宅拔地而起，为工人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舒适生活环境。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学、卫生和福利纲领制定出来了，其经费来源于对富裕阶层征收的高额税收。假如基督教社会党人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日益反感的话，他们与社会党的权力分配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在伊格内斯·塞佩尔领导下，基督教社会党人与法西斯主义的海姆威尔串通一气。特别是1927年以后，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党被迫采取守势。塞佩尔的接班人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希望在墨索里尼的支持下建立

自己的教权法西斯主义，以便顶住纳粹为吞并奥地利而施加的压力。他一步步取消了政治自由，终于在1934年违背党的领导人的愿望，煽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暴动，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奥地利社会党进行了反击，而且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他们建立了名为“革命社会党的地下组织，尖锐地批判旧的领导，要求党奉行一条更为激进甚至列宁主义的路线；但他们始终没有中断与鲍威尔以及总部设在捷克的其他党的领导人的联系。1938年，舒斯尼格似乎表示愿意让社会党合法存在，以便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但这种期望又因为德奥合并而化为泡影。在纳粹统治下从事反抗斗争，要比在政局动荡的教权法西斯独裁下艰巨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社会党进行了改组。俄国人支持以卡尔·伦纳为首的临时政府，而英美则勉强承认了它。尽管苏军占领着奥地利的一半领土，但伦纳和社会党还是再次成功抵制了共产党。在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仅仅获得5%的选票，“人民民主”未能行得通。

经历过纳粹统治之后，奥地利社会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人决定要避免重蹈第一共和国的覆辙，不再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由于苏军直到1956年才从奥地利撤退，因此这一点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1966年前，奥地利由数届联合政府执掌国家大权。政府部门中的职位根据选举结果，在忠于共和国政府的两党党员中按比例分配。1966年后，出现了定期的轮流执政，但重要问题在提交议会前仍然先在党的领导人中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两党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意识形态的狂热减弱了，以往庸俗的党派冲突也逐步停息。但奥地利社会党

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它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社会党近 2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布鲁诺·克赖斯基。本世纪 30 年代，克赖斯基是奥地利青年社会党的领袖，后加入革命社会党并被逮捕。1936 年 3 月，他在审判 30 名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时的演说，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天审判的高峰。克赖斯基呼吁政府还人民以政治自由，指出这是捍卫奥地利独立的唯一途径。随后，他被流放到瑞典，直到 1950 年，他学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实践经验。返回奥地利后，他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参加了签订奥苏条约的谈判工作。1957—1958 年，他领导一个委员会着手制订新的党纲。1959 年他担任奥地利外交部长，1967 年任党的主席，1970 年出任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对那些以前不给社会党投赞成票的社会团体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使社会党第一次赢得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1983 年竞选时，克赖斯基声称，如果社会党丧失它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他便下野，不再担任总理。虽然社会党在这次竞选中得票情况不错，但未能保持绝对优势，于是只得与很小的自由党建立了联盟，克赖斯基也辞去了总理职务。多年来他一直在接受肾透析治疗，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他继续担此重任。尽管如此，他仍然积极参与社会党国际的活动，他在巴勒斯坦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激进立场，使他成了一位众人褒贬不一的人物。

布鲁诺·克赖斯基访问记

问：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的家庭背景以及家庭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

答：谈到我的前辈，他们有的是当时经营能称之为工业的工业家，也有律师和政治家。我的一个叔伯祖父约瑟夫·诺维尔特，曾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中活跃于奥地利议会。他是位自由党党员，主要关心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当时的时髦课题。

无论是作为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他们都能尽心尽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了有的人为疾病所困扰外，整个家庭基本上是平静的。

然而，当时有许多人生活在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一些思想敏锐的人在资产阶级逆境中逐步成长起来，悲惨的命运自然形成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其中有些人的反抗意识不断强化，推动他们成为积极的共产党人。但许多人比较严肃地考虑了这些问题，他们转向社会民主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在此，我不能不指出为希望立足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所设置的障碍。为了考察他们的反应，许多人曾经遭到过冷落，而且把一再排斥他们视之为道德。结果有些人被永远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那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把这些人拒之门外并没有受任何损失。我要指出，如果没有工人运动中朋友的竭力挽留，甚至我也会屈服于那种无情的排

挤的。一旦一个知识分子被接收的时候，看到人们为他能够投身于工人运动而何等高兴的情景是令人感动的；因此，相互间真诚的友谊和信赖是人们可能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问：当您开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时，您主要受到过哪些意识形态影响？您是否受到过较多的马克思思想的直接影响，还是更多地接受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影响？党的任何老一辈领导人对您产生过重大影响吗？

答：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当然还读过《共产党宣言》，但没有阅读《资本论》原著。

在我因为政治原因被监禁的时期，我才得到充分的时间来认真研究《资本论》。直到今天我仍保存着当时在重要段落及句子下面划过线并加过注的那几卷著作。此外，我在狱中还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大量的来往信件。

除了社会主义文献以外，当时在社会民主党内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也对我产生过强烈影响，特别是奥托·鲍威尔，卡尔·伦纳和马克斯·阿德勒等，我要强调的是，此后，我从未遇到一位像奥托·鲍威尔那样具有高度思想智慧的人。但我也感到，鲍威尔在政治活动中并非一贯正确，有时尚显优柔寡断。

我是维也纳第四选区的青年代表，那是奥托·鲍威尔所在的选区，因此我经常有机会仔细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当时我感到他对我很感兴趣，比如，带我一道出席社会党机关报《工人报》召开的会议，同时我还是卡尔·伦纳选区内下奥地利的一名代理人和党代表。党在下奥地利的所有政治家都是

伦纳的朋友，也是伦纳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我和他们都非常熟悉。由于我比许多人更熟悉这两位党的领导人的情况，所以有助于我在他们中间保持某种基本的力量平衡。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两人的教诲。当然，维克托·阿德勒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但他距离我们太遥远。鲍威尔和伦纳好比两根标杆，我和其他一些人都沿着他们标定的航道向前迈进。

问：您能否谈谈您在革命社会党中从事了哪些活动？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革命社会党激烈批判老的社会党，您在何种程度上持相同观点？革命社会党对奥地利社会党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何种作用？您认为布丁格爾的思想有用吗？为什么战后他在党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答：1933年在萨尔茨堡，600名代表选举我担任“劳动青年”的教育委员会主任。由于1934年2月社会党的所有机构全部解散，我当然也就无法继续履行我的职权了。但我感到，对那些选举我的人来说，我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仍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尽我所能继续为党工作着。1936年审讯社会党人，我是受审者之一，当时我也是这样承认的。

对于革命社会党所从事的活动，只能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加以认识。那时没有民主，只有我们与之斗争的独裁统治。因此，我在受审时宣称，我们所要进行的革命是菲迪南德·拉萨尔所提出的意义上的革命：“革命意味着激烈的变革，当用一种新的原则去改变现状时，不可避免地要爆发革命；是否采用武力手段，那无关紧要。”

下面让我谈谈您感兴趣的约瑟夫·布丁格爾的情况。1934年末和1935年初，革命社会党的领导人遭到第一次大逮

捕。当时布丁格尔担任非法社会党的领导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党的政治活动。

后来，布丁格尔从事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活动。他与夫人一道帮助许多遭受迫害的人逃离险境，使他们免遭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丁格尔决定留居美国。随后，老的社会民主党与非法的革命社会党首次实现了联合，“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的本身已经是个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名称的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带括弧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社会党”。

后来，约瑟夫·布丁格尔撰写了一本名叫《堪称典范的奥地利》的书，完全以个人的观点描述了这些事件，该书的某些内容遭到他以前的一些党内同事的激烈批判。但如果公正地考虑一下他的观点的主观性质，人们就必须承认这本书对我们党的历史的重大贡献。从他对奥地利的无数次访问以及我与他直到最近的通信交往来看，从他把自己的珍贵藏书赠给奥地利大学这一事实来看，他从未切断自己与奥地利的密切关系。

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您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度过了将近10个年头。您能否谈谈这一时期从事的政治活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对您的社会主义观点产生过多大影响？

答：我流亡瑞典期间，是作为斯德哥尔摩消费者协会秘书处的雇员在那里工作的。另外我还担任各种外国报纸和杂志的记者，也给瑞典的日报和各种周刊投稿。1939年夏，我到法国里尔出席社会党青年国际代表大会。在那里我们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论，他们

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士兵为我们的解放正在战壕中血战，他们谴责我们支持了战争。^{*}我们试图向他们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他们也会很快面临战争的危險。当时有人对我高喊：“我们不想为但泽而死。”几个星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最近我多次重提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推进和平运动，大的政党也应该为此而奋斗。但是我们还必须明白，仅用示威游行的手段，仅有热爱和平的愿望是不可能维持和平的，我们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和平方针。

离开法国后不久，我初次遇见维利·勃兰特，这是我们毕生友谊的开始。我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处理与移民事务关系特别密切的那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处理逃到瑞典的德军人员的政治避难问题。另外，在最初阶段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声明，宣布在瑞典的奥地利社会党支部重建独立的奥地利，并在伦敦召开来自各国的奥地利代表参加的奥地利国民代表大会。

至于你提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那确实是正确的。当奥地利和德国独裁政权当道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这些党最终夺取并巩固了政权。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它们克服刚刚开始好转的经济危机。在执行该项经济政策时，它们遵照一位名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行事。由于他不接受关于市场规律最终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宿命论观点，因

* 我只得回答他们说，他们的自由也同样危在旦夕。

此成了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国家可以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克服经济危机。有意思的是，在最近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们一位年轻经济学家将我们的经济政策称之为“奥地利凯恩斯主义”。对此，我回答说：“奥地利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的关系，就好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关系。”对于借用他们的名义生造出来的东西，凯恩斯和马克思很可能都会摇头叹息。尽管如此，这些说法还是具有某种意义的。

问：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差别，人们众说纷纭。您曾经指出这种差别被过分夸大了。您能否谈一谈党继承了什么，摒弃了什么？

答：作为一名社会党人，他必然会反复谈到经济秩序中最严峻的一种现象即失业。倘若 3500 万希望工作的人们不能够得到各自的一份职业，将会造成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假如有人被迫离开他的生产岗位，离开他的工作，也会带来心理上的严重后果。

我曾经亲眼目睹了经济危机给工人运动，特别是奥地利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失业者达到了惊人庞大的数字。几万，甚至几十万人都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靠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600 万人口中约有 50 多万人无疑陷入了失业的困境。

那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因此不得不经常开会反复进行讨论。有些同志认为，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因此，只要等待情况明朗化，就能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但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观点主要遭到了奥托·鲍威尔的反对，他运用他的全部知识，证明这是资本主义的

一次严重的或者说最为严重的危机，但不是最后的危机。

这次论战的背后，还进行着一场关于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意识形态争论。有些同志认为，社会民主党有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有时是革命性的。这就是说，在战争与危机导致的两次革命的中间阶段，党应该维持并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为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作好准备，这期间必须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但我们还要在各社区和地方发挥作用，因此，在实践上应选择改良主义的政策，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革命间歇”论。

另一派叫做无条件的改良主义，他们不同意上面的观点，认为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从而使革命成为多余而失去了必要性。

马克斯·阿德勒将上面的第一种理论称为“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些人则信仰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这两种人均以失败告终。

无论何种原因使这次危机得以克服，但它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这是显而易见的。危机结束之时并未出现革命，而是走向了两个极端，不只是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有共产主义的发展。奥地利的近邻德国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在这个国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拥有几百万党员的共产党，这当然也是经济危机的产物。

因此，这次经济大危机实际上也导致了政治目标的混乱。工人阶级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有工作可做，一部分人失去了谋生之路。

事实证明，幻想实现革命高潮与信仰改良主义同样都是

不正确的，因为很快就十分明朗的是，这些可能很美妙的改革不可能筹措到资金。因此，社会民主党内的这两种倾向都因为经济危机而半途夭折了。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从这种发展中吸取教训以后，它才能决定运用国家的经济政策驾驭危机。与其他工业国相比，今天奥地利的经济形势是极好的，由此证明，反对经济危机的斗争是可以成功地进行的。

问：按照同样的思路，有些作者说奥地利社会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又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指导思想。请问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答：据我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方法仍然是令人信服的，他们的思想方法对我教益匪浅。今天，我们不可能再依据本世纪初的教科书来学习物理学，但牛顿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虽然在他之后又出现了爱因斯坦。这个道理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

我是为了一种发达的民主而生活和工作的，我认为这种民主的规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以，我今天为改良的概念得到了更加现实和合理的解释而深感欣慰。有的改良是以保留原来制度为前提的，而另一种改良则要变革旧的制度，这两种改良的区别是有目共睹的。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区别常常要从辩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即改革的量变会带来社会的质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毫不含糊并毫无保留地认为，哪里有专制独裁，人民就有权起来推翻它。哪里出现这样的运动，我就会全力支持。对于世界上为暴君所统治的地方，我公开提出这样的原则：不能伸张正义的被压迫人民道义上有权利起来进行革命，以夺取他们的权利。对于一个社会

民主党人和老一辈政治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惊人之举，而对我来说这是道义上的职责。

在这一方面，人们常常问我对阶级斗争和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持什么观点。我认为阶级斗争属于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不断发生的。今天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分配斗争，即社会中为分配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名词，为的是避免使用“阶级斗争”这种说法。阶级斗争是一种历史事实，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斗争形式，好比说，它正在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但无阶级社会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这一点我们已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内看到了，在那里新的阶级取代了旧的阶级。有时，我们分析阶级的经济特点，有时，我们分析阶级的官僚政治特点，有时则分析它的军事性质；我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探讨阶级形成的原因并对它加以某种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不时对阶级统治提出挑战。人们的升迁程度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最根本的是富有智慧的人民有机会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不断创新发展，阻碍这种升迁的任何因素都是有害的。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实现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化。每一个领域都必须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在经济领域，不可能简单地采取数学计算的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譬如，不能把500名工人与一个经理等量齐观，必须使雇员们在工作中有一定的地位，一种与雇主相对等的地位，以便雇主在给与蓝领和白领工人参与决策的权利后能够行使其职权。但经济

的民主化过程不应招致利润的下降。那些不是企业家的人们也应该认识经济规律。

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是个四分五裂的社会，1945年以来成了社会稳定的典范。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奥地利社会党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形成了这种变化？

答：本世纪30年代期间，为了对付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我们超越分裂的利益，竭尽全力维护共同利益，但由于资产阶级政客顽固对抗，这些努力未能奏效。他们不是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而是解散了议会，从而导致1934年2月的血腥内战和工人运动组织的瓦解。经过这些事件后，在人民中间产生了一种对资产阶级政权难以抑制的敌对情绪，有些人声称，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他们都表示欢迎。但我坚定地相信，如果能够达成1945年以后签订的那种政治协定，我们就可能将奥地利从纳粹手中拯救出来。1936年我曾经说过，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当时的人数比今天多得多）倘若与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结成联盟，就能形成占人口70—75%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纳粹主义是无法将它击败的；也许是通过军事力量，但事变没有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发展。我们在军事方面没有失败，但我们在政治上早已斗得精疲力尽，原因之一是右翼已经将奥地利拱手交给了墨索里尼。

1945年后，我们不仅极其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不同的阵线很快找到了共同的立场。我认为这是奥地利战后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奥地利人民的所作所为证明黑格尔的著名论断是完全错误的，黑格尔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人民没有从战争中吸取任何教益。

但奥地利人民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最近在西班牙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一旦人民真正认识到内战的危害，他们就不会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1945年以来，我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开展了正常的交往接触，从中我们颇有收益。这种接触是在我国的社会合作体制中进行的，外国有许多人对此倍加赞赏。这种体制要充分发挥作用，首先应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它们非常清楚要求从他方得到什么合乎情理。在关键时刻是否中断谈判，双方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谈判都能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如何也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谈判的各方都知道对方的实力，采取毫无意义盛气凌人的姿态是不可取的。

我曾经用精神分析法中的一个术语给社会合作下过定义，叫做“升华了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分配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在这里工资、薪金和利润起着与价格相同的作用。

问：奥地利社会党在社会党国际中一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您一定继承了这一传统。今后10年中社会党国际的目标是什么？

答：1923—1940年，奥地利社会党创始人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弗里德利希·阿德勒一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总书记，他辞职后，这个国际也就崩溃了，这就是奥地利社会党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称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社会党国际之间密切联系的证明。此后，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又于1949—1956年任社会党国际的总书记，1969—1976年间，

汉斯·雅尼茨奇克又接任其职位。

1964年，当时任奥地利副总理的布鲁诺·皮特曼当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他担任此职直到1976年。1976年在日内瓦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奥地利社会党主席、奥地利联邦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博士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直到现在仍任此职。

目前10年社会党国际的主要目标是：裁减军备（社会党国际任命了一个特别顾问委员会负责裁军问题）；与裁军密切相关的进一步目标包括改善南北方关系（例如，已由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所谓勃兰特委员会报告）；最后是作为上述努力之基础的人权问题。

目前10年社会党国际特殊活动的地区包括：中东（由布鲁诺·克赖斯基领导的实地调查委员会负责）；拉丁美洲，社会党坚决支持那里的解放运动和抵抗阵线，其中有些是由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领导的；南非（1977年由奥洛夫·帕尔梅领导的社会党国际前线国家使团负责，专门支持前线国家的斗争）。社会党国际活动的总题目当然是缓和，它的基础在于承认在核时代，政治对手之间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对话是唯一可能的行动方式。

第六章 迈克尔·富特和 英国工党

引 言

1979年11月，迈克尔·富特当选为英国工党主席；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后，他于1983年6月辞职。在他领导工党时曾屡遭挫折。对处于严重分裂局面中的工党，他难于加以控制。富特曾致力于实现工党左翼的奋斗目标，如实行单方面的核裁军，支持英国退出共同市场等。他当选为工党主席后助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富特“温和”的左翼方针不同于托尼·本等领导人的“强硬”左翼路线，后者不像富特那样尊重议会并注重党的团结。因此，富特只好依靠工党右翼的支持，来对付这些新左派。1983年竞选的失败表明，公众既不赞成左翼党的纲领（许多工党议员亦持同样观点），也不相信一个无法管理自己党内事务的工党能够领导好整个国家。

工党的危机反映了英国社会中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危机。英国经济的衰退，导致50年代以来就在保守党和工党内部普遍流行的中间派观点对两党的激烈批评。玛格丽特·撒切尔将保守党推向了右翼，她的政治手腕以及福克兰群岛之战，既使她战胜了党内的温和派对手，又使她在大规模失业时期赢得了大选的空前胜利。但在工党内，既没有任何集团，也没

有哪位个人能够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这个危机时期使党内各派之间的历史性差异进一步明朗化，并且暴露了党在结构方面的缺陷。简单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了解工党何以落得个如此结局。

虽然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但英国工党的创建却迟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英国工党不同于该大陆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不是作为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甚至社会主义的党派建立起来的。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中不乏激进的政治主张。罗伯特·欧文既是全国工会运动的先驱，又是合作社制度的创始人。英国宪章派曾经为使工人获得政治权利而进行过争取男子选举权的斗争。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缺乏斗争经验以及对手过于强大，他们的努力失败了。鉴于工人运动来势迅猛，统治集团便调动一切力量与之对抗。随着维多利亚繁荣时代的到来，以及革命政治活动的明显失败，工人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案和建立温和的工会组织。工人的日益“理智化”使自由党和保守党于1867年和1884年两度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19世纪末叶，大多数工人开始支持自由党，少数工人则加入了基尔·哈迪创建于1893年的独立工党和亨利·海因德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

在与自由党合作取得的微小胜利受挫之后，工会代表大会又与独立工党、费边社及社会民主联盟联合起来，组成了工人代表委员会，以支持它们在议会中的候选人（固执己见的社会民主联盟不久退出了工人代表委员会）。1900年他们只获得二个议席，1906年得29个议席。工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

有内聚力的政党，而是一个联合体，其支配力量是工会代表大会；由于党的以集体参加组织的成员人数为基础的间接代表制结构，所以工会代表大会控制了党代会压倒多数的选票。十分突出的一点是该党先确立了它的政治结构，后来才规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它明显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影响。像西德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以及费边社的乔治·肖伯纳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主张实行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路线。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积极参加了非英国国教的教派，他们的思想明显打上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烙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工党的大多数党员支持英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5年起，工党成员开始进入英国内阁，当时，以党的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工党少数派持反战观点。1924年，工党在议会中赢得142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反对党之首。1924年的一段短时间内，重新担任工党领袖的麦克唐纳组成了少数派内阁。由于他的内阁依赖于自由党的支持，所以没有实行重大的改革。但这一点表明工党是有能力在议会制度中掌权的。

1929年，工党重新上台，但仍未取得绝对多数议席。这是工党奋发的时期。麦克唐纳与他的财政大臣斯诺登坚定地采取了一系列通货紧缩措施，以对付经济的大萧条，但遭到党内日益强烈的反对。在工党不支持他的政策的情况下，麦克唐纳决定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实际上内阁中没有任何工党人员。经过这次打击后，在30年代的其余年份里，工党始终处于反对党的地位。工会重新取得了优势，欧内斯

特·贝文^①成了一位幕后人物。193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②取代和平主义者兰斯伯里^③担任工党领袖,该党新的外交政策强调集体安全。即使在这个时刻,工党也难于在法西斯扩张主义问题上采取旗帜鲜明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再次参加战时内阁,而且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许多工党领导人逐步积累起政府工作的经验,事实证明,这些经验在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时,艾德礼升任英国副首相。1945年,工党出人意料地在大选中获胜。艾德礼政府将几个关键性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使贝弗里奇报告^④中关于社会福利的许多建议得以付诸实施,同时,还确立了国家健康服务。英国没有实施集中统一的计划,同时,工党也反对参加欧洲煤钢联营。工党左翼认为,英国的国内政策还不够激进,他们不赞成政府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工党左翼领导人安奈林·比万^⑤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是迈克尔·富特政治上的良师益友。1948—1952年,

①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是运输与工人总联合会的领导人。193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为工党主席时,他成了党的主要权力人物。战时他担任联合政府的劳工大臣,战后在艾德礼内阁中任外交大臣。贝文与比万在艾德礼政府中代表工党的两个极端。

② 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1935年取代兰斯伯里当选为工党主席。他担任过联合政府的副首相,1945—1951年间任英国首相。1955年辞去工党主席的职务。

③ 乔治·兰斯伯里(1859—1940),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麦克唐纳组阁后任工党领导人。1935年,他反对制裁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因此欧内斯特·贝文激烈反对他继续担任工党主席。他辞职后由克莱门特·艾德礼接任工党主席。

④ 贝弗里奇报告系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领导的“社会保险与综合服务”委员会在战时提出的一份报告,它为战后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富特主编《论坛》周报^⑤，比万的支持者常在该刊陈述他们的政见。为了弥补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赤字，1951年英国政府决定征收配眼镜和装假牙的费用，从而导致比万辞去了他的内阁职务。艾德礼作为工党领导人引退之后，温和派休·盖茨克尔战胜比万当选为工党领袖。他们两人和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0年，盖茨克尔得到了大型工会的支持。1959年又掀起了一场特别激烈而无益的争论，当时，盖茨克尔主张撤销党纲第四条规定的保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单方面实行核裁军的关键问题上，比万与盖茨克尔却目标一致，这使迈克尔·富特那样的比万支持者大出意料。1960年的工党斯卡巴勒代表大会，勉强同意英国放弃核武器，但盖茨克尔和议会党团反对这一措施。这就提出了工党代表大会与议会党团的相对权力问题，而且在70年代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次年，盖茨克尔促使工党代表大会推翻了英国放弃核武器的决议。1960年，比万辞世。时隔3年，盖茨克尔也相继去世。工党的新主席哈罗德·威尔逊原被认为属于工党的左翼，但不久却使他以前的同志大失所望。在他当权的年代里，他接

^⑤ 安奈林·比万(1897—19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党左翼领导人。在担任英国住房与卫生大臣期间，他曾建议制订地方住房建设的法规，并确立了国家健康服务。1951年内阁决定向装假牙与配眼镜的病人收费时他辞去了大臣的职务。以后的几年中，比万的支持者在工党内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派别。他们反对重新武装德国，表明他们背离了党的路线。1955年，工党右翼的候选人休·盖茨克尔击败比万，当选为工党主席。但在后来的年份里，以前的对立派别又设法携手合作，比万当选为影子内阁的外交大臣。比万反对英国单方面实行核裁军，他的立场导致他与迈克尔·富特等许多比万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冲突。

^⑥ 《论坛》周报系工党的左翼周报，创办于1927年。50年代期间，它是比万主义的战斗阵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迈克尔·富特曾两度担任该报的主编。

连挫败了工党内部所有的派别活动。

威尔逊在1964—1970年当政期间，虽然表现出一位纯政治家的高超手腕，但在处理一些实际问题时却并不成功。威尔逊坚决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在罗得西亚争取独立的问题上却束手无策，他为经济问题与金融问题所困扰，无能于制订行之有效的经济规划。根据名为《代替冲突》^①的白皮书，政府试图对工会实行改革，但引起工会的强烈反对，结果只得收回成命。工会不同意政府对其权利的任何限制，因此进一步倒向工党的左翼，经济与劳务市场的不景气又加剧了这种状况。尽管威尔逊在1970年遭到失败，但他保住了他在工党中的领导地位，并于1974年工党重新入阁时担任英国首相。

直到1974年，迈克尔·富特仍处于工党领导核心的外围。他一向是比万派的主要喉舌，在核裁军问题上，甚至比比万还要比万。1960年比万辞世后，富特成了他在埃布维尔老选区的代表。到70年代，富特决心要在工党中发挥更大的核心作用。1974年，他被任命为就业大臣。1976年詹姆斯·卡拉汉担任英国首相时，富特跃居下议院领袖的地位。

1979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人们对卡拉汉及他所奉行的政策怨声载道。1979年的大选标志着英国政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首相，她结束了温和的保守主义统治，奉行一条严格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1979年大选的失利使卡拉汉丧失了原来的优势，使他难于抵制托尼·本一

^① 《代替冲突》是1969年在巴巴拉·卡斯尔和威尔逊支持下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它规定劳工大臣有权要求工会在下令举行罢工和进行秘密投票以前有一个月的平静时期。由于工会的强烈反对，政府撤销了白皮书中的一些重要条款。

派的要求。托尼·本要求改革党的体制，其中包括由选区党组织(左翼掌权)强制性地重新推选下院议员，由工会、选区党组织和议会党团组成的选举院选举党的主席等，以便削弱议会党团的权力；托尼·本还想迫使议会党团遵守党代会上提出的竞选宣言。与此同时，托尼·本还提出了一个政治纲领，要求英国退出北约集团，实行单方面的核裁军，并且退出共同市场，将保守党实行私有化的工业部门在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条件下重新收归国有。1980年9月30日，工党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强制性再选举和选举院的决议，但对选举院的具体形式持异议；他们还投票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但反对退出北约。10月15日，卡拉汉辞去工党主席的职务，目的是想在选举院的体制生效前，迫使工党选举新的领导人。11月10日，迈克尔·富特在第二轮投票表决时击败丹尼斯·希利，当选为工党主席。

迈克尔·富特执掌工党领导权之时，恰逢一个相当艰难的时刻，他面临着右翼和左翼两个方面的问题。时隔不久，詹金斯、欧文斯、威廉与罗杰斯组成“四人帮”，脱离工党，成立了英国社会民主党，并在后来与自由党在大选中结为联盟。虽然社会民主党没有从工党中拉走许多下院议员，然而它在一些重要的补缺选举中多次获胜，从而构成了对工党的潜在威胁。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行为削弱了工党右翼的力量。与此同时，富特卷入了与托尼·本及其支持者的一系列小规模摩擦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像支持卡拉汉那样支持富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事工党左翼活动40年的富特掌权后却遭到了来自左翼的许多麻烦。在国内与国际问题上，富

特与托尼·本一派常常各持己见。他赞同英国退出共同市场，实行单方面核裁军，反对制订限制工会活动的任何立法。相反，他主张给下院议员以特权，坚决反对将议会党团置于选区党组织控制之下的建议。富特主张保持工党的团结一致，而托尼·本则认为必要时应当清除右翼，以维护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更有甚者，托尼·本还拒不遵守党的纪律。由于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利，要求富特辞职的呼声日益强烈。但富特却得到工会的强大支持。在这极其关键的时刻，更换党的领导人似乎是很不明智的，因此富特继续留任，但权力进一步有所削弱。福克兰群岛冲突及其所掀起的沙文主义风潮，使撒切尔获得了要求进行大选的良好时机。

1983年大选使工党的得票比例降到了23.3%的战后最低水平。失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主党的攻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民主党只获得6个议席。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的联盟也只获得了少数议席，但却与工党相差无几。工党的分裂是它竞选失利的主要原因，保守势力实际上只下降了0.5%。富特担任工党领袖的经历并不一帆风顺，但问题不仅仅取决于党的领袖个人的品格或政策偏好。今后工党的前景究竟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

迈克尔·富特访问记

迈克尔·富特：

我的父亲(艾萨克·富特^①)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党人。早年他曾是以亨利·海因德曼为首的社会民主联盟^②的支持

者，不过那是他18或19岁时候的事情了。后来，他成为英国西部地区（包括普利茅斯及其周围整个地区）的西部自由党的党员。多年内，他时而当选为下院议员，时而又落选。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自由党家庭长大的。

我曾在牛津大学就读3年。我认为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我加入工党并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在牛津大学中我有几个朋友是工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学会的成员，他们介绍我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初次相识，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①。我与他的儿子约翰·克里普斯是至交。但直到我离开牛津前往利物浦，进入一家船运公司，从而初次踏上职业岗位之后，我才于1934年在利物浦的沃尔顿选区加入工党。

问：在那个选区内是否具有大学学位的人才能被接受为候选人？

答：我不是作为一名候选人被该选区接受的；我以普通身份加入了工党。1935年秋，担任保守党首相的鲍德温宣布进

① 艾萨克·富特(1880—1960)，自由党人，卫理公会教徒。他当了8年议员，曾任矿业大臣。1932年因反对政府转向保护主义而辞职，为了维护原则而毁掉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富特还是一位著名演说家和藏书家，共收藏书籍7万余册。

② 亨利·海因德曼社会民主联盟，由海因德曼(1842—1921)于1884年创建，并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该联盟的活动从未得到人们的大力支持。海因德曼曾在几本书中阐述过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889—1952)，基督教社会主义者，30年代反对过重新武装和集体安全的方针，1939年被工党开除。后重新加入工党并担任英国驻俄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下议院领袖。1947—1951年间任英国财政大臣。

行普选，这次普选牵涉到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问题。当时我希望成为一名工党候选人，因此来到工党的核心机构“运输社”，询问哪个选区还有空缺的候选人名额，哪些地方还没有为1935年11月的选举找到议会候选人。他们递给我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威尔士的蒙默思选区，于是，威尔士成了我首先考虑的对象。使我十分惊喜的是，在他们尚未找到候选人的选区名单上，竟然还包括威尔士的一个选区；他们对我说，首先，那个选区在乡下，其次，党内对该选区还存有争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立即去了。当夜我就被指定为候选人，因为三周后就要开始进行选举。这次选举我失败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争夺这一席位时，保守党占有压倒优势。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经历了竞选的政治洗礼。那时我才22岁；我想，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比他们中任何能干的人参加竞选的次数都多。

问：当你在1934—1935年刚刚加入工党并开始积极从事活动时，你读过哪些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哪些环境条件对你产生过影响？

答：利物浦对我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工业英国的真实面貌。利物浦是受经济萧条沉重打击的城市之一。那里有许多贫民区，人口出生率极高，这对当地形势影响很大，致使利物浦的贫困现象十分严重。那是在大萧条的过程中，我不清楚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但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失业的严重性及它所带来的恶果，那要比今天英国的失业情况严重得多。那种形势对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过在此以前，我在利物浦就开始比以往更广泛地阅读了有

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在牛津大学，我就常与社会主义者交往，但阅读这方面的著作是在利物浦开始的，我阅读过 H·G·韦尔斯、萧伯纳、阿诺德·本涅特和贝特朗·罗素等人的作品。我不记得究竟最先阅读的是其中哪一位的著作，我读得很杂，各人的书都读，一直读了好几年，他们对我的思想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究竟谁的影响更大些，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比较赞成韦尔斯的思想和他对所有问题的见解，不太同意萧伯纳等人的观点。我跟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读过萧伯纳的《知识妇女的社会主义指南》一书。我认为这是一本佳作。我也读过他的许多剧本的序言，但它们不像韦尔斯的作品那样具有振奋人心的效果。当然，萧伯纳与其他几位人物一样，在使我成为社会主义者方面，起过同样的作用。我还读过伯特兰·罗素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当时撰写的《通向自由之路》以及有关苏联革命的著作和政论书籍，它们对我的思想都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就在刚才读到的 1935 年大选之后不久，我想当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来到伦敦，在《新政治家》周刊社找到一个非全日性工作。我试图在伦敦做个自由记者。我常在《新政治家》周刊社每周工作约两天。在该社经人介绍与 H·M·布雷斯福特^①认识，并开始阅读他的著作，只要能搞到他的作品，我都读了，我还与他交谈，听他发表演说。我觉得在所有社会主义

^① H. M. 布雷斯福特(1873—1958)，著名新闻工作者，忠诚的社会主义者。1922—1926年间，他担任《新领袖》杂志的编辑。布雷斯福特很重视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既反对斯大林主义，又抨击法西斯主义。他通常为《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撰稿。

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中间，他对我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都大，我在《饮水思源》一书中曾谈到过这一点，该书中专门有一篇关于布雷斯福特的论文。他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问：上面你提到的基本上都是英国作家，能否请你谈谈法国、德国思想家以及马克思等人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答：可以。当我来到伦敦时，我开始意识到应该阅读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我在牛津认识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常常谈论马克思的思想，并展开争论，当然我与他们也进行讨论。那时我比较赞同伯特兰·罗素对马克思的评价。我认为罗素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我猜想，你会根据“自由主义”一词的正确含义把它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解释。当我到伦敦时，我开始更多地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读得数量很大。1936和1937年间，我认真通读了《资本论》，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是与巴巴拉·卡斯尔^①一起读的（那时候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贝斯特）。当时我们常给《论坛》周报撰稿，那是1937年创办的一份报纸。根据威廉·梅勒的意见，我们在报上开辟了一个关于工业和工会事务的专栏。梅勒是周报的编辑，他还鼓励我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在我读《资本论》的时候，常常穿插阅读《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和另一些更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例如极为明显的是马克思的《法

^① 巴巴拉·卡斯尔(1910—)曾长期担任英国下院议员。1950年后，她一直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委员会主席。威尔逊执政期间，她先后担任过几个内阁部门的大臣，其中1968—1970年任能源和生产大臣。现任欧洲议会议员。

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们有关英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著作，以及恩格斯论述工人阶级历史的著作等等。因此，我在30年代确实博览贯通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量经典著作。我肯定不希望在任何意义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我想，如果不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没有资格谈论有关的政治问题。大约两三年前，我读了S·S·普拉沃写的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书写得很好，它使我想起了马克思思想的各个方面，他的思想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受过马克思思想熏陶的英国人都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对莎士比亚以及所有文学名人的研究造诣很深，因此他的著作对英国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我绝不是说阅读马克思著作仅仅是一件颇费思索的艰苦劳动而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能给人启迪，使人奋发。那时，我与一些人结为好友，如安奈林·比万等，他们也都在埋头钻研这种或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马克思所描绘的正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而且比其他作家描写得更高明，尽管像比万这样一些善于思索的人并不打算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时有一家左翼出版社，我常常阅读该社出版的书籍，许多人都大量阅读它的出版物。它出版的书籍质量优劣参差不齐，不过我觉得其中有一些确实都是上乘佳作。约翰·斯特雷奇^①的战前著作以

^① 约翰·斯特雷奇(1901—1963)，英国下院的工党议员，奥斯瓦德·莫斯利的朋友。1931年，两人同时脱离工党，并支持创立新党。后来，莫斯利表现出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倾向，斯特雷奇便与他断绝关系，并开始倾向共产党，但从未加入共产党。30年代期间，他写过几本颇有影响的著作，如《即将爆发的权力之争》等。1939年，他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艾德礼内阁中任职。斯特雷奇的影响在知识界更为突出。

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性作品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有些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我们阅读了斯特雷奇的著作，因为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更加通俗易懂。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引起我想象的是布雷斯福德，我认为，他的传统、观点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运用都做到了恰到好处，他把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观念和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结合在了一起。我认为，他从英国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要比其他任何人高明得多。

问：请允许我问一下你对30年代活动的反应，特别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英国工党中的比万和其他许多人都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而在党内形成的十足的和平主义，适应于日益嚣张的法西斯主义威胁。请问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你说的情况确是如此。在英国工党的左翼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反战和平主义传统。它不仅是和平主义的，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那是从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它演变为工党的左翼激进主义观点。因此，我认为那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尽管那里面包含着很强的和平主义成分。那种传统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持续到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起。那时在意大利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但希特勒的得势改变了工党左翼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我不是说那是一下子突然改变的。我想，这种改变势不可挡的时候是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法西斯主义及其威胁，特别是要求支持西班牙

牙共和国的强烈呼声，压倒了党内的和平主义思潮。毫无疑问，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呼声是整个 30 年代社会主义者最强有力的国际事业。尽管对工党可以提出各种恰如其分的批评，但工党的历史功绩要比其他党派大得多，因为工党认识到（工党的左派首先认识并说服全党认识到）必须、而且可能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如果西班牙共和国确实得到了充分的支持，那末完全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就可能消灭在西班牙国土上。这是西班牙人民的看法，或者说是西班牙社会党人的观点，同时也是许多西班牙支持者的见解，假如不是右翼分子、保守党内阁以及工党内部某些人的背信弃义，上面那种结局是可能出现的。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人们把这件事情说成好像是在黑与白之间作出选择那样简单，似乎这种选择在那时候是轻而易举的，而今天社会主义者要做到这一点却要难得多。我认为情况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30 年代要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而要在反对御前大臣的统治和反抗希特勒之间作出抉择更有其特殊的难处。

问：你们是在特定时期从和平主义转向准备对付可能爆发的战争的，是吗？

答：我认为人们确实变了，左翼中不同的人都渐进地变了。各人转变的具体时间很难说得十分确切，不过可以肯定那是 1934 年至 1936 年 6 月间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或者过后不久，工党内部的和平主义成份或者说和平主义势力已经变得相当虚弱。到 1935 年，党内论战中和平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是乔治·兰斯伯里，他是一位相当杰出的人物，他的多年活动经历使他颇受工党左翼的青睐。他

从不是工党正统组织的成员。1931年出现竞选结果一边倒的情况后，他成了少数左派中的一个，偶然当选为工党的领袖。实践证明，他干得相当出色。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与他相交甚厚；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里普斯是兰斯伯里在工党内的主要助手。他们相处融洽，原因之一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共同的宗教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这正是我所不具备的。宗教对他们确实是有影响的。1935年召开党的会议时，也就是当年大选之前，兰斯伯里被提出来作党的领袖。对于工党来说，参加这样的选举并不是个好办法，不过，说欧内斯特·贝文是现实主义的，而兰斯伯里是浪漫主义的却不是事实，在我有关著作中已经说过，贝文对待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不像工党左翼那样现实而富有远见卓识。因此，30年代期间不同势力之间展开了争论。虽然工党有不足和弱点，但我认为，左翼之间进行的争论远比保守势力中开展的论战来得光明磊落。保守势力之间的争论是臭名昭著的，他们的争论是究竟要不要姑息甚至接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英国社会和英国统治集团中，有着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受甚至欢迎法西斯主义。但是整个工党坚决反对这种卑鄙的主张。

问：战争的经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你对工党应起作用的想法？你能否谈谈从1939年起到艾德礼内阁这段时间里你个人的经历？

答：战争对英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巨大、深远和强烈的影响，为工党在1945年的胜利，甚至为工党而后可能实际上奉行的更具冒险性的政策准备了条件。马克思曾说，战争是

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肯定也在1939—1945年之间的英国发挥了作用。首先，人民对于使他们误入歧途的那些1939年前的保守党领导人抱有强烈的反感，人民不仅反对他们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他们当政时的大规模失业深为不满，对那些为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辩解的人把人民引向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也深恶痛绝。艰难困苦的经历在人民心中播下了反保守党反托利党的种子，后来丘吉尔帮助他们摆脱了人民的这种情绪。但是这并未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我们在当时条件下陷入了战争的灾难，而预先又没有向人民揭露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阴谋，因此整个保守党遭到人民的极大憎恨。这是导致整个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是为了反对战争，必须放弃当时在英国十分盛行，而且保守党仍然死抱住不放的大部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1939年以前，凯恩斯主义及有关思想在英国差不多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英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人数仍在100万以上，自由放任理论十分流行。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尽管在战争爆发后的头9或10个月内，保守党人仍试图实行这些学说。但从1940年起，当英国陷入战争的危难之中后，各种关于动员全国资源的激进思想纷至沓来，其中许多观点被采纳了。从此，英国进行战争动员的效率远远超过了别的任何国家，甚至德国也无法与之相比。我觉得这是某种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战时的英国比我所看到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共同目标高于一切，它们变成了许多领域高效率的经济活动。人们有着相同一致和大家都接受的目的。仗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这是工党和社会主

义者压倒一切的一致看法，因此，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也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这一切促使社会主义思想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像“贝弗里奇报告”之类的文件也应运而生。这些文件对人民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但我又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人民的思想情绪和精神境界，而不是站在前面引导人民前进。

到1945年，我们有了越来越多像安奈林·比万那样能够代表公众思想情绪的人。我感到，他比正统的工党领导人更了解公众究竟在思考着什么。1945年欧洲地区的战争结束后，联合内阁是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比万恰当地表达了公众的意愿。正是他的主张（我并不是说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种主张）使工党退出了联合内阁，并为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获胜铺平了道路。这时工党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个转折，对此艾德礼一直是不赞成的。我认为艾德礼当时不相信他会在1945年大选中赢得胜利，欧内斯特·贝文也是如此。他们以为1918年的政治事件有可能再现，也就是说再出来一个劳埃德·乔治^①，根据1918年保守党的宣传，似乎是劳埃德·乔治领导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以他们想到了丘吉尔，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他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将会在1945年大选中遥遥领先。正是以此为基础，保守党决定开动宣传机器，在

^① 戴维·劳埃德·乔治（1863—1945），1916—1919年间担任自由党领袖和英国首相。1919年，在利用战争而进行的选举中，他重新掌权，担任自由党与保守党组成的联合内阁首相。丘吉尔和保守党在策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选时，曾想到过这次选举的胜利。

报纸上(当时大多数报纸都在保守党控制之下)大肆渲染这一情况,可惜他们根本不了解人们整个战争时期所受到的教育。战时左翼出版社的宣传工作始终没有停顿,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给宣传小册子投过稿,社会主义者的舆论工作在有些方面大大超出了人民想象的规模。社会主义小册子的阅读面是极其广泛的,等待交战的人们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因此,人们并不完全相信保守党渲染的情况。我记得著名出版商维克托·高兰兹对我们在1941和1942年初次出版的《罪人》等书籍十分担心,但这些书销售量很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后来,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书籍,这些书都是宣传性的,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倾向,我想,它们对1945年工党的胜利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问:那末,这是否意味着对艾德礼政府的批评?他是不是没有充分估计到1945年英国公众对工党的支持?也许你会认为,由于工党左翼遭到挫折,艾德礼当政不是工党竞选的结晶,而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工党一系列问题的开始。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当时以艾德礼—贝文为首的工党领导。艾德礼与贝文关系十分密切。贝文比艾德礼势力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工党中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又是工党在内阁中最得力的一位大臣。1945年后,他仍是内阁中最精明强干的人物。我不想贬低他。他打算担任党的第二把手。⁹⁷只要能够掌握领导权,他并不想非要担任工党主席不可。他是工党右翼的强有力的人物,对议会党团的了解不像对工会运动那样熟悉;但他博学多才,办事果断,因此深得人心。他与艾德礼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使党的一

切事务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理。毫无疑问，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革，在政府的最后阶段即1950—1951年期间，工党的得票数量仍然很大。考虑到1940年至1950—1951年间整个英国人民所经历的变化，我认为工党能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取得那么多人民的忠心支持，完全是民主的重大胜利。他们经历了艰苦卓绝和濒于失败的考验。在他们掌管的国家里食品匮乏，不得不在1947年和1948年间实行严格的食品定量配给制。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方面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度过难关，一方面为了使印度和欧洲不致于陷入饥饿的境地。当时，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只是我们不知道已经削弱到何等程度罢了。即使我们许多左翼人士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者说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成绩应该更大些，但是，回首往事，我们就会知道，要平稳而巧妙地实现这些改革，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1950年前后，我们展望未来，完全有理由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骄傲。总之，这就是安奈林·比万本人以及我们这些与他有关的人的观点。贝文于1951年辞职。他本人是不愿意辞职的，他不想休息，不希望工党在竞选中失利。我想，他对1951年我们在大选中失败一事颇为震惊。他一直相信失败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也确实是可能避免的。

问：许多欧洲社会党人认为，艾德礼内阁错过了两次重要的机会。一是没有奉行让·蒙内特等人在欧洲大陆提出的以某种计划为基础的经济政策，而是采取了国有化但没有计划的政策；二是他没有加入共同市场的前身组织“欧洲煤钢联营”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投资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对社会党人来说也不例外，而且始终是十分重要的。在共产党国家中，他们的做法是实行强制性的投资，结果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他们不需要对民主选民负任何责任，因此可以采取这样的投资方案。可是，尽管我们应该对选民负责，我们仍不得不设法实施和推进这种投资计划，1945年至1950—1951年期间，人们没有对此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我认为，缺乏进行大规模改革方案的时期主要是50年代。1945—1950年间，我们正在医治战争的创伤，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消耗的资源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远远超过美国、加拿大或任何其他同类国家。我们投入战争的经费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也许德国除外。但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化费甚至超过了德国，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原因之一。我并不是说从1945—1950年间我们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没有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的计划手段，当时我们写的某些小册子就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如1948年出版的《坚持左的方针》和1949年发行的《继续执行左的方针》等。然而，考虑到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沉重负担，同时为了使国家摆脱这一沉重负担，我们最终实施了一项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我认为这项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外，我们还推行了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国家健康服务和社会保险计划。当然，从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后来开展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来看，我们在计划领域内还可以从事更多的事业。我想你可以看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保守党内阁当政时，这种对比对我们是极不利的；我认为，英国的失败，或者说英国的生产

率和生产效用相对开始下降的开始，主要是在保守党当政时形成的。我们认为情况确是如此。

问：乔治·布朗^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威尔逊内阁中，他曾想推行一项严格的经济计划，但他的努力白费了。难道在威尔逊当政时没有采纳这方面经济计划的机会吗？

答：是的，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认为，在1964—1966年间很难过份抱怨或者批评他们，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席位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一项社会主义计划非常困难。1966年，哈罗德·威尔逊运用他的政治手腕和巧妙安排，想尽一切办法（无人可以比拟），赢得了将近100个席位的优胜，这是1945年以来工党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时期。按照我的意见，正是在1966年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失去了最大的机会，因为当我们看到有5年时间可以利用的时候，我们没有随机应变抓住这一机会。机会的丧失主要是因为威尔逊和卡拉汉等人决定维持汇率，增加币值稳定的英镑发行量，而没有为英镑贬值做好必要的准备。威尔逊过高地估计了英镑贬值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利影响，认为英镑贬值后的工党内阁将会在政治上和竞选方面遭到巨大的打击。结果英镑终于贬值，我们在政治上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我认为，这个时期工党确实未能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理应受到

^① 乔治·布朗勋爵（1914— ），工党右翼成员，1963年在工党领导人竞选中被威尔逊击败。1964年任英国副首相和经济事务大臣。他在经济计划方面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财政大臣卡拉汉的反对。1966年，布朗任外交大臣，不久因与威尔逊意见不和而辞职，从此结束了他在工党内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批评。另外，当时威尔逊内阁与工会之间展开了多次争论，这对他的内阁来说是极为不利的。1966年后的海员罢工，与白皮书《代替冲突》有关的种种困难，以及1966—1970年间威尔逊内阁大错特错地卷入与工会无休止的争吵等事件，都是导致1970年和后来工党处处受挫的主要原因。下面就谈一谈你前面提到的关于欧洲各国社会党批评英国工党的孤立主义政策和工党在50和60年代初的失误问题。

英国工党未能奉行一条与欧洲各国社会党相联合的政策，对此我觉得有许多情况需要加以说明。工党左翼在《继续执行左的政策》一书中，曾经就这些问题批评过艾德礼—贝文内阁，尽管在共同市场的前身、关于钢铁工业联合的舒曼计划提出之时，工党左翼在如何与欧洲联合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记得当时在《论坛周报》编辑部，我们在应否支持该计划的问题上各持己见，左翼的意见分歧非常普遍。但是我认为，从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外交大臣以及后来的时期开始，英国可以奉行一条更加亲欧的政策，我的意思不是指共同市场，而是说可以与欧洲社会党协调行动，考虑它们前进的道路。我认为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失误，比如，我们在对待1945年以后的法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地位时犯了错误，也就是说，工党内阁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行动时畏首畏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的政策与它后来奉行的政策是不同的。同样，我还认为，我们在与孟戴斯—弗朗斯携手合作时也过分优柔寡断；他组成的法国政府是当时最好的政府，可惜我们对他的政府缺乏了解。至于谈到有关共同市场本身的实际建议，我认为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者就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敌意。

因为共同市场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共同市场常常与自由市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工党，特别是工党的左翼始终对它存有深深的疑虑的原因。在某些方面，这种疑虑转化成了一种民族主义态度，我想欧洲社会主义者有权就此对我们提出批评；当然我们也有权向他们指出，共同市场本身的形式与社会主义必然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应该作的是准备撇开共同市场本身的机构，与欧洲国家及欧洲社会党发展联系，我相信，这样的形势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在今天的社会党国际里，有些国家参加了共同市场，有些则没有；有些国家加入了北约集团，有些则在该组织之外。我并不是说社会党国际是一个强大的团结一致的组织，但我认为，它说明了如何制定一项既不和共同市场、亦不与北约集团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社会党国际作为一个整体所制定的有关国际事务的政策，要比通过共同市场或其他任何组织制定的政策都有更多向工党说明的理由；这可以成为英国工党为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作出贡献的一种途径。我不认为与共同市场的对立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组成部分，当然不是，对立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我们对共同市场批评得越多——或者是用退出共同市场机构来表示这种批评，英国社会主义者与欧洲及其他各国社会党建立更良好关系的责任就越大，我想，我们能够通过社会党国际做到这一点。

问：倘若英国退出共同市场，那末英国就会奉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你是否认为那将导致英国经济的持续衰退？

答：不，我认为不会。遗憾的是共同市场的机构设置不适合英国的国情，它们只能适应其他类型的经济。我不想责

备那些设计了共同市场机构的国家，因为它们的设计是为了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但不适合我们，也就是说，他们强加于我们的是食品、农产品和工业领域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从而影响了我们想从世界各地获得的食物供应，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我们一向拥有的食物来源，同时，迫使我们开展工业品的自由贸易，这一直不是能够维持我们工业生产发展的途径。我们不仅要与日本，而且要与欧洲各国开展激烈的竞争，从而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工业生产。此外，我们在预算的安排上也不得不费尽心机，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那末，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1975年工党内阁复议预算时，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能有所突破，但不是把我们从欧洲割裂出去的突破，那样做是可笑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欧洲的一部分。戴高乐曾在1957或1958年提出过一项建议，我想那项建议有许多可取之处。他建议英国以一种非正式成员的身分出现，我认为，从经济角度上看，这比较适合我们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卷入涉及经济问题的大量争论中去，从而能使我们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如果加入共同市场，我们就会在劳务和经济问题上与法国展开无休止的冲突；如果不加入共同市场，我们与法国的共同利益就会大大加强。当然，我坚决反对设计圈套以引诱英国挑拨德法关系而从中渔利。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没有丝毫好处，而且还意味着法国和德国可以利用它们的共同利益来对付我们。许多比较小的国家虽然没有加入共同市场，但它们仍然是很好的国际主义者，而且能比处于此类组织内更有效地执行它们的经济政策。奥地利、挪威和瑞典是三个极好的例证。

问：再回头看看前面你谈到的威尔逊内阁对待工会的政策，巴巴拉·卡斯尔关于工业关系的方案对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工会利益的工党陷入了困境，被迫采取与工会对立的立场。毫无疑问，英国的工业关系有它尚未解决的基本难题，你认为出路何在？

答：这个问题确实尚未解决。但我并不怀疑工党最终会得到好处。当时工会很不得人心，有人就想利用工会的这个弱点。目前的保守党内阁正在极尽全力利用工会的弱点，而且最近几个月内有可能变本加厉地那样做。至于社会民主党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工会强烈的对立情绪。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假如英国想要恢复它的经济，那末唯一的办法是与工会结成联盟，无休止的矛盾冲突于事无补。这并不是说我们或者工党内阁必须完全按照工会的意见行事，那当然是错误的。任何一届工党内阁都要向议会负责，它所代表的远不仅仅是工会的利益。可是工会代表了英国的一股强大的民主势力，假如政府长期与工会对立，特别是工党内阁与它对立，那是愚蠢的。因此工党内阁白皮书《代替冲突》中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实在并非良策，我想大多数与此有关的人员现在都同意白皮书是个严重的错误。1971和1972年，保守党内阁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他们制定的《工业关系法》^①是个更大的错误，根本无法实施，以至于事到如今，保守

^① 工业关系法(1971)，系希思内阁批准的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成立了全国工业关系法庭，以处理法令条款规定的各种非法活动，如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和声援性罢工等。同时，就业大臣根据法令可要求在罢工开始前有一段调解时期或投票表决期。1974年，工党内阁废除了这项法令。

党也尚未打算尝试和重新实施类似的法令。1974—1975年，我们废除了这项法令。从此，我们得到了许多雇主和整个工会的大力支持。

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鉴于撒切尔政府不受人民的欢迎，加之它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这对工党左翼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当然，工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是有分歧的，工党内部也存在不少矛盾冲突。作为工党领袖，你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活动？你准备如何恢复党的团结？大选中你将采取什么方案使工党重新掌权？

答：这个问题很大，三言两语难说清楚。我认为工党总的经济纲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选择的经济战略，是个比较好的战略；如果能够正确地阐明它，那末我们就可以重新取得人民的支持。我知道，有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许多旧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尚没有付诸实践，我不相信我们的方案不能有效地付诸实施。如果全力向人民说明我们的供选择的经济战略，那末工党的境况会比以前好得多。工党还遭到了其他一些事件的困扰。经济危机越严重，我越是相信，该国完全民主的争论会转向经济战略的选择，我认为，我们的选择要比与托利党决裂或我们自己内部分裂好得多。确实，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很大，但那是徒有虚名的吸引力，那是对公众常有的希望平和共事倾向的一种吸引力。在英国历史上，人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他们希望政治家在解决民众的各种问题时能够一帆风顺毫不费力、互相之间不吵不闹，也不恶语伤人，这种愿望颇得人心，然而一旦遇到严酷的政治现实，这种吸引

力便会原形毕露。1931年的英国内阁就是因为所有的好心人听从了此类花言巧语之后才选举出来的。它是工党分裂的产物,毫无疑问,它是英国历史上最差的一届内阁,但它是在社会民主党人今天正在寻求的那同一种吸引力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我不想从我们的观点出发低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但我认为,在对他们的地位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所作的预测是过分夸大的了。请问,你的问题的另一部分是什么?

问: 作为工党的领袖,你打算采取什么战略来夺取下届大选的胜利,并使英国摆脱经济危机?

答: 关于这个问题,也要取决于国际事务发展的状况。我们不能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妄称我们想干什么,或者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那是荒唐可笑的。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者,我认为那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当然,我们对法国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法国社会党第一次赢得了历史上那种规格的胜利。我相信法国社会党人正在尝试贯彻他们的经济理论。我们与他们在外交政策和其他一些事务上存在着分歧,但在经济政策上我们有许多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实践和希望。他们的经济政策要完全见效尚需一定的时日,而且还会不断遇到风浪和曲折。对于法国经济政策的实施,我们不应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要随时与他们研讨磋商。一旦我们在大选中获胜,我相信我们就能为奉行共同一致的经济政策而发挥重大的作用。1974—1979年间工党内阁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很难在世界上找到别的打算奉行经济扩张政策的国家;1974年工党执政伊始,确曾试图奉行经济扩张政策,如果那时的法国由密特朗总统执政,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机会

遇到志同道合的国家，那末我们就会大力推进积极的扩大经济的政策。如果巩固了权力，我们当然不会在小小的英国单枪匹马去干，那样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在共同市场中承担的义务，人民很难同意我们那样干。但我想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鉴于我们有可能退出共同市场，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在奉行国际性的经济政策时确立共同一致的目标。我相信我们将奉行一条比现行保守党内阁更好更有魄力的对待第三世界的经济政策。也许你会说我们的魄力太小了，因为保守党内阁在发展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方面根本一事无成，除了削减目前向海外提供的数量少得可怜的援助以外。由于法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较为有希望的态度，因此英法之间合作的机会更大了；美国可能发生的情况也许会是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因素。

作为结束语，我想指出，即使在工党成为执政党以前，我也希望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对限制军备竞赛发挥一点作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无疑是在核军备竞赛方面发生可能的情况以及我们是不是能够扭转这种局面。我认为，欧洲存在着一种要改变这种事变进程的强大运动。我认为现在急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努力促使几周内即将开始的美苏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取得成功。西欧社会党的共同愿望和决心就是要使这些会谈能够有所成就。我在促成这些会谈的进行方面已经做了一定的工作，我还能在这些谈判取得成功作出我应有的贡献。